关于清除党内右派分子的决定彙編

（四）

（党内文件·注意保存）

中共中央监察委員会办公厅編

出版說明

这本小冊子里，选編了六十九件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的党籍的决定和决議，仅供县委以上党委和有关党員幹部閲。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

目　录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極右分子李之璉党籍的决定……………………………………（1）

中共中央財貿工作部机关总支委員会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郝可銘的党籍……………………………（4）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哲学教研室支部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仲平党籍的决定…………………………（7）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林朗党籍的决定……………………………………（9）

中共中苏友好协会总支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廖經天党籍的决定……………………………………（13）

中共鉄路工会全国委員会办公室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学增党籍的决定…………………（18）

中共教育部临时党組、教育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展开反对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斗爭的报告…………（20）

中共中国人民銀行总行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尙明党籍的决定……………………………………（28）

中共中国人民銀行总行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詹武党籍的决定……………………………………（30）

中共中国人民銀行总行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夏鳴党籍的决定……………………………………（32）

中共广播事业局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温济澤党籍的决定……………………………………（33）

中共通俗讀物出版社总支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蓝鈺党籍的决定……………………………………（38）

人民鉄道报社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范四夫的处理决定……………………………………………………（39）
人民鉄道报社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刘萍的处理决定……………………………………………………（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袁毓明的处理結論……………………………………（42）
中共新华社对外部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适五党籍的决議……………………………………（43）
中共民族事务委員会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極右分子翟宜地党籍的决定…………………………………（45）
中共輕工业部造紙設計院总支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平党籍的决定…………………………………（49）
中共建筑工程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永清党籍的决定……………………………………（52）
中共地質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韶党籍的决定……………………………………………（58）
中共地質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毅党籍的决定……………………………………………（61）
中共石油工业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楊海鹏党籍的决定………………………………………（64）
中共建筑材料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新党籍的决定……………………………………………（6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設委員会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罗維的結論………………………………（68）
中共城市建設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宜之党籍的决定……………………………………（70）
中共水产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極右分子刘乐川党籍的决定……………………………………………（72）
中共农业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子敬党

籍的决定……………………………………………（75）
中共农业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孙森甫党
籍的决定……………………………………………（76）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七支部委員会关于極右
分子徐盈的政治結論……………………………（77）
中华人民共和国財政部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齐
佩軒的处理結論……………………………………（82）
中共司法部机关委員会关于極右分子王怀安的結論
及处理决定…………………………………………（84）
中共监察部第一司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極右分子李
沐英党籍的决定……………………………………（87）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王
善玲的处理結論……………………………………（88）
中共北京劳动幹部学校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罗
青党籍的决定………………………………………（90）
中共对外貿易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超
党籍的决定…………………………………………（92）
中共第二商业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朱华
党籍的决定…………………………………………（95）
中共衛生部机关委員会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齐仲桓的
党籍…………………………………………………（98）
中共辽宁省委員会第八次全体会議关于开除坏分子、
右派分子阮途党籍的决定…………………………（101）
中共辽宁省水利局总支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
宗义党籍的决定……………………………………（103）
中共辽宁省气象局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敬党籍
的决定………………………………………………（112）
中共东北工学院委員会关于極右分子王銘勳的处分
决定…………………………………………………（114）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曾軍的党籍的決定……………………………………（116）
中共鞍山市委組織部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董志民党籍的决議…………………………………（120）
中共鞍山市文化局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楊东昉党籍的决定…………………………………………（125）
中共旅大市委扩大会議对党內右派分子王輔民、黃易明問題的决議……………………………………（126）
中共辽宁省妇联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立党籍的决定………………………………………（129）
中共吉林省林业厅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坏分子、右派分子王其清党籍的决定…………………………（132）
中共长春市委員会关于極右分子范政的結論…………（137）
长春电力設計院整風領导小組关于極右分子张涛的政治結論……………………………………………（138）
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章洛的决定………………………………………（142）
中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組关于右派分子閻伟鋒的反党活动和处理意見的报告………………………（145）
中共唐山鉄道学院委員会对右派分子白鉄岩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150）
中共邯郸市委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田党籍的决定………（153）
中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局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斐然党籍的决定……………………（157）
中共北京市司法局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賀生高党籍的决定………………………………………（162）
中共北京市房管局第二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馬陵党籍的决定………………………………（165）
中共北京地質勘探学院委員会对右派分子陈子谷的

处分决定……………………………………………（167）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除高沐鸿党籍的决定………………（176）
中共山西省交通厅机关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
子李景良党籍的决定…………………………………（183）
中共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厅支部委員会关于
开除右派分子韓林党籍的决定………………………（186）
中共陝西省衛生厅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
月明党籍的决議………………………………………（189）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楊林党
籍的决定………………………………………………（195）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文良
党籍的决定……………………………………………（200）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晓天
党籍的决定……………………………………………（203）
中共兰州市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秦汝哲的政治結論……（210）
中共青海省委員会对右派分子刘杰的处理結論…………（214）
中共青海省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潘光亚的处理結論……（216）
中共青海省委监察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雷鳴的处理
結論……………………………………………………（218）
中共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委員会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哈
木提尧鲁达西甫的党籍………………………………（223）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極右分子李之璉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

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拥护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关于李之璉、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見的报告，决定立即撤消李之璉現任机关党委委員和書記职务并开除其党籍。

附：中共中央宣传部整風领导小組关于極右分子李之璉的政治結論

李之璉，男，四十四岁，河北蠡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現任职务：中央宣传部秘書长、机关党委書記。

主要反动言行：

1、反对党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爭，阴謀推翻中央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对作协党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报告的批示，策动丁、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他首先以“根据不充分”、“手續不完备”为借口，保持了陈企霞、李又然的党籍。他掩盖丁玲的叛党历史，把她美化成为一个革命战士。在他提出的审查結論初稿中，不写丁玲是“自首变节”，而写成“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了政治上的錯誤行为”。强調丁玲在被捕期間曾进行“对敌斗爭”，坚持要把丁玲在南京变节后三年多的历史計算党龄。帮助丁玲向党提出有关她历史結論的三点保留，以欺騙和愚弄組織。鼓励和帮助丁玲、陈企霞翻案，唆使他們写“申訴書”，並广为印發陈企霞向党进攻的“陈述書”。完全按照丁玲

的意思对丁、陈問題进行所謂重新查对，力圖为丁、陈开脫。丁玲直接寄給他的一封为自己辯护、污蔑周揚同志和作协党組的信，要求不要給周揚同志和作协党組負責同志传閱，他完全照办。他还散布"一九五五年斗爭丁、陈反党集团搞錯了"，"丁、陈反党集团案完全能否定掉"等流言，並在八大第一次会議的河南小組会議上說："丁、陈問題搞錯了"，企圖在八大会議上提出这个問題，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陈企霞給他的信中公然污蔑党对自己的斗爭是"政治陷害"，李之璉予以默認；丁玲在給他的密信中竟說"翻身有日，有重見天日的可能"了。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亲自在"宣教动态"上一条关于文艺界情况的消息中加按語說："丁、陈問題自一九五五年作协党組的报告通报全国后，直到現在还未做出結論"。企圖在全党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中央搞錯了的空气，以配合右派的进攻，推翻党对文艺工作的領导。

2、否定肃反运动，执行保护坏人，打击积極分子的惡毒政策。他認为肃反搞群众运动是錯誤的。他片面地夸大肃反运动中的部分缺点錯誤，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績，認为从反对胡風反革命集团的斗爭發展到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爭，在"思想上組織上是缺乏准备的"，因而，普遍地發生了"盲目性"和"扩大化"。他同时还散布謠言說："中央准备释放胡風"。他特别集中反对作协的肃反，認为作协肃反工作有偏差是由于"党委过分依賴了中央十人小組的直接領导"，这实际上是指責中央十人小組。他在甄别工作中，强調所謂避免同被审查者之間造成对立，对多数历史反革命分子在結論上都不写明是"历史反革命分子"。他还特别强調对肃反对象的"賠礼道歉"。在他亲自召集的对肃反对象的"賠礼道歉"会上，对参加会的肃反对象表示極大的同情，附和他們对肃反运动的攻击。他在会上鼓励他們"坚持真理"，要有"独立見解"，要把反攻的鋒芒对着領导。他並且說："在运动中一些同志受到一些不同的对待，事后

同志們不滿，这种不滿是合理的……有些同志經不起考驗而自杀了，你們总算忍受过来了，这也是政治上的涵养。……忍受这种苦难是政治上的鍛炼。”

李之璉是一个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和野心家，他是一个在党內隐藏得很深的阴謀家，他的許多反党活动都是背着部的領导，利用职权，採用两面三刀的手法进行的。过去他曾經背叛过革命，一九三四年他被捕后，丧失革命气节，在供詞上和上訴書中提出“反对共产党”，辱罵党为“共匪”、“反动团体”，說：“强日侵于外，共匪扰于內”，“共党固宜痛剿，不遺余力”等。他在东北工作期間，反对当时的平分土地运动，認为如果發动群众在一九四八年春耕前“又快又透”的搞完土改，东北几百万人就会有餓死的危险。並公开主张“右比左好”。他在文艺思想上也極为反动，他在延安發表的文艺作品中，对革命战爭充分表露了恐惧、絕望和动搖的阴暗思想。一九五七年春，他还写了一首丑化和污蔑轉业軍人的反动长詩“灵魂深处”，赤裸裸地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悲观失望的心理。

斗爭中的态度：極不老实，不肯交代，进行詭辯，尙未真心低头認罪。

处理意見：划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党內、外一切职务（已經中央批准），降六級（由行政七級降为十三級），另行分配工作。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財貿工作部机关总支委員会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郝可銘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郝可銘，男，山西省洪赵县人，四十五岁，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現为中共中央財貿工作部幹部管理处处长。

郝可銘在幹部处工作期間，同該处副处长江卓、二級巡視員李毅組成了反党集团，进行反党活动。他的主要錯誤事实是：

一、反对和抗拒中央的指示和决定。

他反对中央分級分部管理幹部的决定。他說："我不敢說中央分級分部管理幹部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並譏諷地說"我只好說它正确"。反对中央規定的中央新成立的部（工业部、交通部、財貿部）的四条任务，他說："四条任务很空"，"你抓也可以，不抓也可以"。他对政治思想工作、幹部工作、政策检查工作都进行了攻击和否定。他还反对下乡到基層調查了解情况。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他在中央財貿部整風領导小組（扩大）会議上，公开抗拒中央書記处关于帮助国家机关有关部門整風运动的指示。他說去帮助对口部整風是"不伦不类"。当他被迫接受了任务以后，不仅消極怠工，还在幹部处散布謬論說："派人帮助人家整風，会增加人家的麻煩"。

郝可銘反对中央关于幹部訓練教育工作的指示，主张取消幹部訓練工作。他說"幹部訓練工作不是我們的工作"，"幹部訓練工作是个包袱"。他反对陈云同志关于改进財貿各部門幹校教学工作，要各业务部門負責同志亲自上課，借以总結工作經驗，

克服教条主义的指示。中央財貿部决定財貿幹校教学內容以理論、业务政策为主，强調学習毛主席著作。他反对学習政治理論和毛主席的著作。当資产阶級右派反对高等学校实行党委制的时候，他就主张幹部学校同高等学校一样不实行党委制，因而拒絕签發要黑龙江省委財貿部总結省合作幹校实行党委制的通知。

二、散布流言蜚話，破坏党的团結，誹謗中央和毛主席，破坏中苏友誼。

三、否定中央財貿部的工作成績，对抗部的領导。

一九五七年二月馬明方同志在全国財貿部长会議上对一九五六年的工作做了估計，肯定成績是主要的，而郝可銘却說："有人說成績是主要的，我就不同意这句話"。他說，如果說我們有成績的話，就是發現了中央成立的中央財貿部是"基础同上層建筑不相适应"。他反对"我們党的政治路綫組織路綫是正确的，因此成績就是主要的"的說法。他对馬明方同志报告中的許多問題进行了攻击，企圖煽动大家反对領导。

四、整風运动中，煽風点火，包庇右派，向党进攻。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幹部处江卓副处长主持起草了"关于非党幹部的提拔使用情况的报告"（草稿），其中不加批判地引用了一些反党言論，並錯誤地指責党的部幹政策。部里要他們修改，他們不修改，到反右派斗爭的时候，又把这份文件拿出来，要幹部处幹部鳴放。他說"这个文件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不發表，为什么不送中央？"他还散布挑拨性的言論，說中央財貿部"矛盾的鋒芒主要是領导与被領导間的問題"，向别人暗示領导上有錯誤，企圖掀起反党反領导的斗爭。

郝可銘反对認真进行反右派斗爭，並包庇右派分子郝守业（幹部处工作人員），部里指示詳細調查核实郝守业的錯誤事实，他不执行。部里把郝守业的錯誤事实弄清楚，經过了几次大会批判肯定是右派分子以后，他又积極主张把郝守业留在党內。郝可銘还利用李毅向党进攻，並且包庇李毅，他把整風办公室整

理的关于李毅的錯誤言行材料传給李毅看，要李毅預为准备。他还諷刺、打击积極同李毅进行斗爭的同志。此外，他还詆毀浙江省委对沙文汉等右派分子的斗爭。

五、工作消極。郝可銘在中央財貿部工作期間消極怠工是一貫的，而且愈来愈严重。他常常在办公时間带头下棋、打扑克、看小說，迟到早退，无故不上班。他連自己的检討，也找别人代写。他的病本来不是那样严重，医生証明他是可以上班的，但自反右派斗爭以后，他即借口有病欺騙組織，不上班。

郝可銘的上述錯誤並不是偶然的，他是一个沒有根本改造的旧知識分子。他的少年时代是在一个"生活頗富裕"的官僚兼商人的家庭中渡过的。他的剝削阶級意識很深，入党以后，屡犯重大錯誤。一九四零年他在恋爱問題上和党的团結問題上犯了錯誤以后，竟然把党对他的教育說成是"摧残"他。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抗日战爭最残酷的期間，他两次私自回家养病，两年多未做工作。党批評他，他竟誣蔑党"誹謗非难"他。一九四九年他在福建閩侯地委任地委書記期間，把我們党領导的福建人民英勇坚持了二十年的革命斗爭，誣蔑为"只是一条失敗的經驗"。他反抗省委的減租指示，还指示各县委"勿为外界（指省委）影响所动搖"。对于这些錯誤，他不但沒有改悔，反而說"党內麻煩，只要你犯了錯誤，什么时候都要整你一下"。他沒有認眞的自我改造，一貫的站在極端个人主义的立場上来观察問題。这次整風运动中郝可銘所犯的錯誤，是他反党思想的發展和暴露。为了严肃党的紀律，中共中央財貿工作部机关总支委員会于一九五八年十月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郝可銘的党籍，並且撤消他担任的一切职务。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哲学教研室支部大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仲平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陈仲平，男，四十五岁，福建省武平县人，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份职員。一九三〇年入党，一九三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县委特派員、地委副書記、专員等职。現任哲学教研室副主任。

陈仲平在近几年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高潮以来和右派进攻期間，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馬列主义的活动，其主要事实是：

自一九五六年以来，陈仲平經常攻击党的某些基本政策，誣蔑中直“三反”运动搞“左”了，誣蔑統購統銷搞“糟”了。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他更进一步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猖狂地向党进攻，恶毒地誹謗、誣蔑党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的領导同志，恶毒地造謠、誹謗兄弟国家的領袖，公然为胡風辯护，包庇反党坏分子古达。在反右派斗爭中又同情、包庇右派分子，为他們的反党罪行开脫、辯护。

他誣蔑校党委不能領导教学，攻击党的教学方針；反对“向学員学習，为学員服务”的口号；反对科学研究为教学服务，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結合的方針，堅持資产阶級的治学方向。他还造謠中伤，誹謗党委第一書記楊献珍同志，罵侯副校长“不学无术”，不能領导教学，抗拒党委領导，不执行党委决議。

几年来，陈在室内極力培植个人势力，树立个人威信，拉攏黎明、朱明搞宗派活动，打击排斥異己。破坏党和同志間的团結，阻挠貫徹党委的指示和决議，把持領导权，使党委的指示在

哲学教研室不能貫徹执行。对其他部門，陈用同样办法破坏师訓部、短訓班党的統一領导，破坏部門間的团結，使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失。

陈仲平很久以来就存有严重的地方主义思想，早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在本校学習期間，就积極参加了陈华、陈銘金地方主义的反党活动，策划与組織他們向中央告状。攻击党的南下幹部掛帅的方針。以后又不断散布南下幹部排斥本地幹部的錯誤言論，並对党的反地方主义斗爭肆意攻击。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他又企圖再次組織普通班学員向中央告状，借以达到反掉南下幹部掛帅的方針的目的。

当他的錯誤被揭發后，他不但不低头認罪，徹底交代，反而对整風运动进行破坏。整改运动刚一开始即散布空气、緩和反右斗爭的鋒芒；进而压制批評，打击报复，制止别人揭發問題；利用領导职位，拉攏部分同志，指示他們“解释”、串連，召开座談会，用各种方式大肆活动，混淆是非，制造混乱，轉移斗爭目标，抗拒党的領导，阻碍运动的开展；当他的阴謀被揭穿后，竟公开抵抗，直至在全室大会上作了检討，虽承認了反党罪行，但对某些重大錯誤仍採取抵賴态度。党組織为了挽救陈仲平，五个月来，一直耐心教育帮助，但陈直至开全校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时仍不覚悟，态度很坏。据此，陈仲平已背叛了党、背叛了无产阶級的革命事业，完全蛻化成为一个党內右派分子。支部大会决定开除陈仲平的党籍，並建議行政撤消他哲学教研室副主任的职务。

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林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三届机关党委全体同志一致同意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对右派分子林朗的斗爭（林朗已經中央宣传部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决定撤消右派分子林朗现任机关党委委員职务並开除其党籍。

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林朗的政治結論

林朗，原名姜国忠，男，家庭出身地主兼商人，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延安解放日报記者、編輯、採通部科长，延安新华社解放区部副主任，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社长，西北群众日报总編輯，西北行政委員会新聞局副局长，新华社总社副总編輯兼国內部主任，俄文友好报总編輯，一九五七年五月任中苏友协总会副秘書长，党內任中宣部机关党委委員。

林朗的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1、林朗一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就完全站在右派立場，违抗中央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批發的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党組"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問題报告"的指示，否定中苏友好协会的成績，把总会过去的工作說成"一团糟"，並以此污蔑和攻击当时的党組和党組書記錢俊瑞同志。他在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五月总会召开的党組扩大会上，恶毒地提出关于总会"領导核心长期不

能形成的原因何在？”的問題，来追查責任。这显然是要把責任推到錢俊瑞同志身上，以此来污蔑、攻击錢俊瑞同志，达到擠走錢俊瑞同志，取得秘書长职务的目的。他在这次会上，就公开提出請中央考虑不讓錢俊瑞同志再兼友协总会的秘書长职务。

2、整風鳴放期間，林朗在总会与右派分子廖經天（原总会党組副書記、副秘書长）、在友好报与反党分子庄方（总会党組組員、俄文友好报副总編輯）結成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反党联盟，公然违抗中央整風指示，出謀划策，有意識、有目的、有組織、有計划、有綱領地策动和組織党內外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廖經天的反党整風計划和反党的动員报告是經过林朗看过和同意的，廖經天在整風鳴放初期的一系列反党措施，都是經过林朗同意的。有些具体措施还是林朗直接指示实行的。比如林朗提議成立四个翻案小組（幹部工作，三反，肃反，領导关系），並亲自布置这四个組極力进行翻案活动。

在友好报，庄方的反党整風計划和具体措施，也是林朗同意的。林朗在整風一开始，还特别恶毒地規定总編輯、副总編輯迴避会議，領导人暂不表示态度的組織措施，讓右派分子毫无顧忌地向党进攻，向領导同志，其中特别向卢竟如同志进攻。

在整風鳴放初期，在总会和总会会刊友好报都出現了右派分子鬧大民主的“小匈牙利事件”的局面。林朗是支持右派分子鬧大民主的。他曾在总会党支部大会上公开支持右派分子鬧大民主說：“昨天听說大民主有到来的趋势。群众（林朗心目中的“群众”，就是右派分子）不滿是正当的，因为过去的問題沒有解决，現在还是混乱的……”

人民日报6月8日發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論后，林朗認为国內形势急轉直下，他唯恐机关里面右派分子的反党行為受到影响，在总会提出所謂“外紧內松”方針，在友好报提出所謂“我們机关沒有民主人士，和社会上情况不一样”的論調，繼續鼓励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林朗頑强地抗拒中宣部和錢俊瑞同志提出应把廖經天划成右派分子的指示，並且千方百計破坏与阻挠反右派斗爭，包庇其他右派分子。在总会，林朗特别頑强地包庇右派分子廖經天、李林；在友好报，林朗自始至終包庇由庄方掛帅的林璋、尤錫麒、宮以仁右派反党小集团。对总会及友好报的所有右派分子，林朗給予極大的同情和关怀。他甚至在陈璋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不到半年的时間就策动他翻案。右派分子对林朗表示了无限的感激和推崇。極右分子辛秋水逢人便說，他最欽佩两个人：一个是李之璉，一个是林朗。

3、抗拒执行中央关于俄文友好报由日报改周刊的决定和办周刊的政治方針，自改刊之日起直到揭他罪恶蓋子之时为止，周刊所执行的是他反党的方針。

中央于一九五七年七月初就作出了改刊的决定，林朗在友好报的一次編委会上竟公开地抗拒說：中央不了解情况，我們不忙着手改版的筹备工作，先收集一些情况供中央考虑改变决定。他还借口技术上的困难，把改刊决定拖延两月之久，直到中央联絡部一再催促之后，才仓促在10月1日改刊。改刊后，林朗又指示在讀者来信摘要上，大量选刊讀者不同意改周刊的意見，妄圖以此来与中央对抗和迫使中央修改中央已經作出的决定。

4、林朗执行資产阶級的組織路綫和"用人唯亲、用人唯不賢"的家天下的幹部政策，抗拒中央"有反必肃"的方針，在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及俄文友好报取消无产阶級专政，实現資本主义复辟。

林朗在总会及俄文友好报对坚持党的正确路綫和維护党的利益的同志，千方百計地排斥打击，要把这些人擠走；而对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党分子、自首变节分子、坏分子却体貼入微，关怀备至，把这些人安插在重要工作崗位甚至党的要害部門。林朗在友好报一手包庇和重用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叛党分子达八人之多。在很多部門插上了白旗，拔掉了紅旗。

林朗为了拉攏幹部，培植亲信，完全破坏党的組織原則，任意扩大閱讀內部文件的范围，特别恶毒的是，党內許多重要传达报告，如传达党中央南宁会議、成都会議、武汉会議的內容时，吸收叛徒夏牧原、反革命分子楊金涛和其他一些历史复杂的非党員参加。

林朗和庄方長期以来操縱和把持了友好报党的支部，在他們担任前后两届支部書記期間，对思想落后、品質恶劣的人从不进行教育，而且还計划把一些思想極端落后、对党不滿、品質恶劣的人拉进党內来。

一九五五年全国肃反时，林朗以俄文友好报是新建立的机关，問題不多为借口，抗拒中央“有反必肃”的方針，在俄文友好报不把肃反作为群众运动来进行，以审幹代替肃反。林朗在一九五七年友好报作整風动員报告时，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說：“俄文友好报沒有进行肃反，問題不大，别的机关問題很多，就是因为肃反的遺留問題”。在他的包庇和寬容下，反革命分子逍遙法外。在总会，在他所領导的翻案小組的策动下，肃反中畏罪自杀的叛党分子刘瑞祥的妻子王淑兰曾到总会控訴我們的肃反斗爭，說肃反把她的爱人害死了，这个会是林朗領导的肃反翻案小組主持的，林朗事前已知道此事但並不加制止，事后还認为王淑兰沒有在会上鬧起来，“表現很好”，因此發給她补助金一千元。

林朗反党是有他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林朗出身于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抱着个人野心混入党內，入党后又拒絕党对他的教育和改造。他的反党是一貫的和多方面的：他一貫反对本单位的領导，一貫抗拒上級党委和中央的領导，一貫无組織、无紀律、个人决定一切，一貫抗拒执行党的組織路綫和幹部政策，一貫坚持資产阶級立場，一貫追求資产阶級生活享受，一貫抗拒思想改造。

林朗是一个資产阶級極端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家，他的个人

野心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当党对他的信任越高，給予他以更多更大职权时，他不但不兢兢业业，来完成党对他的付托，相反地，他利用这些职权，变本加厉地进行多方面的反党活动，以致今天堕落成为右派分子。

在中央宣传部六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召开了揭發和批判林朗反党罪行的会議后，林朗的态度極不老实。他回到友好报来还繼續活动，找人談話，散布流言蜚語，企圖拉攏人，爭取同情；並曾一度悲观失望，有过自杀的念头。在总会及其友好报党員幹部大会上，对林朗的罪行繼續深入揭發和批判后，他的态度稍有轉变，在会上先后作了三次检查。这些检查虽稍有进展，但总的来說，仍然是不老实的，沒有向党交心。他不具体交代他的反党阴謀活动，在許多重要問題上，仍避重就輕。他沒有积極交代自己的罪行和揭發別人的材料。

处理意見：根据林朗所犯的罪行，应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降五級（由九級降为十四級）下放参加劳动。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中共中苏友好协会总支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廖經天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党支部根据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整風領导小組作出的“关于右派分子廖經天的政治結論”，为了严肃党紀和純潔党的队伍，決定开除右派分子廖經天的党籍，

附：中苏友好协会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右派分子廖經天的政治結論

廖經天，男，四十六岁，广东省梅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一九三九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習。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間，历任延安解放日报研究員，群众日报（原冀热辽日报）付总編輯，北京市委宣传部編审科长，长沙新湖南日报付总編輯。一九五〇年任广西日报社长。一九五二年任人民日报付总編輯。一九五三年五月調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任党組付書記、第一付秘書长。

主要反动言行：

1、廖經天抗拒执行中央对友协方針的指示，长期进行反党活动。廖經天来中苏友协总会后，在一九五四年一月，友协全国宣传工作会議上，提出一个不切实际的友协宣传工作方針："面向工农、面向生产、密切結合各个时期和各个部門的中心工作，介紹苏联先进生产經驗。"企圖大搞一番。由于这个方針在中宣部部务会議上討論时未被批准，廖經天便心怀不滿，污蔑中宣部領导同志，說："个别領导同志憑印象發表一些意見，既不見得中肯，也不解决問題。"自此他就开始消極对抗，长期不做工作，向人表示要"鬧到撤职查办完事！"一九五六年二月，拒絕参加总会召开的友协工作規划座談会。四月，錢俊瑞同志主持的党組会，批評了他的消極情緒，他立即給錢俊瑞同志寫了抗議信，对錢及其他領导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八月，友协总会党組研究友协方針任务問題期間，廖經天認为中苏友协沒有什么工作可作，主张只要掛个牌子以照顧政治影响。这实际上是取消中苏友协。一九五七年二月，中央批准了总会党組"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問題的报告"。在这个文件中，明确指出：認为中苏友协今后沒

有什么工作可做甚至取消的想法是錯誤的。这与廖經天实际上取消友协的主张毫无共同之处，而他竟恬不知恥地說，中央批准的这文件，就是根据他的意見写出来的。

廖經天还进一步攻击中央，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友协总会党組扩大会上說：一九五三年中苏友协組織形式轉变以后，中央确定友协为宣传机构，是錯誤的；一九五四年一月友协全国宣传工作会議上确定的方針，就是在这个錯誤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廖經天向全机关工作人員作的整風动員报告，重述了上述这个論点。他是有意的把錯誤归于中央，煽动群众对中央不满，煽动群众反党。

二、廖經天长期以来，有意識、有目的地制造种种流言蜚語，向党进攻。他經常以友协总会党組書記与付書記"职責不清"为借口，多次攻击錢俊瑞同志和党組其他同志。說："錢又管又不管"，"我这个党組付書記倒底向誰負責？我算什么实际負責人？"又說："我的所謂总的領导重任，就只好成为供在神龕上的牌位"。还說："我甘願做赵仲池第二"（按指宗派排挤）。

一九五六年八月，友协总会研究友协方針任务时期，散布他实际上取消中苏友协的荒謬主张，以此来拉攏一批有反党思想的人，如赵洛生、印石等，一道兴風作浪，攻击党，攻击領导。在他的影响、縱容与支持下，在总会形成了一个由他掛帅的反党大联合，其成員有李林、欧阳惠（已划为右派分子）、赵洛生（已划为右派分子）、印石等人。这个反党大联合于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六日由四个党員（欧阳惠、赵洛生、寿航、焦野），書面給少奇同志写了一份反党的报告（李林出謀划策，廖經天也是支持的）。污蔑和攻击党的領导。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五月，总会党組扩大会檢查工作，廖經天在会上談，他是受宗派迫害的，他自比为旧社会的县太爷，而其他領导同志則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凡事都得通过他們，否則这个县太爷就做不下去。在廖經天的支持下，这些人又从总会的方針任务、幹部政策、領导关系等三个方

面向党进行了猛烈的全面攻击和阴謀活动。

三、整風鳴放时期，廖經天与林朗共謀，有計划、有組織、有目的地进行了反党阴謀活动。廖經天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当資产阶級右派向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便和党內外的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糾合在一起，里应外合地向党进行了悪毒的攻击。

（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廖經天与林朗共謀拟定他們的反党綱領——所謂“整風計划”。在这个反党綱領中指出：首先应集中力量揭露与解決机关內部矛盾——領导同志之間的矛盾；領导与被領导之間的矛盾；党群关系問題。並乘机在方針任务問題上追查責任，企圖将斗爭鋒芒引向攻击党的領导。

（2）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廖經天在总会全机关人員的大会上下了反党的动員令（即所謂整風动員报告）極其悪毒的煽动說：“总会早就存在着所謂无形的頑固堡垒”；“部分領导同志有宗派主义情緒，錢俊瑞同志也有偏听偏信。……”說这个宗派中的成員“互相吹嘘，对錢歌功頌德”，“錢掛名，叫廖負实际責任，而实际上，有許多工作是錢直接抓，使廖不好工作”。进而污蔑領导同志是“憑資格职权，發号施令；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更悪毒的是污蔑党的幹部政策是“用人唯亲，用人唯党，用人唯不賢”。污蔑党处理有政治問題的人“不严肃，……使他們长期背包袱”，並丑化党群关系。廖經天的这个“整風动員报告”，是事先与林朗討論並且經他同意的。

（3）六月一日，廖經天又在中苏友好报整風小組会上两次發言，进一步悪毒地攻击錢俊瑞同志和所謂“頑固堡垒”，自称他在总会完全是有职无权的，把自己装扮成受宗派排挤的人，以此騙取群众的同情，煽动群众对領导的不滿。

（4）与林朗共謀，採取了一系列的反党的組織措施。提出整風墙报不受党支部的領导；墙报編委会“民选”；整風小組付組长“民选”；成立三反、严反、幹部工作、領导关系等四个“調查研究小組”（实际是翻案小組），收攻右派分子，严重右

傾分子和未定案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参加这些小組工作；召开了肃反中畏罪自杀的刘瑞祥家属王淑兰向党进攻的控訴会；派人外出訪問收集反党材料；在墙报上發表了"赵仲池訪問記"，（赵过去是总会副总幹事，他認为赵調出总会是被以錢俊瑞同志为首的宗派排挤走的。）等許多攻击党的文章；将外調人員調回鳴放，以助长反党声势。如张再回会狂妄叫囂，要錢俊瑞同志下台，召开各种反党的座談会；如所謂"实力派"座談会，"楊李路綫"座談会等等，进一步增强反党气焰；他对翁恒生的反动文章"再論我們的問題所在"倍加贊揚，一再鼓动他在墙报上發表；排斥党員和积極分子参加整風办公室工作，而吸收一批一向对党不滿的人参加整風办公室工作。通过这些反党的組織措施，总会內部一时烏云蔽天，党內外右派分子更为猖狂。五月二十三日發生了由党內右派分子欧阳惠煽动和組織的鬧大民主事件。党团积極分子和維护党的利益的同志遭受到无情打击。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級在总会的領导权实际上被推翻了，資产阶級在总会实际上复辟了。在这个期間廖經天实际上扮演了可恥的納吉角色。

本人在斗爭中的态度：廖經天的問題，早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便已提出来要他检討，但在将近十个月的斗爭过程中，他的态度一直極不老实，不願眞誠交代自己的反党阴謀活动。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日总会整風領导小組宣布經中宣部批准的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他毫无沉痛表現，反而輕松愉快。

处理意見：廖經天反党情节極为严重，在这次斗爭中态度極不老实，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降級（从十級降为十五級）。下放参加劳动。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中共鉄路工会全国委員会办公室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学增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王学增，男，三十九岁，工人成份，一九四六年入党，历任齐鉄检車段长、鉄路工会錦州区委員会副主席、东北地区委員会副主席。原任鉄路工会全国委員会副主席，已于一九五八年四月第二屆第五次全体委員会上决議撤消其副主席及委員的职务。

王学增的主要右派言行是：

1.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我国建設事业。污蔑我国建設鉄路用“人海战术”，“赶节日通車造成工伤死亡多”。污蔑对修路工人是用“半軍事化管制，吃飯还得喊口号”，是以“打、駡、捆、綁、扣政治帽子等手段整服工人”，並說：这和資本主义压迫工人的手段，警察、棍棒和失业一样。他还将我們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比作秦始皇的統制，他說：“过去孟姜女哭长城，現在鉄路工人家屬哭鉄路。”

2.反对党对工会的領导，攻击党的工运方針。他說：“党对工会管的多了”，“党的基層組織水平低，不能發揮工会的組織作用，这是党的組織建設問題沒有解决的緣故”。污蔑党不能領导工会，說“党对工会的干涉，限制了工会發揮作用”，“工会地位摆的不当，与行政說不上話”，提出“工会监督要有法律保障”，因此他又說：“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組扩大会議决議有問題，特別是在鉄路系統中貫徹这个决議——反經济主义、反工团主义，不应該，搞糟了，副作用很大，一直沒有緩过气来。来自

党内的压力很大，”他还在河南第二工程区工会幹部大会上說：“关心生活是工会刻不容緩的責任”，“生活改善是刺激生产的动力”，到处号召工会幹部“要学習況鍾的精神，不要怕丢烏紗帽”，“不要怕天下大乱”，並說“我同意讓工人鬧事，好教育教育官僚主义者”。

3.煽風点火，否定鉄路工会全国委員会的工作成績。他在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間，在北戴河煽动工作組幹部，捏造、污蔑党組說：“全委几年来的主要文件都不能說明問題，都不能反映鉄路的情况。”污蔑党組“不关心工人生活”，把党組貫徹一九五一年全总党組扩大会議决議，污蔑为“靠教条主义吃飯”，他說：“全国委員会是靠鉄道部吃飯，靠全总吃飯。”他身为党組成員，却有意在幹部中大肆污蔑王志杰同志，以树立个人“威信”，挑撥党組与幹部的关系。

4.攻击党的幹部政策，污蔑工会組織部門。他污蔑党的幹部政策是“論資格、排輩数，是家理教”，駡老幹部是“老油条”，“老也不值錢”，“专凭資格領导”。将党对他的培养和信任說成是党利用他“当牌位、当傀儡”，是“撑門面，有职无权”。将幹部写实工作制度，污蔑为“特务政策”，是“从貝利亚那里学来的”。污蔑組織部門“凌駕在主席团之上”。

5.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当右派分子在鳴放会上污蔑党員幹部是“拦路虎”时，他附和支持說：“要反拦路虎，得先反飼养員（指党組）”。他听了鉄道部党外人士坐談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發言后，說“真受感动，又上了一課”。他还进一步煽动說：“全委机关問題可大了，不得了！”当我們反击右派分子的斗爭开始后，他發現右派分子的言論中，許多都是他供給的子弹，他就为右派分子冷嘲等打掩护。

王学增是一个有目的、有計划、有步驟並有修正主义理論，长期拒絕改造，隐藏在党内的个人主义野心家。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造成的恶果是極严重的，他是一个隐藏

在党內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

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中共中国鉄路工会全国委員会办公室支部委員会，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召开了支部全体党員大会，充分討論了右派分子王学增的反党事实，一致决議，开除右派分子王学增的党籍。

中共教育部临时党組、教育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展开反对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斗爭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

柳湜，原名柳克立，男，五十五岁，湖南长沙人。家庭出身貧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八年入党，同年在安徽蕪湖被国民党公安局逮捕，一九三三年释放出獄。历任上海申报流通圖書館讀書指导員，讀書生活編輯，上海生活星期刊編輯，汉口全民周刊主編，重庆全民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周刊主編、陝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冀中行署教育厅长，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視导司长，师范教育司长，"人民教育"总編輯，教育部副部长等职。

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言行，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对党的肃反运动、反右斗爭及其它政治运动。

柳湜站在資产阶級右派知識分子的立場，对党的肃反运动非常抵触和反对。在肃反运动期間，他不积極参加斗爭，后来却到各地对肃反进行恶意的攻击，打击群众和幹部的积極性，为反革命分子"伸冤"、"平反"，甚至庇护他們。一九五六年五月他到华东視察时，向华东师范大学民主党派人士講話，說"三反、

肃反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搞錯了，积極不起来。反革命分子只要努力，一样可以当英雄模范”。同年六月他在华南师范学院視察时，更猖狂地进行了反对肃反运动的罪恶活动。他“批評”該院党委搞肃反是“不务正业”，“批評”該院肃反面过宽，善后工作不好，执行知識分子政策粗暴。他很关心反革命分子廖經揚的自杀事件，向廖的弟弟說，此事已交由广东省委負責处理，意在为廖伸冤。柳湜的这种行动，大大損害了学校党組織的威信，助长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到去年大鳴大放时，該院右派分子竟借廖經揚事件，要求法办領导該院肃反工作的党委正、副書記徐霽远和楊友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柳到广西师范学院視察，在該院召开党員大会时，柳指示要吸收所有系主任和民主党派負責人参加大会。他当着肃反对象“批評”了学校的肃反工作有錯誤，善后工作不徹底，並要学校在原斗爭場合向有历史政治問題的賀祥麟（现为右派）肖厚德（现为坏分子）等道歉，进行“平反”。柳湜还庇护反革命分子。例如：反革命分子黄德安刚从监獄出来不久，他即以个人名义介紹黄到教师报社工作，並为黄吹嘘。北京师范大学的反革命分子謝䜣，一九五〇年入校时被發現有严重的特务嫌疑，一九五三年校方拟令謝休学，謝向柳申訴后，柳責成校方仍給予助学金，不使休学。

在反右派斗爭中，柳湜的反党言行也很突出。他採取两面态度，抗拒党的反右派斗爭，坚决同党对立。他一面借口有病，迴避参加整風和反右派斗爭；一面散布不利于反右派斗爭的言論，为右派分子鳴不平，並且支持包庇右派分子。中央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四日和五月十六日两个指示中，已經明确指出，在大鳴大放中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緒的人企圖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錯誤方向去，应准备回击右派。而柳看了这两个指示以后，还一再把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況說成是“正常的現象”。同年六月七日他还在原高等师范教育司全体幹部会上說：“章乃器仍屬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柳湜还为

一些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辯护。他說林汉达不应划为右派；說有些被划成右派的青年人向中央写信提意见，縱然意見是錯誤的，也不应划为右派。更严重的是他在反右斗爭中支持原高等师范教育司領导小組的右傾思想，对右派分子张月加以保护。高师司在反右斗爭中表現了严重的右傾，部領导小組曾給予批評。柳却为高师司領导小組辯护，支持和助长了他們的右傾。高师司右派分子张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很完整，在大鳴大放时对党的人事制度进行攻击。柳湜身为部領导小組成員，却採取两面态度，一面对部領导小組的其他个别成員表示应划张月为右派，一面又在背后支持高师司領导小組，一再要他們坚持不划张月为右派的意见，实际上是在破坏反右派斗爭，对张月加以保护。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派斗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以后，刘墉如、何錫麟同志向柳湜談到北京师范大学反右成績和“师大教学”（校刊）上有关駁斥右派分子的文章时，柳却說：“这些文章，右派分子还不会心服吧！”这也反映了柳湜对反右派斗爭抗拒和不服气的心情。

柳湜对其它政治运动，也抱有不同程度的消極、反对态度。他反对对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只强调知識分子的好处和作用，强調对知識分子团結和照顧，正如他自己所承認的：他总跟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站在同一立場，跟他們有共同的情感，当他們受到打击，就好象痛在自己心上一样”。他反对用运动的方法改造思想，認为这会伤害知識分子的自尊心，引起他們的反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問題。他反对沈阳高等学校在教师中举行思想展覽，告訴“教师报”、“人民教育”不要宣传。他一再强調說，从今以后不搞运动了，反对把社会斗爭、农村斗爭、工厂斗爭的領导方法搬到学校来。一九五五年党中央号召批判唯心主义，原教育部党組决定批判杜威思想，指定柳湜負責，而柳湜则消極应付。他認为“杜威思想有可取之处”。对北京师范大学朱啓賢、陈友松（現在都是右派分子）在批判杜威的座談会上宣揚杜威的

言論，絲毫未加批駁。

（二）在教育工作上，主张由民主党派和資产阶級专家領导，反对党的領导。反对走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主张走資本主义教育的道路。

一九五六年，当国际上出现反共高潮和修正主义思潮时，柳在各地通过座談、报告、写文章，發表了一系列的反对党領导教育工作的反动言論。他反对学校实行党委制。他把学校党組織看成为一般的社会团体，主张把党組織放在院校长监督之下。主张党委工作主要是保証教学，不是另搞一套。那么，靠誰来領导学校呢？他先后在原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师范教育会議上，在視察华南、江西等师范学院时，在与民主人士談話中，一再主张靠民主党派和資产阶級专家来領导。說"高师大多数教授是民主人士，这是高师的命根子"，"民主党派应該监督学校內的党"，並說"学院办不好，民主党派要負責任，这是任务"。他在章伯鈞主持的部分高师盟員院校长座談会上說，"高等师范院校的命脈就掌握在你們的手里"。他又說，"学校工作有阴暗面，主要是領导思想沒有明确依靠着老教授办学"。在学校已經建立了党的領导的地方，柳湜则恶毒地攻击学校的党組織，把学校产生矛盾的根源和学校工作中的缺点，都归罪于学校党的領导，归根于党委不懂办教育和党委負責人对党外人士粗暴、不民主。他多次强調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不是两条道路的斗爭，而是領导与被領导之間的矛盾。又說，学校內領导与被領导的矛盾是"生产关系妨碍了生产力"。即党的領导（"生产关系"）妨碍了教授能力（"生产力"）的發展。这种恶毒的攻击，目的在于要把已經建立了的党的領导取消。

柳湜反对党对教育工作的領导，不仅有言論，而且有行动。他到各地不断进行了拔紅旗、插白旗的勾当。华南师范学院党委書記工作有缺点，省委曾决定于适当时机調动他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柳到华南师院視察时，偏听老教授的意見，激动地、夸大地

向广东省委反映該院党委書記坏透了，副書記作風也不好，主张馬上撤党委書記的职，並調动副書記的工作，說什么"否則大家都不願幹了，学校就无法再办下去了"。那次視察結束时，他在該院全体大会上作了总結講話。講話中对学校党組織作了恶毒的攻击，严重地打击了学校党組織的威信，为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和一切不满党的人撑了腰。致使党的工作同志和一些积極分子都抬不起头来，而反动分子的气焰，則囂张到了極点。当以后省委派人到該院宣布院党委書記撤职、副書記調动工作时，黄明慧（現为右派）竟高举拳头大喊"今天是华南师院的校庆"，"是学校第二次解放"，並要求把当天定为校庆日。后来該院黄明慧、廖华揚（現皆为右派）到北京参观时，柳湜竟对他們說："如不把你院两塊大石头搬掉，华南师范学院是办不好的"。在福建，柳湜听信福建师范学院余宝笙（現为右派分子）等反映，先向院領导提出将該院党委副書記张立同志撤职的意見，后来又向省委建議将张調离学校。柳湜听信了鍾敬文、傅种孙（現皆为右派）等人的反映，将北京师范大学党員教务长丁浩川同志調走了；还多次揚言，要将該校党員副校長兼党委書記何錫麟同志撤职。他極力主张提拔党外人士甚至右派分子作院校的領导人。

（三）抗拒党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批評，藐視地方党委，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由于柳湜坚持資产阶級右派知識分子的立場，所以他对党的領导，对党的方針政策，处处表現抵触和反对。主席提出了"应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覚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針后，他說这个方針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他抗拒中央对教育部的批評。一九五七年春，董純才同志在原教育部党員大会上講話，传达中央精簡节約指示和中央对原教育部的批評，会后，柳湜对中央的批評置若罔聞，还在支部大会上攻击說："如果我不是党員就听不下去"，並責問董是以什么身份在党員大会上講話的。

他歪曲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他为了迁就照顧資产阶級知識分子而抵制党的勤俭办学的方針，反对把师范院校內迁和反对把师范院校下放。他对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可以无話不談，甚至对华南师范学院老教授公开談論該院党委書記的档案材料。正因为如此，柳湜得到了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的賞識和称道。曾昭掄說："教育部只有柳湜这个人好些"。华南师范学院一个右派教授陈子明說："柳副部长对我們很亲切，甚至一些內部的話也和我們說了。柳这些話，在許多党內負責同志都不易听到的。"又該院講师卢天裕說："这些年来，我仅听过一个好报告，就是柳湜副部长的报告，大快人心，听之忘倦"。

他藐視地方党委，反对把学校置于地方党委直接領导之下。他反对把师范院校下放，認为地方党委領导不了高等院校。他捏造說："江西师院学生鬧事，省委与学校党委一籌莫展，風潮一直鬧了几个月不能平息，我向学生作了一次报告才把学生說服了"。其实，事实並非如此。他到处批評学校的房子、設备不好，随便許願；並慫恿教师到省委去爭吵，造成地方党政工作上許多困难。他不通过地方党委，就直接解决学校的問題，造成学校和教师对地方党、政的不滿和不尊重。

柳湜对教育部党組长期鬧分裂活动。在董純才同志未来部前，他召集三次会議，在部分司长幹部中散布对董不利的話，並要黄嘯曾向習仲勛同志反映，以拒絕董来部。董来原教育部任党組書記后，柳即工作消極，先后利用前办公厅主任黄嘯曾、原高师司司长李实、原中学司司长侯俊岩等的对党不滿和其他弱点，形成宗派，反对党組和董純才同志的領导。柳又利用部內群众对董不滿的情緒，通过支部会議等合法形式煽动群众反对董純才同志，甚至說："不要怕，鬧不出匈牙利事件来"。党組副書記陈曾固同志初来教育部时，柳就背后散布陈不懂业务，是外行。以后又造謠說陈对董不支持，說董受到中央批評，可能是陈向中央反映了董的問題。

柳湜自己检討說，他在全国解放以后对自己的工作地位是不滿意的，对于解放初期未当上副部长，未当上人大代表，后来他的位置又被放在董純才同志之下，他都不滿意。所以，柳在原教育部的反党分裂活动不仅反映了他的个人主义野心，也反映了他对中央的不滿。

根据这次揭發的全部材料看，柳湜的反党罪行不是偶然的。他原来是一个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他的思想浸透了資产阶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具有牢固的資产阶級立場和观点，具有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入党以后，长期沒有得到改造，所以，他长期同党有矛盾。民主革命一关，他就沒有过好。他在延安任边区政府教育厅长时，以民主人士身份（柳当时是秘密党員），向党爭教育上的財权、人权独立，未成，就掛冠而去；他审查課本，把"边区好"、"八路軍好"、"孔二小姐"（揭露四大家族揮霍民脂民膏的糜烂生活）等課文刪掉，說是有碍統战工作；他叫人把美軍新聞处的材料散發各县；听信米脂某小学校长（土紳）的意見，坚决主张将該校党員教导主任撤职；等等。但是当时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同党的矛盾还不突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資产阶級同无产阶級的矛盾已經成为主要矛盾，由于他还坚持資产阶級立場，他同党的矛盾就發展到显明的对立。他对党的方針政策处处抵触，对新社会的新事物格格不入。一九五六年，在国际上出現了反共高潮和修正主义思潮，在国內他又从資产阶級右派的立場观点曲解了党所提出的百家爭鳴、长期共存、团結知識分子和向科学进軍等方針政策，他覚得形势对他有利，就积極起来，代表資产阶級右派知識分子向党反击。首先是攻击党的肃反运动和对知識分子改造的政策。他到处去"視察"、講話，肆无忌憚地大放謬論。这是柳湜在一九五六年前后猖狂反党的主要原因和背景。一九五七年，当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展开以后，革命的鋒芒指向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时候，柳湜更感到切膚之痛，他同党的对立就更加尖

銳了。他一方面消極躲閃，不參加反右斗爭，另一方面，却积極抵抗，为右派分子辯护，支持和庇护右派分子。这些，是柳湜坚持資产阶級立場的必然結果。柳湜长期保持着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他把党当作个人追逐名誉地位的工具。到延安时，他自以为在白区作文化工作有功，是一个高級知識分子，竟以民主人士自居，对党分庭抗礼。全国胜利以后，他的个人主义野心更加發展。他对于党所分配他的工作地位不滿足，同民主党派負責人比地位，同曾任过陝甘宁边区政府厅长的其他同志比地位。当个人願望一再得不到滿足的时候，他对党的不滿就不断增长。由于柳湜长期坚持資产阶級立場和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他同党的关系长期矛盾，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而發展到同党对立，最后就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可耻的道路。

柳湜反党反社会主义問題被揭發以后，他前后共检討了四次。前三次检討态度不老实，不肯主动交代問題。后来，經过群众的严肃揭發和斗爭，經过領导同志对他的不断批評和帮助，最后一次检討，已經被迫低头認罪，承認了自己的主要罪行，对自己的錯誤进行了检查，有了一定的認識，並表示願意悔改。

我們認为，柳湜是一个隐藏在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資产阶級右派知識分子在党內的代理人。他的問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質，他是一个党內的右派分子。按柳湜問題的性質和他的检討态度，我們認为，应該开除其党籍，撤消其行政职务，降級，另行分配工作。

中央批示：同意开除柳湜的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級，另行分配工作。

中共中国人民銀行总行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尙明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

尙明，男，四十二岁，河南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高中程度，一九三八年入党，現任中国人民銀行总行办公厅主任。

历史上主要問題：在中学时期参加反动組織复兴社（一九四四年在延安中央党校根据本人交代作过結論）。一九五六年为包庇国外局前局长詹武錯誤，受到撤消党內职务的处分，后因崔光等包庇詹武翻案，处分未能执行。

一、主要反动言行

1.攻击历次政治运动，反对思想改造。尙明在受处分后，对党极为不满。發現崔光企圖包庇詹武等翻案，就更加肆无忌惮的进行翻案活动。一九五七年一月份，利用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总結的时机，在党內会議上大肆誣蔑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是“蛮不講理，仗势欺人”。說：“运动是靠优势和声势解决問題”；运动一来就“不能解释”，“不允許解释”。他說在国外局案件中对他的批評和处分是“落井下石”。他攻击領导上領导运动都是为着应付上級，任务观点，只顧当时交差，不管遺留問題。他認为历次运动付作用很大“被批評的人抬不起头来”，“有的人也感到不知那天算到自己头上”。大鳴大放时右派分子朱紹文誣蔑政治运动，大駡共产党，他竟說：“我們过去斗爭人家时，比人家現在駡的厉害的多。”

2.利用各种場合运用各种手法，散布右派言論，向党进攻。

总行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他利用起草"統战总結报告"和"总結發言"的机会，系統的散布了大量右派言論。他誣蔑历次政治运动滋长了党內的宗派主义，严重的阻碍了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积極性的發揮，並故意誣蔑說："为什么对政治历史上沒有怀疑的人政治上还不信任？为什么相同的国家幹部，党与非党却有不同的权力和权利？……答案只有一个，宗派主义。"

在党代表小組長联席会上，他还将从民主党派座談会上收集来的大量右派言論，借向党員"透气"为名，向党員大肆传播，攻击党的历次政治运动是："过去社会地位越高，社会关系越复杂的知識分子，被斗爭越厉害"，他們的心情是："欲哭不哀，虽笑不乐"，他們本来是"資产"，将他們当"負債"。将知識分子当"弼馬溫"，免不了要大鬧天宮。誣蔑党群关系是解放后不如解放前，三反后不如三反前，肃反后不如肃反前，他还在办公厅支部大会上动員鳴放时，宣传这种反动言論，並說："你不讓人家說，人家就会到街上去說，就会造成匈牙利事件。"他威胁党員幹部說："如果誰听了这些群众的話睡不着覚的时候，就請他吃点安眠葯。"

3.極力包庇右派，打击陷害积極分子。他是总行整風領导小組成員，分工領导国外局整風运动。在反右斗爭中，他为了坚持翻案抗拒上級党委，在他和崔光、乔培新、尹志海等反党分子的庇护下，国外局漏掉了成批右派分子。但是，对反对包庇詹武翻案的积極分子苏世銘，则利用右派分子对苏进攻的机会（苏离婚后与一女党員顧肇堺恋爱，婚前怀孕），进行打击陷害。他和国外局被反党分子所把持的領导小組共謀，在斗爭苏世銘的群众大会上，公然摘掉右派分子胡元民的右派帽子，来發动右派向苏世銘进攻。为了打击苏、顧，制造罪名，国外局反党分子尹志海等还强迫苏与前妻叶秀梅复婚，复婚后因感情无法恢复，又去西四法院申請离婚。在西四法院正在审理的过程中，尹志海等又慫恿叶秀梅向东单法院誣告苏、顧破坏婚姻法，妨害家庭。当西四法

院已經弄清过去强迫苏与叶复婚不对，准备判处离婚，来行征求組織意見时，尙明和尹志海、王彬等共同策划，要西四法院从緩判离，候东单法院对苏、顧判刑后再处理苏、叶离婚問題，以免在斗爭苏、顧过程中陷于被动。苏世銘被陷害开除党籍、东单法院判处拘役緩期执行后，尙明还說："苏如悔改不好，党票下了，再下他的飯票。"

二、斗爭中的态度

經过群众的斗爭批判，尙能認識其罪恶，願意悔改。

三、結論和处分决定

根据以上情节，尙明应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上並按第五类处理，降职、降級、降薪。

中共中国人民銀行总行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詹武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

詹武，男，三十九岁，浙江温岭县人，家庭出身小地主，本人成分学生，高中肄业，一九三八年入党。前中国人民銀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兼中国銀行副总經理，一九五六年免去局长职务。

（一）历史上主要問題

（1）詹武在任国外业务管理局局长期間，因严重右傾，重用有政治嫌疑的旧人員，一味庇护，不讓进行审查和改造，結成宗派集团，抗拒上級检查，对批評者施行打击报复，反党反領导，給予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后因詹武进行的翻案活动，得到崔光等人的支持，处分未能执行。

（2）曾利用职权，介紹其姊夫刘羽阶（恶霸地主，鎮反中被鎮压）参加工作，以后又为他的兒子刘秉彝伪造历史，冒充中国銀行幹部，介紹到北大学習，在整風运动中刘秉彝被揭發为政治騙子，極右分子。

（二）主要反动言行

（1）堅持錯誤，拒絕改造，进行反党活动。詹武受处分后，对党極为不满，玩弄两面手法，反抗党的决定。当党代表会議处理他的錯誤时，他表面上承認了錯誤，作了"检討"；但会議結束不久，他就到处活动，散布流言蜚語，积極进行翻案和反党活动。他造謠說，中央要为他平反。又鼓动其反党集团分子堅持錯誤，和他一起翻案。还造謠說："某人在一九四二年整風时，眼看要拉出去槍斃，也不瞎說，現在还不是負責幹部！"要他們也要"經得起时間考驗"。

（2）在大鳴大放期間，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整風开始后，右派分子大肆向党發动进攻，詹武、夏鳴（詹的爱人，也是反党集团为首分子。）进行翻案的阴謀活动中所散布的流言蜚語，也成为他們向党进攻的借口。右派分子出了不少攻击党的大字报，还貼出"联合宣言"，叫囂要为詹武等平反，拥护詹武等上台。他們說："詹武、夏鳴是共产党內宗派主义的受害者"；說："肃反运动偏差是主要的。"等，要党限期答复，否則上街鬧事。这时詹武等也利用右派进攻的时机，推波助瀾，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煽动群众向党进攻，詹武还在总支大会上带头攻击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及其检査組，誣蔑检査組是"逼供信"，是"捏造材料，欺騙中央"。接着党內右派分子也一擁而上，替詹武叫"寃"，攻击历次政治运动，特別是肃反运动，气焰十分囂张。

（三）斗爭中的态度：一九五七年反右后，仍不向党低头認罪，直到現在，他仍堅持錯誤，态度很坏。

（四）結論和处分决定：根据以上情节，詹武应划为右派分

子，开除党籍，行政上按第二类处理，撤消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中共中国人民銀行总行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夏鳴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二月五日）

夏鳴，女，三十九岁，沈阳人，家庭出身房屋出租者，本人成分学生，高中肄业，一九三八年入党，前中国人民銀行总行国外业务管理局付局长，一九五六年停职，分配在計划司工作。

历史上主要問題：夏鳴在任国外业务管理局付局长期間，和詹武（夏的爱人）一起，犯了严重右傾、重用有政治嫌疑的旧人員、一味庇护、不讓进行审查和改造、結成宗派集团，抗拒上級检查，对批評者施行打击报复，反党反領导的錯誤，給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后因詹武、夏鳴进行的翻案活动得到崔光等人的支持，处分未能执行。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和詹武勾結一起，堅持錯誤，拒絕改造，进行反党活动。夏鳴受处分后，对党極为不满，和詹武一起，到处散布流言蜚語，籠絡詹武反党集团分子，积極进行翻案和反党活动。她誣蔑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检查組“主观片面”，“处理案件不符合八大精神”。並阻止反党集团分子向党承認錯誤，說：“反党是政治問題，不能随便加的”，“过去承認錯誤了，今后可别再这样了，不然以后会被动的”，

（2）大鳴大放期間，与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整風开始以后，右派分子大肆向党發动进攻，詹武、夏鳴进行翻案的阴謀活动中所散布的流言蜚語也成为他們向党进攻的借口。右派分

子出了不少攻击党的大字报，为詹武等叫“寃”（其中有些是用鸣字的化名写的），說“詹武、夏鸣是共产党內宗派主义的受害者”。誣蔑检查詹案的积極分子是宗派集团。夏鸣就兴高彩烈地跑回国外业务管理局去看大字报，当右派分子徐静波問她：“夏局长怎么不鸣放啊？”夏鸣就当众指着大字报說：“这些鸣字的大字报不都等于是我鸣的嗎！”夏鸣还幸災乐禍地說：“看看国外局鬧成什么样子，誰是誰非，現在还看不明白嗎？”夏鸣还夸大捏造国外业务管理局新領导的缺点，煽动党員鳴放。

（二）斗爭中的态度：一九五七年反右后，仍不向党低头認罪，直到現在，她仍堅持錯誤，态度很坏。

（三）結論和处分决定：根据以上情节，夏鸣应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上按第二类处理，撤銷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中共广播事业局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温济澤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八日）

温济澤（曾用名温諒文、温济直），男，現年四十四岁，江苏省淮阴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〇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六年轉为共产党員。現任广播事业局党組幹事、副局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編委会委員、副总編輯。

温济澤是一个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家，入党后长期抗拒改造，胜利后更严重蛻化，丧失了共产党員应有的立場和品質。在他分工負責对外广播工作时期，他和邹晓青、张紀明結成反党小

集团，带头反对党的領导，以修正主义、右傾机会主义的观点篡改了党在对外广播中的政治方向，提倡資产阶級的新聞观点和文艺观点；在外事工作中，目无組織不守紀律，而且严重丧失阶級立場和民族立場，表現了投降主义和奴才相；在組織上，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以非組織的手段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将对外广播部門变成他們的独立王国，在整風反右期間，温济澤又阻挠和抗拒整風运动和反右斗爭，同情和包庇右派分子。由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温济澤已墮落成为国內外資产阶級在我們党內的代理人，成为一个右派分子。

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表現

（一）在宣传方面

在对外广播宣传中，以温济澤为首的反党小集团篡改了党的政治方向，以修正主义的、右傾机会主义的观点代替了馬列主义，以資产阶級的立場代替了党的无产阶級的立場。他反对宣传党的領导，在許多对外广播的稿件上删去了“党的領导”的字句。他不准选送歌頌領袖的歌曲出国，甚至“桂花开幸福来”等民歌也在被禁之列。在宣传上經常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和規定。例如对台灣的宣传，他不許揭露蔣介石集团的卖国残民的罪行，而签發贊揚蔣氏父子“有民族气节”的稿件。在少奇同志指示可以作适当的揭露以后，他竟然繼續反对揭露蔣介石卖国集团的罪行。去年鳴放期間，中央規定对外不报道右派言論，温在口头上也說不报道，但实际上並未执行，以致对外广播大量地报道了右派分子言論，而事后温济澤却向中央联絡部写假报告，說对外广播这一期間的报道基本上是正确的。他認为对外广播的主要对象是資产阶級，並因而取消了同資产阶級思想的斗爭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温一再說：“对外广播沒有指导性”，在毛主席已經指出东風压倒西風之后，他还是說：“世界革命是遙远的下一世紀的事情”，“对外广播根本不存在灭資兴无的任务”。他認为外国

資产阶級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宣传我国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社会主义建設成就的宣传，同样也採取消極的态度。他以对外主要是宣传工业化为借口，不宣传农业發展綱要四十条；党中央提出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一个与工业化密切关联的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口号以后，温又以不知道"如何向国外宣传"为借口，拒不布置宣传。对于宣传社会主义陣营的强大和团結，温也採取消極态度，在毛主席指出"东風压倒西風"以后，温长时間沒有布置宣传。在送給波兰和南斯拉夫的賀詞中，温济澤删掉了"以苏联为首"五个字，並且把"陣营"改为"大家庭"。温主张对外广播不播苏波会談等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重要消息，甚至苏联成功地發射洲际导弹的消息也沒有广播。温济澤拋棄了无产阶級的根本立場，为討好国际資产阶級大談其所謂"全面、客观、公正"，並且不同意宣传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危机，他根据对內部国际生活組播出稿件的統計，認为"談苏联多了"，是"片面性"，"对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济發展和科学成就就很少报道，仅是介紹他們的矛盾、危机"，認为也是"片面性"。他在一篇稿件上删掉了"台灣人民反美情緒越来越高涨"等字句，並且不准在稿件里提"立即"制止美軍强姦台灣妇女的罪行，說用"立即""迅速"的字眼就是一种"速胜論"。两年来，在所謂"和平共处"、"不干涉內政"的借口下，温反对对外广播进行有关各国工人阶級社会主义运动的宣传。他提倡資产阶級的新聞观点和文艺观点，强調对外广播要适应資产阶級的"兴趣"和"需要"。一九五七年初，他在对外广播部門大力推广以輕松、荒誕、談情說爱、厚古薄今和言不及义的东西爭取听众的日語組的"先进經驗"。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英語广播規定了每天要播一条奇聞和有"人情味"的消息，以至大烏龟的消息成了重要新聞。对外部国內生活組在两年內一共發了五百八十八篇这一类的稿件（如胡同里的叫卖声、活捉三郎、兎子的尾巴为什么是短的等），佔全部發稿九百二十篇的百

分之六十三，其中充满毒素的有一百六十三篇，佔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这些东西显然只能博取国际資产阶級的欢心，麻痹国外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意識，为帝国主义效劳。

（二）在組織方面

温济澤和邹晓青、张紀明結成反党小集团，带头反党，严重地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則，抗拒党組、編委会的領导，制造分裂，破坏党的統一和团結。为了抗拒和分裂党組、編委会的領导，把对外广播部門变成他們的独立王国，温济澤公然否認中央台統一領导的存在，說："中宣部尚且不能領导对內对外的宣传，中央台編委会还能統一領导对內对外广播？"並且制造了一套理論——"对外特殊論""具体領导論""大同大異論""四大不同論"，作为欺騙和拉攏群众、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的綱領。温济澤在对外广播部門实行家长式的領导和宗派主义的幹部政策，封官許願，提拔重用亲信，排斥打击不同意他的做法的幹部，並私自定所謂对外局副局长和其他負責人的人选。温对录用人員敌我不分，主张"只要不是現行反革命都可以用"。去年十月，全局討論机构問題，温济澤及其小集团利用这个时机，大肆进行非組織的活动，煽动群众，散布流言蜚語，制造宗派主义情緒，竭力把对外广播部門結成一个宗派集团，公开抵制党組提出的加强統一領导的机构方案，並以上述那一套荒謬的理論，坚持对外广播和对內广播分家。温济澤还說有关对外部門的問題，党組、編委会无权作出决定。温济澤还貼出大字报抬高自己，大肆抵毁攻击編委会和总編輯的領导，破坏編委会和总編輯的威信，企圖拉攏群众和他一道来搞垮編委会，使他們的独立王国进一步合法化。利令智昏，温济澤的反党活动極其猖狂，而他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原形因而也徹底暴露。

（三）在外事工作方面：（略）

（四）对整風和反右斗爭的态度

以温济澤为首的小集团站在資产阶級的立場，阻挠和抗拒整

風运动和反右斗爭。整風期間，溫济澤强調“业务太忙，整風和反右不能抓得太緊”。他身为党組成員和对外部門的負責人，却把整風領导工作交給邹晓青，自己不掛帅。在整風运动期間，从不發动群众，但在专題鳴放阶段却乘机煽动群众，借以为自己的反党活动助威。为了逃避思想斗爭，整風每一阶段，他都主张草率收兵。他对群众提出的意見採取了極端官僚主义的不負責任的态度，写了几条千篇一律的答案，叫秘書塡写答复。对于貼大字报批評他的幹部，則粗暴地予以打击。他認为“国內經过几次大运动，反革命基本肃清了，阶級斗爭趋于緩和了”，因此私自决定調进相当数量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有严重政治問題的人。在反右斗爭中，溫提出种种借口，力圖縮小斗爭面，甚至同情和包庇錢敏齐、陈潤康等右派分子，並且为其弟弟右派分子溫济中到处叫寃說情。

此外，在个人生活方面，溫济澤也充分表現了腐朽恶劣的資产阶級思想作風。他以“老革命”“理論家”“科学家”自居，自我吹嘘，喜人奉承，好出風头，爱講排場，用答应介紹入党、拿双薪、出国、提級等办法来拉攏幹部。在一年零四个月中，溫以出国名义，用公款买了四双皮鞋、六套西装、两件大衣，而且不按制度办事，有一件大衣就价值五百多元。他对女同志的行为極其輕薄，虐待年迈的老母。这些也說明了溫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員应有的道德品質。

二、对錯誤罪行的态度及处理意見

温济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严重，行为恶劣，給了党的广播事业以严重的損害。在斗爭开始后相当长时間內，他仍然不肯低头認罪；在斗爭逐步深入之后，在无数鉄的事实面前，他被迫承認了反党的罪行，並作了初步的交代。斗爭后期稍有悔改之意，但他的交代和检討仍然是不徹底、不深刻的。

根据温以上錯誤事实充分証明温济澤已堕落为党内右派分

子。为純潔党的內部和严肃党的紀律，經討論研究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規定，給予开除党籍处分。並建議行政撤消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看。

中共通俗讀物出版社总支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蓝鈺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

蓝鈺，男，三十九岁，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現任通俗讀物出版社副总編輯。

蓝鈺在整風鳴放期間，趁着党整風的机会，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其主要反党罪行是：

一、在人民日报和文化部召开的座談会上，对党的出版事业进行了全面的攻击，並提出了一个比較完整的資本主义出版工作綱領。他还向一些地方出版社的領导人进行游說、煽动，企圖迫使文化部接受他的反动主张，並利用別人在报刊上發表文章，宣传他的反动观点。

二、包庇、鼓励和支持“时事手册”的右派小集团向党进攻。

三、宣揚修正主义的观点，提倡極端民主，毫无批判地在社內介紹右派分子林希翎的謬論，提倡沒有政治界綫的“独立思考”。

以上主要反党罪行表明，蓝鈺是一个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队伍，經总支全体党員大会通过，决定开除其党籍，行政上撤职、降級。

人民鉄道报社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范四夫的处理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范四夫，男，三十六岁，一九四〇年入党。安徽繁昌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人民鉄道报社副总編輯。極右分子。

主要反动言行：

1、在五月十六日首都新聞工作者座談会上，發表了一篇系統的反党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聞綱領。反对党的机关报，說："既然是机关报，便成为这个机关的下屬部門；就要代表官方說話，不便發表与本机关指示、决定相违背的問題"。"报紙也就不能成为群众的輿論机关"。他極力支持新聞界右派分子徐鑄成所提出的"列宁的办报原則已經过时了"的謬論。狂妄地說："我很同意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設时期，报紙的作用和基本任务，有大可研究的必要"。他公开提出主张，要修改党中央有关党領导报紙的一些規定。他还大喊我国新聞工作者社会地位不高，新聞採訪不自由等荒謬論調。

2、亲手制訂了两个反党的所謂"整風报道計划"。把当时社会上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論，列在他的計划內；並到处煽动"要給鉄道部領导上施加压力"；鼓吹"打破过去同級报紙不能批評同級党委的常規"。当領导上几次指出整風报道有錯誤时，又採取公开抗拒的态度。

3、他利用副总編輯的职位，糾合报社另一些右派分子，形成反党小集团，他大唱"报館不闖禍不是好报館，記者不討厭不

是好記者”。报紙批評“要在太岁头上动土”，“要聋人听聞”。他以肯定、支持的态度在报紙上大量登載右派言論；並拒不登載人民日报有关反右派的社論。因而在去年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这一期間，篡改了人民鉄道报的政治方向。

斗爭中的态度：曾进行避重就輕的检討，經再批判揭穿后，索性全部推翻，否認他的罪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至今仍不肯低头認罪。

处理意見：建議开除党籍，撤消人民鉄道报社副总編輯职务，监督劳动，酌情給予生活补助。

中央批示：开除范四夫党籍，撤消人民鉄道报副总編輯职务，监督劳动。

人民鉄道报社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刘萍的处理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刘萍，男，三十八岁，出身富裕中农，成分学生，1937年參加革命，同年加入共产党。人民鉄道报社副总編輯。

在报社副总編輯范四夫糾合报社其他一些右派分子，有綱領、有計划、有行动的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並一度篡改了党报政治方向的整个过程中，他的主要反动言行是：

一、他亲自带林立去北京局放火，在未去該局前，即恶意散布对該局党委书記刘国梁、局长王效斌等同志的流言蜚語。說：“王效斌很鬼，会拍領导上的馬屁”，說該局組織部长是刘国梁的“狗腿子”。揚言要对上述同志“整一下”。到該局后，一方面極力煽动北京局幹部攻击鉄道部領导；另一方面又煽动北京

局处以下幹部攻击該局的領导幹部，他为了达到煽風点火的目的，不惜採取了造謠、欺骗、"激将"等許多卑鄙手法。如他对京局的幹部說："鉄道部整風，放的太慢，我們想从下面'轟'一下"，"批評部长的稿子也要登报"。还說：中宣部已有指示，报紙可以批評同級党委了，並造謠說中央有文字东西。还煽动說：有沒有顧虑？怕不怕？看你們不太敢放！又說：不要有顧虑。有什么意見都可以提，登报可以不登你們的名字。

刘萍为了攻击北京局的領导幹部，到处蒐集他們在生活作風上的問題。从領导幹部住房、救济，甚至睡不睡午覚，是否按时上下班，都蒐集遍了。他还要鉄路医院把北京局刘国梁等主要幹部的医药费都計算出来。

刘萍搜集材料回报社后，除了亲手写了一篇所謂給鉄道部施加压力的稿子外，还将他蒐集到的所謂十三項特殊問題，口述給編輯部副主任右派分子张如和。要张写諷刺杂文，攻击北京局的領导。

二、积極支持和执行反党集团的反党計划，他批准召开了鉄路文工团部分团員座談会（实际上是放火会），会后並由編輯部整理成一篇抹杀成績夸大缺点，污蔑党的領导的文章，在报上發表了，刘还督促群众工作部繼續召开同类性質的教师、医生等座談会。

三、經刘萍审查出版的四期报紙上，审發了許多恶意攻击党的报导和文章。如"設計总局对我們到底抱什么态度？一工业設計院的青年技术員請領导上回答"、"錦州局党員幹部宗派主义严重"、"第一設計院党員幹部脱离群众"等报导，多是夸大事实，完全脱离党报立场、带有很大煽动性的。經刘审發的还有："談放火"、"解决問題的幹部"、"打破陋規"等带有很大毒素的文章，並对右派分子张如和写的大肆煽風点火的"談放火"倍加讚揚，說："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广証博引"。

运动中的表現：完全否認他的一切反党罪行，态度恶劣。

处理意見：建議开除党籍，撤消人民鉄道副总編輯职务，留用察看，待遇由十一級降为十六級。

当否，請批示。

中央批示： 开除刘萍党籍，行政上撤消原有职务，留用查看，由十一級降为十五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袁毓明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

袁毓明，男，四十二岁，河北省邢台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一年入党，历任太行新华日报校对科长，人民日报办公室主任，第一兵团新华分社社长，川北日报副社长，重庆新华日报总編輯等职。現任大公报总編輯。

主要右派言行：

（一）誣蔑整風运动，說："整風是一場混战，你在背后打我，我在背后打他，他又在背后打你，" "一九四二年整風运动伤了很多人，到現在还不能忘。"

（二）鳴放期間，为了轉移目标，张貼匿名条子，攻击謾罵几个党团員为"两面派"，"母夜叉"，並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大字报上签名，写道"这样揭發党內黑暗好得很"。

（三）在报社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同右派分子肖离，肖鳳，朱啓平，単越，吳永云，謝牧等人談話，說"我到报社感到孤苦伶仃，沒有三亲四故……中宣部也沒有什么熟人"，"我也是有苦說不出来，大家感到苦悶我也感到苦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士为知己者死"。为了对肖离等右派分子討好，向他們說"对吸收你們入党的事我一直关心，……这回我替

你們負上責，加把劲，赶快解决你們的問題”。此外並将一九五六年党組对他蛻化堕落思想的批評說成是“宗派傾軋”等等。

（四）为了討好肃反对象，他說：“文化部在肃反問題上，曾經两次通报批評我右傾，現在看来你們还是正确的。”对肃反对象苏济生說：“你們几个人的問題是我当时尽量压住，才沒有公开斗爭。”

斗爭中态度：經过斗爭，低头認罪，表示願意悔改。

处理意見：开除党籍，撤銷大公报总編輯职，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职务。

中共新华社对外部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适五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共对外部支部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开支部大会，出席正式党員十二人，預备党員四人，右派分子陈适五本人也出席。

陈适五由于参加了右派分子陈企霞的反党活动，並發表了右派言論，已堕落成为右派分子。全体正式党員一致拥护中央关于党內右派分子必須开除出党的决定，通过了将陈适五开除出党。全体預备党員也一致拥护这一决定。陈适五当时未举手，但發言表示贊成这一决定。

附：右派分子陈适五的政治結論

右派分子陈适五的政治結論

陈适五，共产党員，男，四十三岁，浙江鄞县人。家庭出身

破产商人，本人成份职員。原任新华社駐柏林記者，拟調任本社副社长。右派分子。

陈于一九三一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三二年六月被捕后失掉关系，一九三七年七月又被捕一次。一九四〇年五月赴延安参加工作，一九四一年五月入党。

陈在一九三二年六月被捕后，有过告密行为。他在捕房中承認自己写标語，供出一起写标語的周芳垄同志和他的住址，並同敌人去周的住处，致周也遭逮捕。此事陈长期隐瞒，直到这次斗争中，才向組織检討交代。

一、主要的右派言行

陈适五从一九五六年春天以来，一直参与了丁陈集团首脑之一的陈企霞的反党活动，与陈企霞共同攻击党組織和党中央負責同志，反对党对文艺工作的方針政策和决定，企圖为右派分子陈企霞达到翻肃反中受审査、文艺报工作中受处分以及关于丁陈集团的批判和斗爭的案。其主要罪行如下：

1、为陈企霞出主意，直接参与修改陈企霞的三个反党文件。在三个反党文件中，陈企霞攻击肃反政策，誣蔑作家协会“无反乱肃”；攻击党在文艺界的領导同志；反对中央对文艺报所犯錯誤的决定；反对作家协会党組对丁陈集团的斗爭。陈适五完全贊成陈企霞这些反党文件的内容，並且还認为这些文件有的地方还“不够尖銳”，要求陈企霞“强硬一些”。同时还直接动笔修改，要陈企霞在反党文件中强調自己在肃反中被审査“是寃案而不是錯案”，强調作协党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2、陈适五还为陈企霞通風报信，曾先后将党内关于丁陈集团的传达及对于右派分子斗爭的某些原則及右派分子的情况告訴陈企霞。同时还为陈企霞向作协党組織探听过作协对陈企霞問題的看法，然后轉告給陈企霞。

3、發表右派言論。陈适五曾認为“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有矛盾”，認为“中国用群众运动来搞肃反也要發生問題”。

4、支持和同情右派分子。陈适五曾附和、同情和包庇新华社極右分子李愼之的右派言論，在斗争李愼之时不揭發。他曾传播新华社右派分子袁传芳誣蔑新华社"私設公堂"的謬論，支持文艺界右派分子李又然翻肃反的案，並鼓励新华社右派分子何飞向組織上要回何在肃反中写的材料烧毁。

二、斗争中的态度：长期对党隐瞒，不作交代。在斗争中沒有真誠的悔罪表現，最后在大量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認罪。

三、处理意見：开除党籍，行政上撤銷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中共民族事务委員会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極右分子翟宜地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翟宜地，男，維吾尔族，現年四十一岁，新疆吐魯番县人，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份反动官僚，一九四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五一年入党。历史上曾任过：小学校长、翻譯、伪副县长等职。参加革命后任过县长、新疆分局幹部学校副校长。現任民族出版社副社长、党总支委員。

翟宜地在一九五一年，隐瞒了他在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担任警察局密探（系盛世才在新疆执行六大政策的时代）和一九四二年加入国民党，担任区分部書記的反动历史，混入党內。这些历史問題直到最近对他批判时，才在証据确凿之下被迫承認。

主要反动言行：

（一）民族分裂主义的主要表現。翟宜地的民族分裂主义是極为严重的，早在一九五二年，中央公布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綱要

时，翟就表示不滿，反对党的区域自治政策，主张“建立維吾尔斯坦”，企圖分裂祖国的統一。新疆建立自治区后，即对新疆这一名称不滿，認为中央对“斯坦”有誤解，經过“爭取”，中央还会採取“斯坦”的名称。因此在整風前，一方面在新疆幹部中散布“斯坦”沒有政治意义，仅仅是地方的意思的謬論，同时經常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木鉄意等密談“斯坦”問題，就是在整風运动中，也在繼續这种活动。整風开始鼓动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木鉄意借“維吾尔斯坦”問題向党进攻，翟宜地夸奖他“放得很好”。对反对建立維吾尔斯坦的人进行打击，責問哈族幹部：“有什么理由不同意維吾尔斯坦？”恶意污蔑民委党組書記汪鋒同志講“新疆人民不同意建立維吾尔斯坦”的話是“捏造”的。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阻撓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木鉄意的批判，对維文室同志說：“不要搞得太过火，以后还要在一起工作的。”污蔑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是对新疆幹部的“攻击”。

維吾尔上古、中古史一書，主张維族同中国分离，是苏联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因內容有錯誤沒有發行，但翟为了寻找分裂主义的理論根据，不惜採取要挾手段，竭力主张出版这本書。

（二）排斥汉族和歧視其他民族。对汉族人民在新疆所作的巨大帮助，抱排斥态度，污蔑人民日报介紹新疆生产部队的成績的文章不是事实，是“夸大”，並且要去質問人民日报編輯部。說“人民日报記者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場上报导汉族的成績。”民族画报报道一位汉族女技术員，教一个吐魯番的农民接葡萄枝的方法，翟認为是“看不起維族”，大为不滿。反对汉族文艺工作者对新疆歌舞作整理加工，說“把优美的地方改掉了”。他並要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要播送汉族演員演唱的經过加工的維吾尔民族歌唱片。在語言工作中，有意排斥汉族借詞，在总結語言調查工作时，他指示木鉄意在材料中將維族人民已經接受的汉語詞匯都剔除，企圖以此保衛維語的“純潔性”。在語言研究工作上，認为“新疆十三个民族影响了維吾尔‘事业’的發

展”。歪曲历史事实。否認汉族历史人物左宗棠出兵新疆使新疆免于帝国主义奴役和免于从祖国分离出去的进步作用，贊揚英帝国主义走狗柯古栢政权。企圖寻找分裂祖国的历史根据。並企圖借此挑动民族間的仇視。同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馬木提师长大为贊揚，說他是維族的領袖人物，对他要重新估价。

（三）一九五七年五月利用职权在社內出版他自己整理的“維吾尔民間諺語和謎語”一書，公开反党反社会主义，贊揚地主阶級，辱罵劳动人民，破坏民族团結。在書里宣揚胡大（上帝），如“只要要求胡大，一切都会到手”，“給你生命的胡大，总会給你活路”，“有胡大的地方沒有灾难”。污蔑劳动人民“外表黑的人，心总是黑的”，“穷光旦早上是穷的，晚上还是穷的”，“穷人一旦得到好日子，連白天也点着灯”、“穷鬼的肚子即是塞飽了，眼睛还是貪婪的”，“穷鬼的眼睛只盯着饢，肚子飽的人才注意修养”，“头大作官，脚大为奴”，“别叫餓鬼去做飯，别叫受冻的人去生火”，“乞丐的口袋是装不滿的”。贊揚地主阶級“有錢的人有智慧，高山也怕有錢的人”，“一两黄金一两智慧”，“有錢的人有面子”。恶毒挑拨民族关系“汉人坐着牛車捉兎子”（意即汉族慢慢会治死維族），污蔑汉族“給肝就是阿不拉阿旬（意指好人），不給肝就是阿卜拉黑大衣”（汉族——意指坏人），污蔑蒙族“鞑子的馬不会吃料，吃料就穿破嘴籠头”，污蔑回族“要發生的已經發生了，回族的鼻子已經打出血了”。还有很多污蔑妇女的，如“孩子好欺侮，姑娘好玩弄”，“有花斑的馬，不是好馬，年幼的女人，不是好老婆、狗是忠实的，老婆是累贅”。此外还有煽动阶級仇恨的“不要把父亲的敌人，当作你的朋友”等。

翟宜地在平时对工作不聞不問，但对这本書的出版却抓得十分紧，經常亲自查問工作进度，並扩大發行一万五千册。

（四）翟宜地混入党內以后，一貫进行反党活动。早在一九五二年在鄯善县任县長时，糾集地主流氓分子破坏該县第六屆人

民代表会議，在会上反对汉族幹部，攻击县委会，攻击县委書記康东山和副县长李俊傑同志（都是汉族），污蔑他們是大汉族主义。对三反运动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和污蔑，挑拨民族关系，阻挠了土地改革。辱駡共产党沒有一个好东西，都是穿破鞋烂套子的，和他們在一起嫌他們臭。指使和縱容維族的坏分子辱駡党和政府。以致造成該县歪風邪气，在一个时期內相当严重。

来民族出版社后，仍繼續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五六年进行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翟带头强調新疆幹部“沒有肉和奶就不能生活”，要求按新疆标准發工資。煽动群众对領导不滿，其个人主义欲望不能滿足，即对組織不滿，污蔑出版社領导有大汉族主义。污蔑民委党組，不批准节日放假是“干涉出版社的內部事务”。

翟的宗教观念也很深。一九五六年維族幹部阿不都拉巴海逝世，翟宜地主张写的輓詞是：“我們是屬于阿拉（即上帝）的，我們还回到阿拉那里去”（引自古兰經）。

（五）追求資产阶級腐化生活。翟宜地早在地方上工作时作威作福，貪污群众斗爭果实。到出版社以后，仍然追求个人享乐。三年多沒認真地审查过一本書稿，只是毫不負責任地、馬馬虎虎地看了一、二書稿。利用职权，讓工作幹部在工作时間給他整理“业余”稿件。“民間諺語和謎語”一書，用多算字数和重复內容、提高标准等非法手段，多騙取稿费二千多元。利用职权非法同时約两部稿子，騙取預支稿费約九百元（至今未交稿）。“与習作者談写作”一書，他只看了一遍，就拿了二百五十元的审校费，不但沒有解决問題，相反地倒改錯了若干地方。翟虽然騙取了大量稿费，仍貪心不足，在約了两部稿子，預支了九百元稿费后，还要业余編“五体清文鑑”的索引，騙更多稿费。

去年赴苏訪問，把西装和帽子在苏联卖掉。向苏共中央联絡部远东司的負責幹部索取收音机，政治影响很坏。出国和回国携带行李都超重，仅回来时从新疆到北京就浪费运费三百多元。在

苏联境内由苏方負担的超重行李费更多几倍。

斗爭中的态度：翟宜地的态度極不老实，对自己的反动言行不肯交代，对别人揭發的事实进行辯解，避重就輕企圖混过关。領导小組和整風小組对他进行了无数次的帮助，經多次开会斗爭，但效果很小。仅在事实面前，无法抵賴理屈詞穷时，才表示低头認罪。但認識極不深刻。

处理意見：开除党籍。撤銷原有职务，留用察看，給予相当于行政十五級的生活待遇。

中共輕工业部造紙設計院总支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平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五日）

李平，男，四十二岁，广东省澄海县人，一九三六年入党，文化程度中学，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五五年調輕工业部設計公司任副經理，一九五六年任輕工业部造紙設計院院长、部党委委員、监委委員、院党总支書記。

李平在一九五二年任广东省汕头市市委副書記时曾犯过地方主义錯誤。他从一九五三年以来对过去所犯錯誤不但不能深刻認識，相反的繼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其主要的反党事实如下：

（一）污蔑党是宗派主义，取消党的領导，将党的核心領导称为宗派小集团。李平在任院长期間，他反对不懂技术的党員当科处領导人。一九五七年他在全院科长以上及工程技术人員会議上公开宣佈：党过去对工程技术人員不信任，现在要大量提拔。国务院有規定，将来要派資本家当司局長，不要党員当“政

委”。他主张取消专职总支副書記，削弱党員副院长的职权，一切以技术人員作为領导核心，並宣揚：凡生产部門都要懂生产技术人来掌握領导，这是个基本轉变，是几年来的經驗。又說：“資产阶級已成为劳动人民右翼，工人阶級成为劳动人民左翼”。整風开始他不顧总支委員的反对，以个人代替总支委員会狂妄的向全体职工宣佈：“設計院的主要問題是党的宗派主义”，煽动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充当了右派向党进攻的先鋒。

（二）李平在發展党的工作上要吸收有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入党，並主张降低知識分子入党条件，违反党的組織路綫。为了要吸收某些人入党，曾不择手段，用行政命令的口气批示“要总支在一定的时間給予解决”。他在出国时期，向苏联同志介紹代表团人員时說：朱伯源（非党員、右派分子）是中共預备党員。在幹部路綫上憑私人感情的好恶代替組織原则，对工程技术人員採取封官許願，破坏党群团結，甚至以物資进行拉攏。如李对本院第一副院长兼总工程师陈晓嵐說：“邓院长（党員）反对提拔技术人員”以此挑拨邓、陈的关系。又如在苏联期間李批准了許乃文等工程师用五百个卢布买手表。他对工农幹部採取輕視或排挤。他称右派分子王培年为中国“专家”，說朱朱伯源（右派）是成熟的發展对象等。

（三）洩露党的机密。秘書曾群是国民党員，历史不清，但李平将党內的机密文件交她保管，甚至将院內保衛工作总結的絕密資料也交給她保管，直到她离原职数月才交出。他在国外考察时期叫朱伯源参加党的小組会議作記录，保管出国一切資料。整風开始，李平听了彭真同志关于整風的步驟和策略的报告，規定不許記录与传达，但李平不仅作了記录，回院后还在非党科长会議上作了传达，严重地洩露了机密。

（四）公开进行煽动点火。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李平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的一次技术人員会議上公开叫囂：“过去党員

整你們（指三反、肃反运动），今天你們要整整党員”。当右派猖狂的向党要領导权时，李平向右派宣称：“这次我一定解决有职无权的問題”。在水管科号召大家“吐苦水”，並与党外人士說：“設計院是科学技术部門，不要党的領导行不行？”

（五）无組織、无紀律，与党分庭抗礼。李平以老党員自居，夸耀自己的革命历史，向組織上要待遇、鬧工資，不仅在国內，在苏联考察期間，向苏联同志亦介紹自己的革命資历，並說不滿二十岁就担任地委書記了，对待苏联的招待服务工作採取不友好的态度。在院內一貫目无組織，出国时間不經組織批准超过了三个多月，公开的不执行党的决議，任意取消一些党員的权利，並实行家长式的領导。他喜欢奉承，拒絕别人批評，对幹部任意訓斥（如对原总支書記楊可箴同志，邓毅同志經常要态度），發脾气，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根据以上事实，李平的反党不是偶然的，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李出身于地主阶級，是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虽然組織上参加了党，但未經过徹底改造，思想上並未放棄其原阶級的立場。从他历次所犯錯誤分析，李平是一个極端严重的个人主义者，是混入党內，篡夺党的領导权，进行宗派活动，搞独立王国的政治野心家。李平从一九五二年任汕头市市委副書記开始，一貫是目无組織驕傲自滿与党鬧独立；在幹部政策上存在着严重的宗派主义，用人唯亲，以私人感情的好恶来代替党的組織原則。敌我不分，严重的洩露党的机密，排挤党員幹部；在組織路綫上他主张吸收政治思想不純的分子入党，降低入党条件，並主张为五百万知識分子着想，散佈資产阶級“技术至上”的思想；拒絕党的領导与监督，破坏党的統一和团結。虽經党屡次教育，都因他对党一貫採取不老实的态度而拒絕了党的教育，因而給党的事业造成極大損失。这次整風期間，当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李平起了向党进攻的急先鋒作用，堕落成为資产阶級在党內的代理人、党內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

的队伍，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决定开除李平党籍並建議行政上撤銷其院长职务。

中共建筑工程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永清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

陈永清，男，五十四岁，湖南人，沒落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二年重新入党，原任建筑工程部計划司司长、部党委常委、部整風領导小組成員兼整風办公室主任。

（一）陈永清历史上的重大問題

陈在历史上曾自首叛变、出卖組織、出卖同志。一九二九年第二次被捕后，自动供出了上海团中央两个信箱、省委上海通訊处、汉口通訊处（省委組織部长易足山因此被捕）、汉口一个团員及中共六代大会的情形，並随特务去捕人。后来他又向蔣介石的武汉衛戍司令部写呈文說："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以后不参加共产党"。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八年先后两次重新入党和恢复党的关系时，都隐瞞上述自首叛变的行为，直到一九四〇年到延安后，才坦白一九二九年曾自首。一九四三年搶救运动中才坦白一九二九年的自首叛变行为。在延安整風时，他說："要么就做个保护毛澤东的人，要么就杀掉毛澤东而出名"（大意），可見他对党的仇恨是極端严重的。

陈在历史上除自首叛变外，还一再發生过政治动搖。如秋收暴动失敗后，他躲在家中不願出来革命；一九三三年被捕后，想进"反省院"；一九三九年因省委决定不發給家庭津貼等原因，

就消極回家，做了一年多的革命逃兵，后經組織上派人去找他，才于一九四〇年又回到桂林办事处参加工作。

（二）主要反动言行

一、反对党中央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和其他右派一样，坚决否定建筑工程部几年来的工作成績。

1.說一九五六年盲目冒进，而盲目冒进的根源是由于領导特别刘部长好大喜功。陈永淸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集中表现在当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議上毛主席批評了反"冒进"的錯誤，提出鼓足幹劲……多快好省总路綫，在最高国务会議上毛主席又批評了"好大喜功"的說法之后，陈仍顽固地坚持說：一九五六年是"冒"了，摊子这么大，还說沒有"冒进"。又說："建筑工业化速度快了，規模大了，现在不是方向。"陈还說："不能說社会主义的好大喜功就是好的"！

2.陈反对"瞻前顧后"和"难免論"的說法。陈狂叫說："难道說顧后一顧就顧到一九五八年？推迟两年再搞不是更好嗎？""我們要提倡可免論，讓可免論早点出现，不能今年难免，明年难免，后年还是难免"。

3.坚决反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提法。他硬說建筑业工作成績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問題，硬說建筑部是犯了"根本路綫上的錯誤"。他說："几年来我部領导上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作風，这就是对于党和国家的重要指示，执行的不認真，不坚决"，"态度是敷衍了草"，"方法是拖拉、脫离群众、脫离实际"。前面批評領导盲目冒进好大喜功，后又指責为"暮气、衰退"，是"政治上保守，业务上冒进"。

4.我部第一个五年計划基本建設投資不过五亿元，他是計划司长竟带头貼大字报說："浪費了两亿三千万元"。以后上报中央数字又說"浪費了七亿余元"，（此数字上报时被領导小組予以糾正）以从根本上否定几年来的成績。他为了达到否定成績，

整垮領导的目的，还一再地写大字报攻击司、局、院長，要“司、局、院長大胆、坚决、徹底地揭發浪费和保守”，要“拿出浪费和保守的資料”来，要負“反浪费反保守深透之責”。企圖造成严重混乱的局面。

二、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党的团結与統一，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1. 採用两面派的手法，站在反对派的立場与党对抗。他主张整風“只是挑毛病”，“只要民主，不要集中”。他一面亲手签發部整風領导小組討論的对整風运动的佈署文件；回过头来又坚决地反对这个文件。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貼大字报說：“我看草稿时沒有改去这句話，但我不同意这种作法”，“既要揭發缺点錯誤，那不是挑毛病是幹什么？”。他給党委貼出“紧急建議”的大字报，对党委施加压力，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企圖把党組織搞垮、搞乱。

2. 利用整風办公室主任的职位，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向領导进攻，他貼大字报說：“三句好話不如一馬棒，三句好話，不如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能够發揮、揭發和攻击缺点、錯誤和丑恶的作用”，“能組織和吸引群众朝着一个目标进攻”。說：刘部長“对大字报不是促进派的态度”，是給了沒貼大字报的人吃了“定心丸”了，使他們可以“任憑風浪起，稳坐釣魚船”了。他把党当成敌人，把大字报当成毒箭。他煽动群众說：“欲破曹兵，須用火攻！”

3. 恶毒地污蔑、丑化和攻击領导、攻击党組。他污蔑党組对整風运动的領导是：“决心不够，劲头不足，方法不多”，是“以暮气和官气来反浪费反保守”，是“保守越揭發少越好，越揭發不徹底越好”，是“草率收兵”，“无动于衷”，是“鳴放无力”。他攻击司、局長們說：“你們对于当前开遍了燦烂的政治思想之花，熟視无睹！”他把我部整風运动描写成“漆黑一团”，辱駡部領导上在“促退”，在“提倡浪费”。

4.反对党对报刊的领导，主张批評自由。主张整風簡报可以批評同級党委和上級党委。他的反党綱領是："只要是事实就登"，他說："假如我們內部的看法要一致才能登，那么整風簡报就要停刊了"。在他反党綱領指使之下，部的"整風簡报"在一段时間和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他进攻領导的武器，他亲自指定把他和別人写的攻击領导的大字报登在簡报的显著地位上，高文西恶意攻击刘部长的大字报"不能讚誉过早"，他不經領导批准就登在整風簡报上。他主张只要暴露缺点錯誤，只要挑毛病，只要是对党对領导进行攻击就是好的，就"大有可为"，提倡"偏激也好！"

5.誹謗領导，散佈流言蜚語，进行非組織活动。他散佈說："部領导工作上政治与业务沒有結合好"，"幹部政策有問題"，"有右傾"。又說："刘部长不重視政治理論"，"不是个好人"。說："部对大字报問題上認識不一致，我已写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講刘部长不是促进派的态度，不管他愛听不愛听，我要写大字报"。又散佈說："工作难办啊！""只能尽人事，听天命！"

三、反对无产阶級专政，攻击肃反运动，包庇反革命分子，打击好人

1.整風开始时，正当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肃反对象喊冤时，他煽动說："大家不要有顧虑，什么都可以講，罵也可以！"又說："办公厅肃反斗了七个人，結果一个也不是反革命，还說成績是主要的。"支持右派分子和企圖翻案的人向党进攻，否定肃反的伟大成績。

2.整風前曾抗拒保衛部門和中央监委的警告，把反革命分子金敏求由經建公司带到机要部門（計划司），这是堅持用一位党員科长把金換来的；包庇反革命分子陈一仁（原經建公司經理，是党的叛徒，反革命分子）；整風过程中，同情、支持反党坏分

子陈明善向党疯狂进攻，抗拒国家机关党委指示，坚持不把右派分子孔嘉作第一类处理（国家机关党委决定按一类处理），主张不把右派分子楊誠划为右派分子。

3.为了夺取党的領导权，"三反"时派了一个貪污犯赵兴和去石家庄分公司領导三反运动，赵說："陈老板給我的任务，别人不能干涉。"結果把三反搞糟了。又介紹他的老乡葛鳳書（国民党湖南省社会統計局的，有政治問題）到石家庄分公司工作，並給公司写信要葛当科长。

4.对給他提意見的同志实行打击报复，把宗世鑑同志（石家庄分公司經理）整的大哭一場；他任办公厅主任时，整走了两个副主任，胡弼亮同志調走后說："我至死也忘不了陈永清。"陈对組織，对同志極其阴险，十分恶毒。

四、敌視党的領导，抗拒党的指示

1.党对陈的自首叛变問題作了寬大处理以后，十余年来对他仍給予了很大信任，但陈以怨报德，长期对党不满，他不仅不感謝党，反而自命不凡，长期对党抱敌視的态度。他对級別、职务沒有提昇極为不满，說："别的司、局长都是国务院任命的，为什么我办公厅主任不經国务院任命？"与党离心离德。

2.工作一貫表现飞揚拔扈，一手遮天，独断专行，欺上压下，目无組織。在他脑子里，司局长中他为第一，对副部长他也看不起。整風前他曾不經任何的集体討論，个人就决定某同志为党委副書記，或某一个副書記退出党委。中宣部和国家机关党委要求各单位保証"业余大学的学習"，他抗拒說："能保証就保証，不能保証就不保証"。在整風办公室工作时，副主任好几个，但很少耐心交换意見，發出的报告很少集体討論，他看了就批發，驕气十足，一手遮天。

3.一九五七年他是党委委員，党委因故未及时召开党委会，再加有一次听报告的票，按規定不应發給他，他对党委大發脾

气，馬上給党委写信說："党代会閉幕已十多天了吧？新的一届党委会至今沒有召开……你們忘記了，放棄了集体領导，这种情况必須迅速扭轉，否則，我再要求解除我这个'有职无权'的党委委員了。""昨天的报告票發的不当，这是个原則性的錯誤，我建議你們作检查，以免再重复这不应有的事故"。

以上种种事实充分說明了陈永清是隐藏在党內的大右派。

（三）斗爭中的态度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同志們开始对陈永清的右派言論进行反击时，陈的态度極为强硬，在三月六日党員司局长鳴放会上，継續坚持發揮他的反党言論，經各大区局长、經理、司、局、院长进一步揭發和严肃批判之后，承認了一些錯誤。但在五月中旬和六月初，又連續地向党組和部长个人写信，不但从根本上否認錯誤，收回检討，反而再次地發动猖狂进攻，力圖把党对他的严肃批判，歪曲为他和刘部长的个人之爭，阴謀混淆視听，进一步攻击刘部长。說他的問題"肯定不是大是大非，而是小是小非"，"我陈永清是正确的，是你（指刘部长）領导錯了"。他还恶毒地污蔑参加批判他的同志們都是盲从領导，是"賈桂思想"。並狂妄地說："这封信与其說是为了我自己，倒不如說主要是为了你，因为你是領导这場斗爭的人，所謂'解鈴还要系鈴人'就是这个道理"。态度極端恶劣。

六月底七月初，我部召开了群众性的批判大会，陈在会上仍是頑抗抵賴坚持反动立場。他說："唯物論辯証法告訴我們，既不决定于贊成方面，也不决定于反对方面；既不决定于多数，也不决定于少数，就是說不决定于主观思維以为如何如何，而决定于客观存在的大字报本身。大字报是正确的，促进的，誰要反对它也不頂事。"說他的大字报和毛主席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根本拉扯不上。他頑抗地說："要把我的这些言行划为右派，我並不后悔，大家都死不了，我还要活廿年，今后可以看出我究竟是不是一个'金不換'"。

总之，陈在斗争中的态度，極端恶劣，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繼續猖狂地向党进攻。

（四）处理决定

根据陈永清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及其态度，經党委会討論决定开除陈永清党籍，並建議行政上从严处理。

中共地質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韻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

刘韻，女，三十九岁，山西人，家庭出身高級職員，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九月入党，同年参加工作，現任地質部資源計划司副司长。

刘韻在整風中，带头縱火放毒，向党进行了猖狂的攻击，主要的有以下反党言行：

1.整風运动开始，刘即积極点火，煽动群众，並且带領其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散佈部領导对整風"沒有决心"的流言蜚語，攻击何副部长的动員报告"是这样的令人不滿"，說部領导"可能感到錯誤不严重，也可能覚得大家的意見不对，片面"，"使党外人士很可能覚得地質部的党不象話"，党外人士也可能抱这样的态度："党自己不願整，我們又何必呢？"何副部长动員报告后，她就迫不及待地主张立即鳴放起來，在她的主张下，不顧其他同志的反对，召开了扩大的支部大会（即全司群众大会），她作了"啓發性"發言，散佈其反动言論。誣蔑攻击党委"是党組的尾巴"，要党委"不要再作党組的尾巴"，积極的主张"先整党組"。刘韻同时也在党内进行煽动和点火，她說："党

員認識麻痹，不如党外人士認識敏銳”（按指極右分子王銓的反动言論）。並說“不知党員是否認識到这种严重性”（按指右派向党进攻中提出来的問題），“党內还有顧虑，有盲目的宗派情緒”，要党員“不要怕丧失党和領导的威信”。整風一开始，刘韻就極力煽風点火，把矛头指向党組。

2.極力的攻击党組，丑化部的領导，进行改組党組的反党活动。她攻击部領导“很难起到領导作用”，丑化为“不論从工作上、政治思想上、作風上、方法上，都是象推泥球一样，大家推着滚着往前走”。对右派分子提出的部領导是“思想僵化”，“停留在一九五二年的水平上”，“上靠专家，下靠司局长”的讕言，表示欣賞，並到处宣揚。丑化党組是“沒有領导核心”，“問題集中不起来”，“乱哄哄”，“人虽多而动脑筋的人少”；丑化部长是“不动脑子”，她狂妄的提出要党組書記“自觉一点”；並曾提出过“成立党組書記处”的荒謬主张；她認为“这一下子党組非改組不可了”。她对本司有人提出的×、×等副部长不行，刘毅可以当副部长的錯誤言論不加批駁，並为刘毅鸣不平說“討論人家（指刘毅）处分时还沒讓人家参加”。她並在司內提出了“①取消党的領导取消党組；②加强党的領导进行必要改組；③換人是否处分”三个問題要大家爭辯。以上充分暴露了刘韻企圖趁整風之机，攻垮党組，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

3.誣蔑党群关系。对右派分子提出的“党員与群众之間有墙有沟”表示贊同，並說：“領导与群众之間还要爬座山”。她認为党群关系不好的原因之一是“党員的觉悟不高，盲目的相信党的方針政策”，說：“党員不能明辯是非，有盲目性，对党的方針、政策、原則体会不了，簡单的認为都对”，並認为：“这与党評价幹部进步与否的标准有关”。她認为党群关系不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比較負責的同志在取得政权后，当了官，很容易滋长特权思想，習慣高人一等，环境变了，思想也变了”，就“不

自覺了"，"就逐漸与群众有了距离"。

4.攻击肃反發表叛卖言論，她在群众大会上所作的"啓發性"發言，即将肃反运动列为当前的五大矛盾之一，攻击"部領导肃反运动是有毛病的"，說肃反中反对右傾是"压力很大"，因此就"不能冷静，思想动摇"，"就偏重于有問題的一面去想"。她說："被肃的人如果不是（反革命），当然会有意見"，她为肃反对象辯护，說："因为过去說話不注意"，所以才"被肃"。她狂妄的提出三点質問部領导："①地矿司肃反斗了半年多，沒有一个反革命，部里沒有交待，司里对肃反究竟应該怎样估計？②缺点，偏差的綫要划清楚，斗爭了不是反革命的如何向人家交代？③打击报复問題（指肃反中有打击报复，並举例作証）如何处理？"右派分子攻击我們"三批材料不能定胡風的案"，誣蔑我們"肃反运动是利用群众"，她表示贊同，並到处宣揚。

5.認为我国"国家体制及制度不合理，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中央集中的过多，計委掌握太严、控制太死、管的过多"。

刘韻的反党言行，是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的。她出身于高級職員的家庭，長期受着資产阶級教育的影响，入党后，資产阶級思想沒有得到改造。一貫表現了严重的个人主义，驕傲自滿，自命不凡，自以为是，蔑視領导，目中无人，把个人置于組織之上，要組織服从自己，甚至不惜出卖組織換取卑鄙的个人威信，拒絕党的批評和教育。刘韻在整風前，即表現了其在政治上对党的严重不滿，並有分裂党的团結和削弱党的領导作用的反党行为。因此，在整風中就完全叛变了党，墮落成为向党瘋狂进攻的右派分子。

根据以上事实，支部大会通过，本委决定，开除右派分子刘韻党籍。

中共地質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毅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刘毅，男，現年四十一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六年十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参加工作。历任县委書記、地委書記、地質部办公厅主任等职。

在这次党的整風运动初期，刘毅趁社会上資产阶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利用党所給他的部領导小組成員和办公厅領导小組长的职务，大肆煽風点火，向党进攻。

刘毅一再在群众大会上攻击党組整風沒有决心，說党組对整風的認識"有天上地下之別"。向群众煽动"因領导太不自覚，不尖銳、不刻薄、不解决問題"。还說"威是威信，不是威势，几天来大家發言完全証实，大家越来越失望，（領导上）这又有何威信呢？"露骨地打击領导威信。在党員司局长大会上，刘毅更进一步根据自己的反党观点把办公厅放出来的一些丑化、謾駡領导和攻击党組的右派言論和錯誤言論加以系統化，向党組进行攻击。事后，还在群众大会上夸耀他的發言"震动很大"。

在小組会上，刘毅也不止一次地鼓动"有些同志發言尖銳一些，刻薄一些，我認为沒有什么"。他还为有錯誤言論、右派言論的黑板报辯护說："那不是謾駡，是反映了大家的願望"。公开支持攻击領导"不学无术"的謬論，說領导"連这一点都不承認还行！"当其他右派分子攻击領导是經驗主义，高唱"不調整領导成分不能改进工作"的濫調时，刘毅还嫌攻击得不够，他認为"这个估計过高"，而是党員副部长"連个主意也沒有"。誣

蔑"党員副部長是'有职，有权，无責'，非党員部長是'有职，无权，有責'"。右派分子薛毅發表反党的"改革幹部选拔使用制度的芻議"以后，征求刘毅的意見，刘毅表示部分同意，並以提拔某副部長为例，来支持"芻議"中所謂"选拔幹部沒有群众路綫，标准籠統"的謬論。他还主动找物探局右派分子錢宁談过話，鼓励錢宁"鳴放"。

早在学習八大文件的时候，刘毅便有过醞釀改組党組的活动，在这次整風初期他又和某些同志談部領导需要改組，並說："这不一定不是和風細雨"。

对待肃反的問題上，刘毅是附和肃反对象对党不滿的情緒，一再强調党对肃反中被审查的人伤了感情，要党向他們"消除隔閡"。在群众大会上公开說"肃反有偏差，有錯誤，应該作为'无产阶級专政的历史經驗'来吸取，这些偏差和錯誤应由部領导負責"，並將此說成和某部長等个別人的作風有关。在支部会議上要肃反运动中的积極分子作思想准备，使他們感到压力很大。在办公厅两次討論肃反問題的支部大会上（他是支部書記），吸收非党肃反对象参加，並一再鼓励肃反对象發言。因此，这些人在会上向党进行了猖狂的攻击，否定肃反成績，誣蔑积極分子，也有少数"积極分子"在会上表現动搖，甚至洩密。刘毅对这些有严重錯誤的言論不組織批判，正确的意見沒有發表，实际上把党的支部大会变成了反党的"控訴会"，变成了肃反对象向党进攻的工具。

办公厅的反右派斗爭，在刘毅担任領导小組長期間，实际上只是批判了薛毅的"芻議"，而对右派分子丑化、誣蔑領导的言論，沒有組織揭發批判，当領导小組其他成員提出这个問題时，刘毅反說"不要再批判了吧！再批判一次等于把領导又丑化一次"。鳴放初期，办公厅黑板报登出了不少有明显右派性質的言論，刘毅不进行追查。整風初期，专家工作室有些翻譯醞釀開大民主；鳴放期間，也有不少人發表了右派言論和錯誤言論，刘毅

置若罔聞。在张华同志对此提出意見后，他也只是非正式的和专家工作室主任何栋同志談了一下，而对何栋同志提出的具体意見又不採納。在反右傾情緒时，刘毅违背部領导小組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不听取办公厅領导小組其他成員的意見，提出"不追不批"的錯誤口号。刘毅在反右派斗爭中的錯誤作法，使办公厅的右派分子漏了网，中間群众沒有受到应有的教育。

刘毅虽然入党二十多年，但沒有很好的接受党的教育，地主資产阶級立場沒有得到改造。他在一九四六年任地委書記的时候，曾函告无極县处死与被刘毅遺棄之妻姘居的农民刘德辰，一九五四年此事被告發，受党內撤銷工作，行政上撤銷办公厅副主任职务的处分。一九五二年任地委書記时，因包庇反革命分子刘承樑（刘毅胞弟），曾受党內撤銷工作处分。但刘毅並沒有从上述两次錯誤中吸取教訓改造自己，反而一犯再犯，在这次党的整風运动中，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机，他一方面背着党組进行醞釀改組党組的活动，一方面大肆攻击党，丑化領导，煽动和率領右派向党进攻，企圖攻垮党組，篡夺領导，实現他个人的政治野心，並利用其領导小組長职权歪曲上級党組織的指示，使办公厅运动搞得不深不透。以上充分說明，刘毅是混入党內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純潔党的队伍，决定开除其党籍。

中共石油工业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楊海鵬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楊海鵬，男，四十四岁，山东省菏澤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菏澤地委書記，新乡市委書記，中央燃料工业部計划司司长等职，被开除党籍时任石油工业部計划司司长。

一九五五年楊海鵬調任石油工业部計划司司长后，就开始进行反党活动，与张美璠、苏凰結成右派反党集团（楊是这个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在整風期間，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反对中央和石油工业部党組，进行了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力圖篡夺領导权，妄圖以資产阶級的面目来改造党。

一、楊海鵬积極反对部党組和中央。他以討論党的方針政策問題作为幌子，用抓住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手法，顛倒黑白，拨弄是非，向党猖狂进攻。他在天然石油和人造石油問題上大作文章。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天然油与人造油並举时，石油部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而楊却无中生有的来攻击党組，誣蔑党組不执行中央的方針，不重視人造油的發展，“在人造油問題上是促退派”。楊海鵬对抗中央关于勤儉建国的指示，部党組在总結第一个五年計划时，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認为可以节約投資百分之二十五，而楊却反对，並組織計划司“算账”，企圖找到反对中央方針的“論据”。当計划司算出可以节約投資百分之二十八时，楊故意隐瞞不报。

楊海鵬在群众中制造反党輿論，在高級幹部哲学自修小組中

他提出軍人不能領导石油工业的反动論調，公开叫嚣要“轉业軍人回去”。这和社会上右派分子所說的“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的反动論調如出一轍，其目的就是要搞垮石油工业部党組，要共产党下台。

楊海鵬对部党組的成員都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在司局长以上幹部中进行挑拨，煽动群众攻击領导。

二、楊海鵬与张美璠、苏風等人結成反党小集团，窃据机关党委常委（他們是五个常委中的三个），把持了机关党委会，作为反党的陣地，乘整風之机，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他們在党委会上利用合法形式，相互勾結，一唱一合，压制民主，将别人意見頂回去，以达到向党組进攻的目的。他們在整風运动各个阶段都对党組攻击，誣蔑党組反右派有右傾情緒，在党委会上公开要求检查党組，誣蔑党組整改是“整下不整上”。当他們的这些反党活动受到周副部长的制止后，就大为不滿，貼大字报攻击周副部长，並揚言不参加党委会，以示对抗。他們排挤孤立党委专职副書記，背着副書記开小会。总之，他們把持党委会，企圖与党組分庭抗禮，作为他們反党的陣地。

三、楊海鵬积極支持包庇牟杰右派反党集团，作为他們向党組进攻的打手，以达到攻垮党組的目的。在整風第三阶段，在部长秘書中暴露了牟杰、凌欧等右派反党集团。这个右派集团趁双反之机，貼了很多恶毒地攻击党組的大字报，楊認为这些大字报“有力量”，是“对整風領导的鞭策”，备加贊揚。並叫牟杰“不要在小問題上打圈子，应該在方針政策問題上着眼”，这实际上是指示牟杰右派反党集团进攻矛头对准党組。当党委討論牟杰向中央写的攻击党組、誣蔑“石油部領导是阴暗角落”的匿名信时，楊表示同意牟杰的論点，要党組进行检查。当党委討論牟杰右派性質时，楊多方为牟辯解开脫，並与张美璠、苏風等勾結，阻挠对牟杰的斗爭。当牟杰反党活动已很明显，並調离部长秘書职务时，楊仍要牟杰到計划司当副科长，以此包庇牟杰，对

抗党組。

四、楊海鵬在整風反右派中包庇右派分子，进行煽風点火，封官許願，培植个人势力，和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楊海鵬在整風一开始就認为向党进攻的时机已到，积極进行反党活动，他在整風大鳴大放时带上行李，由城里搬到郊外，住在部宿舍，积極进行煽風点火的活动。他找肃反对象、对党不滿的分子談話，煽动他們向党进攻。反右派开始时，他即声称“計划司沒有右派”，公开散布右派分子“有好右派”，“个人主义出發的右派分子，不一定就是反社会主义”，“反右派也不能說共产党沒有缺点”等反动論調。在反右派过程中，一貫为右派分子辯护。他还对儲安平的反动言論，表示同情。

楊海鵬为了培植个人势力，对有严重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人百般迁就，封官許願，並且公开鼓吹資产阶級个人主义，宣揚“集体主义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沒有个人要求，就沒有集体要求”等反动观点，为他們的反党集团在群众中制造思想基础。

五、楊海鵬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不仅在石油部，早在他任菏澤地委書記时就一貫右傾，敌我不分。他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任菏澤地委書記期間，把一些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吸收到机关中来；一九五〇年初該区土改时，楊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場，誣蔑土改幹部“左傾残余思想严重”，把土改运动全部停止下来，使該区土改很不徹底，給該地区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整風前后，他还积極支持山东的菏澤地委屈国华右派反党集团，向山东省委进攻。他鼓励反党分子屈国华等要和省委及菏澤地委斗爭到底，“骨头要硬些”，“不要讓步”。

楊海鵬还有反对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党的粮食統購統銷政策的言行。

楊海鵬是个卑鄙的資产阶級个人野心家，在土地改革中，他就是一个右傾机会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头，他背叛了

党，背叛了无产阶級革命事业，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極右分子。

为了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巩固党的組織，增强党的团結和統一，决定开除楊海鹏的党籍。

中共建筑材料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陈新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

陈新，男，46岁，河南省新郑县人，大学程度，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八月参加工作。原任建筑材料部地質局副局长。極右分子。

于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十月曾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禁閉受审。保安处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的結論是：

1、陈新与陝公一期学生常流等嫌疑分子，坏分子組織的反党組織“卡尔学会”沒有組織上的关系，而是思想紧密結合，言行贊助关系。

2、陈新在河南新郑發展我党过程中，存在严重錯誤。在建党的組織路綫上，将地主紳士派、国民党分子、CC分子、复兴分子、自首分子、半官半匪分子拉入党內。在政治路綫上，使新郑党陷入新郑地主紳士派的斗爭。

3、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延安后，对領导不滿，說党的幹部政策是“重德輕才，任人唯‘牛’。”

一、陈新的主要反动言行是：

1、攻击党为統治者，並說：“党不能客观的發現自己的缺点。”“群众要起来革我們的命。”

2、为右派分子抱不平，說：“說人家是反革命，还不知誰是反革命呢？”

3、擅自在地質局群众大会上宣布汉奸李海鴻不是反革命分子，还在大会上代表組織向李海鴻道歉。

4、說“中国沒有地主”。

5、反对整風中的专案小組由党員来領导，主张由非党人士領导这項工作。

6、扩大宣传肃反的缺点，否定地質局肃反成績，同意成立“平反委員会”的反动言論。

7、誣蔑党的历次运动“都是左的开始，右的結束，糊里糊塗的下台，这就是我們（指党）运动的規律”。

8、反对党的幹部政策，說：“一百个工农幹部，也不如一个知識分子。”几年来一貫无原則的信賴旧知識分子，輕視和排斥工农幹部。

二、斗爭中的态度：被迫低头，承認錯誤。

三、处理意見：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設委員会整風領导小組对于右派分子罗維的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罗維，男，三十八岁，四川人，家庭出身小資产阶級，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九年参加工作，原任国家建設委員会燃料局副局长。

罗維的主要反动言行：

1、攻击党的幹部政策、人事制度和肃反等运动。

（1）大肆攻击人事工作，在全局鳴放大会上，罗維說："人事科长有些是負責同志的爱人，这种情况很多，做人事工作往往也是提升的捷径，有时为了工作，有时是为了湊数，就把自己爱人填上。能力又不强，分配工作上不懂业务，乱点鴛鴦譜，有时滥用党的威信，給你唸上个金箍咒"。並說："我發下狠心，我的爱人决不讓她做人事工作，要她憑本事吃飯"。会后佈置局內幹部摘录上述內容在委內张貼"罗局长鳴"大字报，影响很坏。

（2）攻击肃反路綫，否定肃反成績，並同情肃反对象。在六月十一日燃材局党支部大会上，罗說："我們用群众运动的办法搞肃反，亦有問題，打中的命中率不高，我認为应以科学的办法来搞"。又說："肃反对象是否一律要搜查，我們不是公安人員，前去搜查是否合法？"並在会上要別人为肃反审查对象罗新說情。

（3）在鳴放期間，当局內其他右派分子大肆攻击老幹部时，罗亦說："老幹部不称职是有的，有的身体坏，有的文化低，有的摆得不当，不能担任工作。"又說："职与級合一是耽誤工作的，因此职与行政級别应分开。"

2、縱容与支持其他右派分子和煽动一些有錯誤思想的幹部攻击党的領导，特别是国家建設委員会党組和党委。积極主編了两期"燃料局論壇"反党大字报，支持右派向党进攻。認为局內刘影（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論有思想性，拒不原文披露刘影的反党言論。罗还洩漏了局长、支書联席会議上不应外传的一些情况。支持燃料局幹部出"向党組呼吁"的大字报，並說"应該大喊大叫"，于是引起局內幹部思想混乱，紛紛指責党組、党委領导整風不力，甚至有人在听了罗的煽动性的談話后，想要向国务院写請願書。

3、与社会上右派分子共鳴。罗說："人民大学有个講师

（葛佩琦）說：現在的党群关系比解放前相差十万八千里，他說得很中肯"。罗对"电影鑼鼓"、"新西遊記"都感兴趣，認为有道理。

罗維在斗爭中的态度：在听了六月十八日王副主任在全委党員大会上指名批評燃料局領导有問題后，才开始察覚到自己有問題，向領导上承認自己有錯誤，但对錯誤的严重性認識很差。在斗爭初期，罗的检討仍避重就輕，躲躲閃閃，不敢正視自己的錯誤。經过多次的批評和斗爭后，对其反党言行逐漸有所認識，表示低头認罪，願意悔改。

处理决定：开除党籍。降职、降級、降薪，由副局长降为科长級，由10級降为14級。

中共城市建設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牟宜之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牟宜之，男，49岁，山东省日照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旧官吏。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任县长、支队长、軍区参議主任、旅政治部主任、軍区敌工部部长、北京市建設局副局长、林业部經营司副司长等职。一九五六年二月調城市建設部公用局任副局长。

牟宜之曾于一九二五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后脫团，經国民党中央委員丁惟汾（牟的姨夫）介紹去日本留学，后任过国民党山东日报社經理兼編輯，外交部額外科員，乐陵县长，后經我党爭取起义。

主要反动言行：

1、誣蔑毛主席。

2、不同意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誣蔑人民代表大会說：“人代大会是对共产党歌功頌德，代表則是检查錯誤。”还反对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

3、誣蔑我們的工作說：“成績是次要的，缺点是主要的。”並說：“农业合作化后产量降低了，农民生活仍然很苦。”說城市建設部是：“离心力大，向心力小，若說一声可以自由选择工作，便会一哄而散”。

4、誣蔑苏联說：“波匈事件是因为大国欺負小国，苏联駐軍軍費就地筹給，軍紀不好，引起人民不滿的結果”。說“苏联出兵是干涉匈牙利內政，要栽大觔斗”。說苏联专家的建議不值得学習。斯大林一点成績也沒有，真是一塌糊塗。

5、否認历次运动的成績說：“三反、五反錯誤很多。延安整風偏差很大，如果我参加了延安整風运动，一定把我整成太阳牌的日本特务或整成青白牌的国民党特务，或双料的。”

6、留恋剝削生活，对現实不滿說：現在的生活不如当国民党的县长时舒服，現在的生活好比无期徒刑，象坐“囚籠”。

7、贊賞“花丛小語”說：其中写的詞很好，不同意有人写文章批駁。認为“草木篇”不一定是坏的。說民用設計院極右分子王功溥在辯論会上猖狂向党进攻是“真有勇气”。

牟宜之的这些反对党的政策，否定社会主义建設成績，誣蔑党的領袖，誣蔑苏联的言行是右派言論，是属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質的。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划牟宜之为右派分子，因此經部党委討論决定开除牟宜之的党籍。

中央批示：同意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开除右派分子牟宜之的党籍，行政上降职、降級、降薪的处理意見。

中共水产部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极右分子刘乐川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

刘乐川，男，四十二岁，山东省邹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一月参加工作，同年七月参加共产党，历任山东第三支队司务长，渤海軍区二团供应处长，渤海行署工商局副局长、进出口管理局长，山东省貿易总公司副經理、商业厅副厅长，中国油脂公司經理，中国水产供銷公司經理，一九五六年五月来水产部任党委書記、供銷司司长。中共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山东代表。

主要右派反党事实：

（一）积極組織反党宗派活动，拉攏邵春三、郭宝德、袁汝信等，作为反党骨幹，利用黃滌塵、王能贻、楼惠芳、何志枢、刘光世等一批右派分子作为积極分子，而且企圖把他們拉入党內。整風鳴放中，向党猖狂进攻，有組織地在群众中散布反党和污蔑領导的言論。宣揚外行不能領导內行，說高副部长是搞輕工业的，张副部长是搞政治工作的，不懂商业。他把供銷局与部的关系看成是“主要矛盾”，以煽动群众。他大力制造党組有宗派的謠言，說部里“經常三三两两决定問題”，把一九五六年“八大”学習会上对他的批判說是以高副部长为首的“宗派集团”有意的整他。他对部党組成員进行人身攻击，背着領导和組織在宗派集团中醞釀改組部的党委，同时阴謀控制部的人事部門。

（二）积極包庇右派。利用职权，操縱組織，为已經暴露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掩盖罪恶，或减輕罪責。他对右派分子王

能贻的反动信密而不宣，排队中又把他划为“左派”。人們揭發右派分子黃滌塵的反动言論，他不加理睬，最后也把他划为“左派”。在研究右派分子楼惠芳的問題时，他主张只能划为“中右”。党內右派分子何志枢也是划为“中右”，許多党員認为何志枢无論如何是不够預备党員資格，堅持取消他的預备期，但在刘乐川等的操縱下，不顧其他同志的反对，支部仍然把他留在党內。右派分子刘光世的許多反动言行也被刘乐川等所掩盖，在处理中，他又極力主张由二类降为四类处理。右派分子兼反革命分子张爔，部五人小組按照中央十人小組指示精神認为应予开除、劳动教养，在征求供銷司支部意見时，刘乐川堅持按“中右”处理。並說：“张爔的言論只是發牢騷，不能作为右派言論”，又說：“他是个老右派，你排他也是右派，不排他也是右派，算了吧！”。

（三）挑拨团結，制造分裂，玩弄手段。刘乐川利用水产部幹部来自各方的特点，进行挑拨，在領导人头上划框框，把高副部长和张副部长分为“輕工业部来的”和“商业部的”两个“对立面”，他把张副部长同意高副部长的意見說是“倒在高副部长那一面去了”。他用歪曲事实来挑拨水产部与商业部的关系，把水产部对供銷工作的检查，說成是“否定商业部过去的一切”，並指使亲信在群众中散布。他在供銷幹部中暗中組織脫离水产部領导的非組織活动，在各地供銷系統內挑起对部和对地方党委的不滿。他把支部組織作为反党的工具，他的反党言論和包庇右派等活动，大都是先在党支部委員会研究討論过或作出正式决定的。

（四）全面反抗党的政策和部的决定，制造独立王国。近两年来，水产部根据上級指示精神，对供銷工作作了許多决定，但刘乐川一向不貫徹执行。例如：水产部决定供銷企业下放，刘乐川抗拒了一年不执行；水产部在执行国务院决定开放国家領导下的水产品自由市場时，刘乐川初則消極抵抗，繼則到黃海、渤海

沿岸省市大肆宣传放任不管，提倡“随行就市”，主张“乱它一年再說”。水产部决定水产供銷企业不搞零售，以免和地方有关商业部門發生矛盾，而刘乐川則在各种会議和群众場合上大作扩大零售的宣传，並亲自到天津、浙江、上海等地指示当地公司經理开展零售，經地方党委反对，而仍然坚持。在海上收購、划片供应、利潤等問題上刘乐川也同样採取反抗的态度。

刘乐川在党的帮助教育下，也曾作过一些工作，並曾受到党的提拔，但他思想上有着極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平时驕傲自滿，目中无人，屡教不改，把党的提拔看成是实現个人野心的机会，把为党工作看成是升官的手段。从一九五六年末当上部长助理以后，即开始对党不滿，到处發牢騷，講怪話，进而对党抱着仇視的度态，一直走上反党的道路，墮落成右派分子。

刘乐川在斗爭中态度是極不老实的，猖狂的，当被揭露之初他就在司內宣布：“我們不是躺下了，而是站起来了”，繼續鼓动群众向党进攻，接着三次与邵春三訂立攻守同盟，抗拒交代。以后虽然在大量事实面前，作了几次检查，承認了某些錯誤，口头上表示願意悔改，但仍然是避重就輕，沒有主动交代任何材料，並无真正悔改的表現。

鑒于刘乐川的情节严重，拒不悔改，决定划为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按二类处理，监督劳动，並建議撤消其中共“八大”代表資格。

中共农业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子敬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六日）

张子敬，男，四十四岁，山东单县人，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份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五年入党，現任农业机械局局长。

一九三九年在湖西地委肃托事件中被停止党籍，一九四五年恢复。土改时賤买群众斗爭果实，並利用貪污的过期粮票一千五百斤，买大車一輛，受劝告处分。一九五一年在天津农垦局工作时与特务分子索影、嘉璇乱搞男女关系，並相約保守秘密，后因对方自杀未遂，交出証件，张才承認，受劝告处分。三反时，因貪污和包庇反革命分子被停职反省，因病住院未作处理。

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张子敬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附和並支持右派分子关于成立平反委員会、撤銷党委书記、副書記的整風領导小組成員职务的主张，並且認为“部长听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司局长听部长的，这样农业部是否需要存在？”他在幕后为其他右派分子出謀划策，煽風点火，公开向右派分子表示志願当“参謀”。包庇右派分子楊錦潤，打击积極分子，阻止反右派斗爭。平常一貫对党不滿，向党鬧独立性，經常在非党人士面前散布他过去在“湖西肃托事件”中曾受冤屈，从而說明党在肃反中的錯誤，影响很坏。在局整風动員会上說：“八大”后阶級斗爭消灭了，資产阶級是阶級兄弟，民主党派是兄弟党派。在反右斗爭中态度不好。

根据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决定开除张子敬党籍。

中共农业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孙森甫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孙森甫，男，现年四十五岁，河北省武邑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一九三一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被捕向敌人自首，並在北平晨报上登过声明退出共产党的啓事。一九三八年又混入党內，现任农业部人事司司长，党委副書記。

孙森甫虽入党多年，但始終感到自己曾經在历史上自首变节，平时总怀疑党对他不信任，因而，离心离德，对党不滿、面目灰色阴暗。在人事司工作期間，与司內一些政治不純、历史不清的人形成小宗派，互相吹捧，对領导阳奉阴违，在执行幹部政策中表现了"不問政治"的資产阶級傾向。他曾說："老幹部不行了，不能担当建設任务，应大力提拔青年大学生来代替。"又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人，誰还沒点問題！"所以，用人不看档案，不加审查。俄文翻譯史珊因其父亲是軍統特务，未被批准出国，孙不滿意地說："人家父亲是軍統，女兒也是軍統嗎？就不讓人家出国！"对于保衛部門提出的将不适合在要害部門工作而需要調出四十余人的意見，也一再拖延，不予处理。

此次整風期間，孙森甫又利用大鳴大放的机会，縱容右派分子点火向党进攻，当部內大量出现反党大字报的时候，孙仍在司內提出"大鳴大放，迎头赶上"的口号，並暗中煽动写丑化党員的大字报；贊許右派分子要求撤銷党委書記左叶和副書記謝文景的整風領导小組成員的职务的主张；他身为农业部党委副書記与統战委員，竟然同意农业部四个民主党派要求成立平反委員会及

民革支部要求参加整風領导的荒謬建議。

四月三十日在民主党派联席会上，右派分子說：共产党有"三付鏡子"（看近不看远的近視鏡，看人一团黑的墨鏡，找小毛病的显微鏡）和使用党外人士的"三个头"（用时磕头，不用时搖头，用完后杀头）。孙說："三付鏡子"、"三个头"使我們很清醒，教育意义很大。反右派斗爭开始后，孙又违背党的指示，按兵不动，推迟和阻碍了人事司內的反右派斗爭。

以上事实說明，孙森甫已經由平时的对党怀疑不滿和在执行幹部政策中的一貫右傾而墮落成为反党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

根据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決定开除孙森甫党籍。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七支部委員会关于極右分子徐盈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簡　历

徐盈，四十四岁，山东省德县人，家庭出身小資产阶級，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長期在大公报作記者，在入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学習以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現为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七支部学員。

二、主要錯誤事实

（一）徐盈有系統的資产阶級新聞观点，即"新聞自由"、"同人办报"和"尊重报人"。他認为現在的新聞"不自由"，

主张新聞不需經过党委审查，党組討論，要求記者採訪不通过組織，报道应当“暴露阴暗面”，“而且不要怕片面”，並且說中国新聞的传統，就是“放”，就是“反”。他反对新聞事业的計划性，主張自由办报、自由採訪、自由發行，到处称頌文匯报的資产阶級方向。徐盈的所謂“同人办报”，“尊重报人”就是主張办不要党領导的报紙，要尊重象徐鑄成、儲安平、王芸生等所謂“老报人”，並且应給以不受干預的权力。总之徐盈認为党对新聞事业的領导、新聞政策、办报路綫以及有計划的統一管理等都是錯誤的，应在新聞事业中，全面恢复資本主义。

（二）徐盈参予章、罗联盟在新聞界的右派集团，充当新聞界右派向党进攻的幕后“軍师”。徐盈与彭子岡（徐妻）两人，跟儲安平、浦熙修、徐鑄成等人，互相串連活动，密謀篡改光明日报、文匯报的政治方向，並且“与王芸生勾結，对大公报也要捞一把”，夺取党的領导权。在“鳴放”期間，徐盈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跟儲安平一起，对办报方針、改版方案、派人到九大城市“点火”、成立小組織，以及排挤报社內全部共产党員，重用右派分子等一系列反动的計划与步驟，都进行了密謀。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發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論，当晚王芸生、浦熙修等又齐集徐盈家，共同研究了对策。

（三）反对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当前阶級斗爭的存在，反对党的領导，反对无产阶級专政。他說：“不懂理論，学了理論，拿到就用，要犯‘教条主义’，学多了就会向修正主义發展”。他認为“英美有政治民主”，中国的民主党派，应該和共产党“平起平坐”，“不必受共产党領导”，“不必改造”。並認为阶級斗爭已經过时了，目前无产阶級与資产阶級的关系，“只是人与人的关系”。他贊成儲安平“党天下”的謬論，認为国务院“应有几个非党副总理”。他反对党領导科学和大专学校。

（四）徐盈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成績。

他不承認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他到农业展覽会去，专找农业增产数字有多少"虛假"，还到党校附近的大有庄进行了調查，訪問了一个"单幹"戶，說这个"单幹"戶"地里活作的好"，"合作社不务正业，所以不参加"，以此来宣传"单幹"的优越性，他在調查以后为两个劳改的地主"抱不平"，借口他們曾作过頤和园导遊，認为应把他們調回頤和园，使之"人尽其才"，他也同意李景汉的北京郊区"調查"，怀疑"今天不如过去"。徐盈埋怨党的肃反政策和对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認为："把他們斗得太厉害了"，"他們心中害怕"，"写不出文章来了"，党应給他們"学术自由"。徐盈对計划供应和取消蔬菜自由市場也極其不滿，認为这是"物資少了"等等。

（五）有計划、有預謀地利用整風机会，攻击党校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脫离群众"，污蔑党的高級幹部已"腐化墮落"。徐盈認为"克服三个主义需要用'棍子'，就象列宁反对馬赫主义，对賛鬼綠鬼要一棍子打死，势不两立"。他无数次攻击党校是"教条主义"，並且說应請党外社会名流参加教研室。他污蔑党校对郭大力教員是"宗派主义"，並且特地訪問了郭教員的家屬，进行挑拨，更企圖借此煽动同学們向学校进攻。同时他还到永利农业社"調查"农民对学校蓋房子"佔用土地的意見"，"調查"学校幼兒园的經費开支情况，来說明党校"脫离群众"。他还到衛生科、儲蓄所等地方进行一系列的"調查"，甚至硬把学校附近小舖的營业額，也跟高幹的"特殊腐化"联系起来。更恶毒的是与其妻子彭子岡两人捏造事实，由彭子岡出面向校长写信进行攻击，並且别有用心地提出整風应以整"校風"与高幹的"腐化墮落"为內容，企圖借此轉移反右派斗爭的鋒芒。

三、錯誤的根源

徐盈之所以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猖狂的进攻，是有其社会、

历史和思想根源的。他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个善于伪装与进行政治投机的个人野心家，就是一貫崇美亲蔣反苏反共和忠实于資产阶級的右派分子。

徐盈在学生时代，即深受"平民教育会"的影响与奴化教育，形成他反对革命、反对阶級斗爭而主张"技术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一九三七年他进了大公报社，投靠国民党政学系，积極为政学系的"政績"和反共作宣传，並且一連写了"旧匪区的新印象"等反动透頂的通訊多篇。当他一九三八年混入共产党以后，曾与扫蕩报記者軍統特务王乃昌、伪中央社記者田玉振成立"記者联誼会"，並且于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連續著文为蔣介石、蔣經国、韓德勤、楊森、张群、吳鼎昌、薛岳等反共头子歌功頌德。咒駡"共产党在后方搗乱"等，繼續进行反动活动。

抗日战爭胜利以后，特别是解放战爭中，徐盈更多次进行恶毒的反共宣传，同时为"第三条路綫"宣传。他曾污蔑共产党"不守信义"，歌頌国民党的"建設"是"养鷄取蛋"，駡共产党的政策是"杀猪拔毛"；並且曾宣传美軍到东北，"不是为了参加战爭，而是为了播种和平"。在这个时期，徐盈是儲安平、费孝通、王鉄崖、楼邦彥、张东蓀等"观察"小集团中的一員，跟錢昌照、吳景超、肖乾等"新路"集团的关系，也極深厚，特別跟胡适的往来極为頻繁。这些人都是以"第三条路綫"为标榜的，徐盈除大捧胡适、李宗仁並且宣揚他們的主张外，还大捧司徒雷登，宣传他的"中国需要新革命运动"的反动謬論。这样徐盈除以国民党政学系做后台外，又多了个"第三条路綫"的靠山。

徐盈一貫为官僚資本、資产阶級辯护和吹嘘。他認为官僚資本应該叫作"国家資本"，把官僚資本的垄断，說成是："有計划的工业化"，把国民党勾結帝国主义出卖主权的行为，說成是"利用外資"，"是工业化所必須的"，对資产阶級同样歌頌备

至，認为資本主义的發展，是任何銅墻鉄壁也阻止不住的。他把資本家都形容成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伟大实业家”。一九四八年更刊發单行本“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为张嘉璈、翁文灏、卢作孚等买办、官僚、資本家捧場頌揚，而徐盈自己，一九四七年又成为大公报和“观察”的股东了。

徐盈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天津解放以后，仍然坚持他的反动立場，始終与党对立。如北京解放初期，他不仅未給党提供旧新聞广播事业的一点綫索，还企圖探听我們接收的策略步驟。天津解放以后，他不滿意党把天津大公报改为进步日报，而企圖把进步日报改变成为資产阶級及其知識分子服务的报紙，並且企圖利用銀行貸款，进行新聞紙的投机。当这些行动受到党的批評时，他就更加怀恨，認为他是“有职无权”，“处处不自由”。

徐盈的入党以及他为党做的一些工作，只不过是为了掩护其反动面目而已，二十年来他的反动思想与立場，从未有过改变，甚至在全国解放前夕，仍然認为“共产党管理不了中国”，將和“李自成一样的要腐化和失敗”。特别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以后，他就以为苏联“不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行了”，而且中国“也要变”，因此他就不顧一切地参加了資产阶級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复辟”活动。

四、对錯誤的态度

反右派斗爭以来，徐盈一直避重就輕，装老实，装糊塗，在关鍵問題上狡辯抵賴，企圖蒙混过关。但在同志們的揭發与批判下，他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低头認罪，承認他一系列的反党活动罪行，並願意重新作人，可是他在重要关鍵問題上，如新聞界右派集团的具体活动和他个人野心方面交代的还不够徹底。

五、結　論

根据以上事实，說明徐盈是一个採取两面手法，披着党員外

农，一貫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远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已表現了他的資产阶級右派的政治面目，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他就更加仇恨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就更露骨地大肆活动，成为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的內应和新聞界右派集团的“軍师”，恶毒地攻击党的領导和党的一些重大的方針政策。据此，他是一个党內的極右分子。

根据以上結論，支部一致通过对極右分子徐盈給予开除党籍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財政部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齐佩軒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五日）

齐佩軒，男，四十六岁，河北平山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小学教員。共产党員。原任財政部国防司司长，一九五六年到高級党校学習。

齐在一九二八年曾参加国民党，一九三二年脫离关系，已有結論。

一、主要反动言行：

1，在鳴放期間，为河北石家庄市郭辛光貪污案件呼冤翻案，並查出他在一年前給中央和有关領导同志写了四封匿名信，在这些信件里，对党和領导进行了恶毒地攻击。

（1）他說：“郭辛光实际上沒有貪污，是公私不分”，誣称郭辛光案件是“冤獄”。

（2）污蔑郭辛光是在河北省委指示下打成大老虎的。並把

領导打虎的幹部和积極分子說成是"别有用心，感情用事"，把这些人比作湯勤，說他們"比湯勤还坏"，"因为这些人把郭幸光打成了老虎有功，有的升了官，有的落个积極分子"。並污蔑造謠說：石家庄市委有宗派主义；定案結案不积極；不准郭向中央申訴；中央监委处理郭的申訴时"拖拉，官僚主义严重"；並无中生有地說："这种例子在党內不是个别的"，攻击中央不能毅然决然的处理問題。

2，歪曲事实，他認为党中央对一九五三年在財政工作上犯錯誤的有关幹部的处理不公平，他說："×××同志受批評以后，却坐了直升飞机，×××倒受了处分。"

3，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認为八大选举办法不民主。

（1）說："指名选代表就是不民主的表現，去年（一九五六年）財政部指名选八大代表是中央領导同志不民主，不从团結出發……"。並說他的意見可供九大参考。

（2）攻击中央負責同志，說："××同志在粮食統購統銷中一句錯話——免不了死人的——有差之毫厘，謬之千里之感"。

4，支持右派言論，攻击党的領导。

（1）說："国务院付总理那么多，沒有一个民主人士，应該增加党外付总理"。称贊右派分子章乃器"有本錢"。說："林希翎不是反革命，根据我們的經驗，反革命不会这样幹！"。

（2）他看了右派分子张轸对賀龙同志的攻击后，就把我党的高級幹部和党組織的作風概括为"盛气凌人，宗派主义"；他还借党在肃反中对傅鹰的处理来攻击我党的基層組織，

5，否認党領导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性和成就，怀疑粮食增产、农民生活提高，党能代表农民利益，

（1）他說："合作化以后，农村問題严重：統購統銷有付作用；合作化冒进；社大幹部弱，当不了家；工农待遇悬殊，农

民生活苦，有病看不起，上不起学”；“从农民那里拿的多了些，农村老百姓普遍不滿”；“农村不太平，我們专政是不容太平的，如不警惕，有流血的可能……”。

（2）他認为现在应該有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好替农民說話。

（3）他認为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数字不实，連一百亿斤也达不到，他說：“下边随便报上来的数字，領导上輕易相信了”。並要追查数字不确的責任。

（4）他說：“工业化快了些，預算上积累多了些”。

二、在批判斗爭后的态度：在斗爭初期，态度不好，甚至大發脾气，謾罵給他提意見的同志；斗爭后期，表示低头認罪。

三、处理意見：开除党籍。行政上降职、降級、降薪。

中共司法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極右分子王怀安的結論及处理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王怀安，男，現年四十三岁，四川省自貢市人，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本人成分学生，大学肄业，一九三七年参加救亡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四零年到延安后曾任延安市青年联合会主任、陝甘宁边区法院审判員，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在陝甘宁边区保衛处被审查。一九四六年到东北后任过哈尔濱市法院院长、东北司法部秘書长，一九四九年調司法部任办公厅主任，党內任党組副書記。現为司法部党組成員、部长助理兼普通法院司司长。王怀安入党后，隐瞞了他在一九三六年冬或一九三七年春会見川大軍訓主任刘某以及一九三九年未經党的允許会見川大校

长程天放（CC大头子）的政治历史問題，直至今年全国司法会議批判斗爭时，他才作了交代。

王怀安是个徹头徹尾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是"司法部反党集团"的"軍师"。其主要右派言行：

一、全面的一貫的反对无产阶級专政，篡改人民法院的性質和任务。他在起草法院組織法过程中把法院是"阶級压迫的工具"篡改为"与一切违法現象作斗爭的工具"，把专政的矛头指向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幹部。在他所写的"当前农村犯罪情况的报告"中，歪曲和扩大事实，說"站在法庭面前受审判的对象——刑事被告已由敌对阶級分子旧社会渣滓占絕大多数的情况一变而为劳动人民占絕大多数的情况了"，企圖把敌人当人民加以寬縱。他把党对刑事罪犯的"懲办与寬大相結合"的政策篡改为"教育与懲办相結合"。他还把少奇同志一九五零年对律师工作"为工农兵服务"的明确指示，篡改为"为被告服务"。强調律师防止錯案的作用，提倡律师以办刑事案件为重点，主张院长不能干涉律师办案，到处宣揚律师是检察院的"反对派"。在律师組織建設上积極主张一下鋪开。

二、强調"审判独立"，恶毒的攻击党的領导，污蔑党有"懲办情緒"。他說："党自执政以来，就滥用专政武器，乱打一起，将已低头的人拿来再打；也将有历史污点的人、甚至思想落后的人拿来狠打，有专政过头的。"在他写的"当前农村犯罪情况的报告"中，公然煽动"司法机关必須坚持原則，依法办事"，"对来自某些幹部和某些部門的懲办情緒的要求不要迁就"。他污蔑"党委对业务不够熟悉"，並利用講課和检查工作的机会到处煽动法院幹部"不能当豆腐院长"，"要有包拯、况鍾精神"，律师要"骨头硬""有胆量"。王怀安对党委审批案件非常反对，为了寻找反党根据，拟制調查表調查党委錯批的案件。在四川大邑检查工作时，他污蔑大邑县委領导的鎮反运动是一团糟、"拒絕坏人向善，树敌过多""坦白不从寬""立功不

折罪"。攻击审判人員不执行法院組織法規定的"合議庭"，瘋狂地辱駡司法幹部"不守法""无法无天""独裁""野蛮"剝夺被告辯护权，"品質恶劣""加油添醋""为了戴稳自己的烏紗帽，求得一时的安宁，不惜讓别人坐牢"。他还污蔑党委統一領导下的公、检、法統一对敌的作法是"一杆子打到底"。

三、狂妄地攻击党中央。他恶毒地說"錯案是普遍的，如非来自中央那才是怪了哩"。他攻击鎮反"运动指导有問題"，是"主观布置数字，扩大敌情，致下边有的为了凑数，硬找专政对象"。

四、拚命地攻击公安，說"审判机关解决具体案件的作用沒有發揮，案件的命运掌握在公安，似乎审判是手續。"

王怀安在斗爭中的态度及表現：

从去年九月后，党一再讓他好好检討，他却狡猾低賴，企圖蒙混过关。經四届司法会議及广大幹部的揭發，徹底暴露了他的右派面貌。經群众多次批判，王怀安已經低头認罪，願意悔改，写出了检討，向党請罪。

对王怀安的結論及处理意見：

王怀安是一个混进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自党审查他的历史后，就一直对党仇恨，但表面上却伪装积极，騙取了党的信任。公然扛着旧法大旗，認为自己是"法律內行"和"权威"。对待幹部恶霸作風，稍不如意，即加訓斥和攻击，整得幹部伤心流淚。最近几年給郑紹文、陈养山出謀划策，充当"軍师"，更加瘋狂地反对党的領导、反对无产阶級专政。参加司法会議的同志反映，他比下边司法幹部中的右派要恶毒的多。王怀安在检討中也承認自己的反动思想是系統的，罪行是恶毒的，流毒是深广的，是一个極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决定依照中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共产党員中的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党籍"的指示开除其党籍，並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国家机关薪給人員和高等学校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处理原則的規定，按二

类“监督劳动”处理。

中央批示：王怀安是極右分子，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监督劳动。

中共监察部第一司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極右分子李沐英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

李沐英，女，五十五岁，湖南省岳阳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二六年入党。反右派斗爭前任监察部一司司长，党組成員。三十余年来，党培养教育她，委之以重要的工作，而她却一貫对党不滿，散布反党言論。从李沐英的自传、平日的言行和同志們揭發的材料証实，她的反党行为，是一貫的、全面的、系統的，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極右分子。

李沐英反对党所領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否定社会主义建設的成績：她誣蔑历次运动是“只要任务，不要政策，宁左勿右”；搞运动“根本不是办法”。她說我們在“各个时期和各項工作中都是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国家化錢不少，而群众受益不多，甚至反而受害”。她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幹部政策和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反对粮食統購統銷和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她誣蔑領袖，誣蔑中央說：“集权时，中央什么都統，分权时，則放任自流”。他說領导不民主，“集中近乎专制”。她認为服从党的領导和堅持原則是对立的，主张监察机关和党分庭抗礼，並誣蔑党組織遵照中央的指示进行工作，是“看中央的眼色行事”，“生怕违反領导意圖”。她将国家幹部說成是爭权夺利，互相排挤和欺压群众的人，說积極分子是“品質恶劣”的人，对这些人，他进行打击、

刁难，主张懲罰。而对反革命分子則千方百計的庇护；在旅大工作时，她将国民党骨幹分子李际閻、逃亡地主彭一心，引进国家机关工作；在肃反时，为反革命分子尹恒、胡清华等辯护，向他們通風报信，並搜集不确实的反面材料，与組織对抗，企圖否定这些人的反革命事实或減輕他們的罪責。

对于李沐英，党的組織和領导同志，曾多次对她进行教育、批判，並曾予以党紀处分，她始終拒不改正。当整風运动开始后，即配合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攻，終于墮落成为右派分子。为严肃党的紀律，純潔党的組織，經支部大会討論通过，决定开除其党籍。

中央批示： 开除李沐英党籍，行政上撤职，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王善玲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

王善玲，女，三十八岁，山西省左权县人，家庭出身中农兼小販，个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入党，現任劳动部工資局副局长。

历史上的关鍵問題：王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本人幼年亦系天主教徒。

主要反动言行：

1.丑化党內生活：（1）她說：不仅党群之間有墻有沟，党內上下之間亦有墻有沟。等級制度是产生墻和沟的原因。並造謠說：劳动部科員对科长，科长对处长，处长对司长，司长对部

长，層層有意見。（2）高級幹部特殊化，吃得好、穿得好，小汽車、小公館比国民党还多，真是小公館林立，小汽車川流不息。說高幹生活尤其要降低，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3）高幹換老婆之風盛行，比国民党作官的还坏，国民党作官的多妻还要养活，而現在高幹換老婆，丢了什么也不管。（4）党內存在着打击报复現象，有时不在形式上，而特別在調动工作，或評級的时候給小鞋穿，实际上是言者有过。

2.攻击中央的方針政策和政治运动：她說：（1）中央政策左右搖擺，工作忽左忽右，……一些运动初期总是反右，中間就左了些，后来又糾正。（2）土改斗爭了知識分子。我認識的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是同学，后来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关起来了，有的自杀了。据說那时在本地工作就危险，离开本地工作就好些。（3）肃反工作准备不够，就拿劳动部来說，排队不仔細，結果斗爭面很大，时間拖长，方式也有点过火。（4）国务院發言人說的話（关于物价問題答記者問——注）不符合实际情况，縮小了缺点，缺乏自我批評。硬說物价沒有漲多少，这是不說实話。

3.对中央負責同志的講話妄加批評。她不同意康生同志所說一九四二年整風时，党就採取了"团結——批評——团結"的公式，認为"事实不是这样"，"估計过高了，夸大了成績，沒有自我批評，不能以理服人"。

4.同情社会上右派分子的言論，認为龙云所說幹部子弟学校学生生活特殊是事实，指責一〇一中学学生在报上反駁龙云的信"与事实不符"。

斗爭中的态度：在反右派斗爭初期检查很不深刻，后来当运动继續深入，党組織指名要她进一步检查之后，态度較好，检討比較深刻，表示誠意悔改。

处理意見：同意高級党校开除党籍的决定，根据高級党校的建議：因王善玲态度好，决定行政上給予降职、降級、降薪的处分。

中共北京劳动幹部学校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罗青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

罗青、男、五十七岁，江苏江都人，出身于富农兼工商业者家庭，个人旧职員成份。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四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现任北京劳动幹部学校校长，系极右派分子。

罗青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前，曾任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員、改組派江苏省会特委書記，石友三部八师秘書长等职。写过“在显微鏡下的共产党”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反共文章。

一九四七年因伪造历史，貪污腐化，包庇帝国主义分子和地主，及反党反領导等錯誤，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全国解放后，包庇过反革命分子。

主要反党言行：

1. 积极参与复辟資产阶級社会学的活动、吹捧右派分子陈达，为其人口論文主持座談会，並修改資产阶級右派阴謀复辟社会学的六九会議記录，支持右派分子袁方在劳动幹校組織劳动問題調查研究組等非法活动。

2. 煽風点火、向党进攻。擅自在学校教員中搶先鳴放，制造声势，向部領导施加所謂群众压力；对右派分子蔡尙忠說：“你不是对肃反有意見嗎，講吧、我給你撑腰”。給領导上写信污蔑說：“在党中央各部及国家机关各部、委的部长級党員負責幹部中，驕傲自滿，用人唯亲，对中央报喜不报憂，工作上不称职。在党內不得人心者，大有人在”。

3. 极力包庇右派分子，打击反右派积极分子，不执行劳动部

領导小組指示在幹校抓紧时机大鳴大放，而按兵不动，並把一部分教員分散下厂实習，或回家探亲。反右派斗爭开始后，在校作报告时說：“幹校还未發現右派分子”，“資产阶級思想不一定全是反动的”，並打击反右派积極分子，为陈达、袁万等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辯解。並为陈达代写在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發言检討書。

4.歪曲党的办学方針，破坏党对知識分子的政策。在幹校提出“为教学服务实質上就是为教員服务”，用所謂教員高人一等，用名誉、地位、物質享受拉攏教員。还說：“工农出身的老幹部，沒文化、沒用处，最好派到殖民地国家帮助那里的共产党和人民打游击”。

5.制造宗派活动，破坏党内外的团結。他常在教学人員中，散播流言蜚語，无中生有地把部的領导分成若干小集团；在幹校制造宗派活动。他在教員中散布說：学校主要矛盾是党与知識分子的矛盾，是工农幹部与知識分子的矛盾，並說其他領导同志是外行，不能領导教学工作等。

6.罗青在一九五一年包庇赣南血案残杀陈贊賢同志的禍首反革命分子倪弼，在整風期間替浙江馬文車（極右分子）呼吁处境不好，要求在北京安排其工作。

罗青的态度不老实，一面承認是右派分子，一面又到处写信喊冤求情。一面承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面不承認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

根据上述一系列的事实說明：罗青是一个混入党內的官僚政客，阶級異己分子，个人主义野心家，是个極右分子。对于罗青的处理，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經过幹校教职員支部大会通过，並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四日党委会决定，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並建議行政上給予应得的处分。

中央批示：开除罗青党籍，行政上撤消其原有职务，留用察看。

中共对外貿易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郭超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六日）

郭超，男，五十岁，湖南岳阳县人，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份职員。一九二七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广州暴动时被捕入狱。出狱后找到了党的关系，后因逃回家乡与党失掉关系。一九二九年三月在鎮江恢复了党的关系，七月又被捕入獄。一九三二年三月释放出獄后回家，一九三八年恢复党籍。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在延安党校学習。以后历任稅务局副局长，华北貿易总公司会計訓練队办公室主任，中央貿易部人事司处长、副司长，反右派斗爭前任中国畜产公司副經理。

郭超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

（1）公开誣蔑和破坏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和統購統銷政策。說："据我了解，目前农村中沒飯吃的农民佔了五分之四。其原因一是定量太高；二是留粮不合理；三是农业社办快了"。"农民在搞互助組的时候，劲头都很大，生活也过得富裕，搞了合作化，生活下降了"，"入社家家沒飯吃，单幹年年有余粮"，"合作社搞得太性急了，有些冒进"。郭超还疯狂地向中央建議："从目前起，对农村粮食一定要放宽些，保証大家吃飽飯"，"对那些要求退社的可以进行慎重的客观的审查……可以視情节批准个别人暫时退社"。

去年四月，郭超返回湖南岳阳老家探亲期間，曾接见了四、五百个农民，其中不少人是地主富农和上中农，郭超对五戶不滿合作化的富裕农戶說："可以退社，如不讓你們退社，就可請願

喊冤，他們也不能把你怎样”。郭超曾为他表弟李亘清写信給乡人民委員会要求退社。他写道：“我同意李亘清退社，是否乡政府同意”。郭超还为地主劣紳李正国写信向乡人民委員会要回房子。由于郭超的慫恿和煽动，地富分子頓时耀武揚威地鬧起来了，要求退社，要回房子。当地主李正国沒有达到要求时，曾經煽动了七、八个落后农民企圖鬧事，並揚言不給房子就要打。

（2）郭超造謠說：“农村中的社会秩序非常混乱，人心动蕩不安”，“現在眞是搞得天怒人怨，怨声載道，十个人有九个怨”，“民有飢色，民有憂容，也还潜伏有憤懣之情”。“我在乡下接触过的农民不下四、五百人，說好的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其余多有意見”。並且在乡期間，公然为管制分子郭池生申宽翻案。郭超質問合作社的分支部書記說：“为什么你們將他管制起来，这太不合法了”，致使管制分子郭池生囂张地說：“我再不服从你們限制了，再也不怕你們了”。

郭超还造謠說：“中国是否会發生波、匈事件，在城市看不会有，但在农村就不一定，农民似乎想动。在农村那个地方打了幹部、打了党員，那个地方就高兴。农村情况是不穩的”。

（3）郭超誣蔑“目前乡社幹部是一些好吃懶做的人，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乡社幹部工作作風很坏，貪污很严重，比国民党还坏”。

（4）配合其他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郭超写了一篇題为“答傻瓜同志”（即答右派分子，“傻瓜”是右派分子王書林的笔名）的大字报公开表示支持。他写道：“这不是个人的荣辱問題，而是党的生命問題，是六亿人民貧穷与富强的問題”。当右派分子攻击我們沒有法制观点时，郭超立即表示同意，並說：“現在比过去好多啦！过去在延安整風时沒搞清問題的人都要劳动改造。我在延安参加整風三年，由于历史复杂一时搞不清而整了三年，实际是劳动改造……”。当大多数党員对右派的进攻表示憤怒时，郭超立即提出“要反对变用

的压制民主”，並說：“多数同志对群众的批評受不了，从对我自己提的意見来看，百分之九十九是正确的。憑良心，我們那个称职？……象王書林（右派分子）这样的人不是多啦，詞句冲一点有什么不好呢？”

經过两个多月群众性的揭發、批判，郭超的上述反党罪行完全确实。在眞理和事实面前，他已經低了头。但其检討極不深刻，强調“动机是好的，是为了有利于党，有利于整風，但从效果上看是不利于党、不利于整風”。

郭超虽然入党将近三十年，由于他一貫对党不滿，以至最后發展成为右派分子，这絕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远在一九二七年广州暴动时，郭超貪生怕死就曾在街上喊过“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一九二九年二次被捕后，承認自己是共产党員，供出了領导人陈一亭和他的住址，（据郭說他供出陈一亭同志的时候，陈已被敌杀害了。另有两人証明与郭述的相符）並且写了一篇讚揚三民主义的文章。他对一九四二年党对他的审查，一直心怀不滿，入城后对他自己的所任职务也不滿意，对工作一貫消極疲沓不負責任。因此，为了純潔党的队伍，經中共中国畜产公司支部全体党員大会通过，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郭超的党籍；我們完全同意該支部的决定。

中央批示：开除郭超党籍，行政上撤消其原有职务，另行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由十一級降为十六級）。

中共第二商业部机关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朱华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

朱华，男，三十五岁，地主兼商人出身，商人成分。一九四三年三月参加工作，同年八月入党。历任区助理員、区长、总务科长、机关商店經理、专区貿易公司副經理、冀东貿易公司副科长、华北合作貨栈任秘書。一九五〇年因霉坏玉米的失职錯誤，曾受党內警告处分。一九五一年調任全国合作总社粮食經理部副經理。一九五三年任供应二局（现生产資料局）肥料处处长。一九五六年八月入高級党校学習，一九五七年五月任財会局副局长（未到职）。

朱华在整風鳴放期間是以两面派的手法向党进攻的。他在党校伪装积極，而到机关則糾合党內外右派分子、对党不滿分子和肃反对象組成一撮反党力量，进行阴謀活动，出謀划策，蓄謀推翻党的領导，达到其个人野心的目的。是該局右派反党集团的为首分子。

一、整風开始，朱即找生产資料局党內右派分子罗文輝（付处长）密謀数次，朱提出生产資料局的整風重点是“群众对党組織的离心离德”，“过去有威風的人，这次要挨一下，过去低着头的人，这次倒痛快”。他認为把过去的問題摆出来“姜紹奎的总支委員、支部書記都当不成了，通过这次运动一切問題都解决了”。他們为了煽动群众，对可以掌握利用的对象，都一一进行了分析，确定联系誰，如何联系，如何在鳴放中提問題。並教給罗进攻的策略“要看群众如何提意見，看領导表示什么态度，然

后再分析批判”；“提問題要在适当时机和适当的場合，要看領导的态度办事”。鼓励罗說：“你看問題客观，有批判能力”，“这次整風反不到你，这些問題也联系不上你”；“运动中有个規律，开始都得冒一点，三反运动中正是因为你坚持事实求是，才撤了你的职。现在大鳴大放，过去的問題是会重新做結論的。”但又嘱咐罗說：“三反問題，你自己可不要提出，提了是站不住脚的。”朱在勾結右派分子罗文輝的同时，也曾与对党不滿分子梁玉（因腐化堕落判刑一年，緩期二年执行，並受党內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四次密商改組党支部和攻击行政領导的問題。

朱、罗反党阴謀被揭發后，朱为了抗拒党的检查，分别与罗、梁訂立了攻守同盟。並指示罗：“要积極参加反右派，以免領导怀疑。”

二、幕后策动右派分子丁瑞祥（肃反对象）、对党不滿分子王中涛（其父被我鎮压）、薄育华（肃反对象）、于仁德（国民党員）等向党进攻。大鳴大放时期丁瑞祥是生产資料局向党进攻的急先鋒，丁的很多意見是取得朱的支持以后才鳴放的。朱鼓励丁說：“我們能够相互交換意見，这是我們的統一战綫。”有些問題，朱指到那里，丁放到那里。于仁德对評先进工作者和評級不滿，朱对于煽动說：“局內处理这些問題和党的原則是相违背的”，鼓动于大鳴大放。並要于向領导上說明“这几年不是在消極抵抗，而是正常忍耐”，“你提出来，支部不敢找我”。朱並指示于鳴放这些問題时“要求主任、局長、团总支和群众参加，要求組織上給你恢复名誉，对你重新評价”。肃反后朱与薄育华接触少，鳴放期間，朱亲自找薄到他家，朱說：“过去来往少是有某些客观原因”，“希望今后多加联系”。薄对补助不滿，朱挑撥說：“对你的补助問題組織上有缺点，但我在里面是很难說話的，想你可以諒解”。朱还煽动王中涛說：“这次整風我很輕松愉快，那些作風恶劣，做过見不得人的事的、有个人企圖的就会害怕。”因此，王更加攻击党支部有宗派，認为朱受了“屈”，並

积極向群众传播。

朱华成为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反右派中，查出他隐瞞地主出身，和商人成分；伪造学历和入伍、入党时間；隐瞒入伍前参加日伪新民会受訓，並为新民会监督民工挖封鎖沟和充当爱护队联絡員的一段历史。朱华在参加工作后一貫坚持与党对立的立場，政治品質極端恶劣。他在十二地委任总务科长、机关商店經理时，曾貪污四、五千斤小米，还向敌区販粮走私，曾用槍威胁群众，並殴打村农会主任。一九四八年还用貪污粮款貸給商人生息。他在农村工作期間，曾四次包庇地主逃避农民斗爭。一九五〇年他在华北合作貨栈时，介紹有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参加工作，並視为亲信。有意識地为章田隐瞒三青团員身分，介紹入党。朱华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非常严重，一貫驕傲自滿，目空一切，对領导上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一九五三年粮食經理部改为供应第二局后，焦玉波同志任副局长，他任肥料处长，朱即認为业务都是他搞起来的，到处拉拉扯扯，制造糾紛，並恶意地损害焦的領导威信。一九五三年年終鑑定和一九五五年检查支部工作时（当时朱任支部书記），曾对其进行过批評，后即选吴紹奎同志为支部书記，便極表不滿。整風开始后，利用整風的机会，进行了反党活动。

根据朱华的反党言行，在整風中暴露的历史情况及政治思想品質看来，朱华实际上是一个混入党內未經改造的地主、資产阶級分子。除依据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原則，在行政上給予撤职处分外，經生产資料局党支部大会通过，部党委会討論决定，开除其党籍。

中共衛生部机关委員会
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齐仲桓的党籍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齐仲桓，男，現年四十九岁，一九三七年参加新四軍，一九三八年逃跑到重庆、昆明等地，一九四一年又回到新四軍，一九四二年入党。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衛生部部长助理，部党組成員。

衛生部党組織在整風第四阶段的后期，揭發和批判了齐仲桓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罪行，認为他是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極右派分子。他的罪恶事实如下：

一、反对党的領导，認为外行不能領导內行，在几項重大的衛生工作方針政策上，一貫的和党对抗。党提出"政治掛帅"，齐仲桓認为政治不能領导业务，要政治为业务服务，宣揚"搞好业务就是最好的政治"，"衛生部不是政治少了，而是政治多了，技术少了"。主张衛生部应請"专家"来担任領导工作。

党的衛生事业的基本路綫是在党的領导下，依靠群众，开展六亿人民的衛生运动。齐仲桓則是反对党的領导，不要群众，技术至上，单純依靠专家和专业机构。如在防疫站問題上，党組主张：为了便利統一領导、密切結合以及更好的發揮医务人員的潜力，基本上应以綜合机构为主，开展群众性的衛生防疫工作。齐則坚持主张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种疾病的防治机构分别建立，从省到县一竿子設到底，专业多、分科細，着重搞技术，不作群众衛生工作。为此長期和党組相对抗，不听党的話。为了抗拒党組，竟在右派向党进攻时，召集所謂"专家座談会"（其中不少人是右派分子）座談防疫站問題，寻找反党資本。一九五七

年六月齐参加衛生部鳴放会后，对右派分子进攻衛生部的言論大加贊揚，要党組进行“全面檢查”，和右派的进攻相呼应。

在医疗預防工作上，一九五八年党指示要以医院为中心开展預防工作。党的这一指示对改革过去衛生机构的治病与防病分割的不合理現象是有極其重要意义的，齐却公开抗拒，到处散布不滿情緒。

在节育問題上，齐仲桓以馬尔薩斯人口論的反动观点篡改了党的計划生育的精神实質，認为人多是災害貧困的根源，並且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全国节育工作彙报会議上宣揚这种反动观点，極力主张妇幼工作大跃进就是开展节育工作，提出要“恒定”中国人口，实質上是使中国人口走向減少和灭亡。

齐仲桓还利用衛生部的机关报——健康报發表了很多与党的衛生工作方針政策相违背的社論和文章，引起了下面的思想混乱。

齐仲桓对中央决定体制下放的方針也进行抗拒，他說：“衛生部直屬单位下交不是發揮地方的独立性与积極性，是丢包袱的思想”。並阻碍党組有关下放机构的决議的貫徹执行。

齐仲桓对于党組一些重大問題决定的执行上也是阳奉阴违。如一九五七年注射脑炎疫苗發生了重大的死亡事故，党組責成他負責检查处理。但他却極不負責，致使这一关系广大人民的健康和生命的重大問題拖了一年，既沒有作出結論，也不向党組报告。

二、齐仲桓攻击、汚蔑党組領导，制造党的分裂，破坏党組团結，进行阴謀活动，企圖篡夺党的領导权。齐仲桓的反党手法是阴险毒辣的，善于伪装自己，玩弄两面手法，他常用所謂下面的意見来攻击党組說：“衛生部不重視业务，党組不解决問題，不起作用，衛生部可有可无”。他对国务院也进行了恶毒攻击。

在整風运动中齐仲桓借机煽風点火，向党組进攻，企圖整垮党組。整風运动初期，他一面在党組会上散布对党組整風“沒有

信心”，要求“中央、中宣部派人来領导”，一面对攻击肃反与部里不重視业务的右派言論大力贊揚。在整風大鳴大放初期，以及反右斗爭期間，齐仲桓利用职权，曾在北京及上海召集了两次所謂“专家座談会”，支持衛生界中的右派言論，向党进攻。齐仲桓在当时已經做了衛生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幕后策划者。

三、一貫排斥打击老幹部，任用坏人，培植自己的势力，与党分庭抗礼。齐仲桓在中南衛生部工作期間，安插了大批国民党衛生署的官員、政客。在中南地区各省市衛生机构中他也安置了不少国民党的衛生官。这批人大部分有严重的政治历史問題，有的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有血債，民憤極大，有的在解放后群众曾要求斗爭他們，但都被齐掩护包庇。許多科長、科員也是由四面八方搜罗来的反革命分子和政治嫌疑分子。当时中南衛生部有“国民党管共产党”的說法。

齐来衛生部后，还多方設法推荐他在中南衛生部的心腹来衛生部工作。肃反运动和反右派运动斗爭后，齐对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仍是十分重用。

相反，齐仲桓对忠实于党的老幹部却一貫进行打击排斥，污蔑老幹部是“土包子，怎样拉屎都不知道”。齐对党的幹部工作和保衛工作也十分仇視。

此外，齐仲桓在生活作風和道德品質上也極其腐朽墮落。

齐仲桓的問題是極其严重的，在思想上有其系統的反动的資产阶級的思想观点；在政治上一貫的反对党的方針政策，反对党的領导；在組織上一貫依靠国民党衛生部官吏，包庇肃反对象、右派分子，打击老幹部，挑拨离間，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圖篡夺党的領导。其性質是混入党內的阶級異己分子，是長期隐藏在党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分子，中共衛生部机关委員会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决定将齐仲桓开除出党。

中共辽宁省委員会第八次全体会議关于开除坏分子、右派分子阮途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通过）

阮途，原名阮祉泰，男，四十五岁，安徽省銅陵县人，汉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旧职員。一九三五年曾在无錫市万源染織厂当工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抗大，一九三八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鋤奸科員、科长，軍区保衛部副部长、省公安处副处长、省公安厅厅长、东北政法委員会秘書长等职。一九五四年八月至今任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內是省委委員、省监委候补常委、省检察院党組書記）。

整風运动中，經同志們揭發，並經組織調查証实，阮途有包庇与放縱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行。其主要事实如下：

（一）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分子。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五一年，正当第一次鎮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时期，阮途利用身为辽西省公安厅长的职权，包庇从其故乡为逃避鎮压逃来辽西的亲屬、同学等反革命分子、逃亡地主达九名之多，其中三名反革命分子是阮途亲自盗用公款东北幣近两千万元接来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和逃亡地主来到錦州之后，即亲自向阮途介紹了反动身分，阮途却故意替他們加以隐瞞，将七名反革命分子和一名逃亡地主，私自介紹安置在我厂矿机关內部，有些甚至当了幹部股长、劳改队管教幹事。一九五二年阮途接到銅陵县公安局来通报追查这些反革命分子之后，竟私自将通报隐匿起来，繼續加以包庇，給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損失和極坏影响。几年来曾多次被检举，阮途始終对

党进行欺骗。

（二）反对党的領导，反对无产阶級专政，篡改检察机关性質，为反革命分子翻案。阮途自从担任辽宁省检察院检察长以来，即从其反动立場出發，多次假借传达中央、最高检察院指示名义，販卖个人私貨，散布反动論点。一九五六年他公然在检察幹部会議上造謠說：“中央負責同志指示：检察院、法院两院要保护反革命”，“法院沒有判决之前，不能以反革命分子看待，不能叫罪犯，应該叫被告”。而且說：“不能認为党委已批准定案就不会出問題了，要在通过检察院履行法律手續这一关口时鬧住。……”一九五七年又捏造說：“今天刑事犯罪性質有所改变，因为都組織起来了，基本上屬于人民內部問題。因此今后打击刑事犯罪不能搞运动了。……”他以这些反动論点，在实际上篡改了检察机关性質，極力将检察机关的鋒芒指向人民內部，处处設法干涉公安机关的业务活动，束縛公安机关对敌斗爭的手脚，甚至将检察机关凌駕于党組織之上，和党对抗。

阮途在任省委肃反五人小組定案組长期間，也曾多次在肃反幹部中散布：“要保护反革命”，“历史罪恶不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参加我們工作多年了，現在把他們定为反革命分子，对我們不利”等反动論点，極力为反革命分子辯护。阮途根据这些反动論点，于一九五六年八月，在撫順市检查肃反定案工作时，一次即将該市已經正确定案的十五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提出翻了案。同年十二月下旬，又乘省委五人小組定案組原主持和参与定案的专职成員不在时，利用履行法律手續这一关“鬧住”，将原已正确批准定案的八名反革命分子，又亲自主持重新定案，全部翻了案。

一九五七年夏，阮途公然反对省委关于在十个市开展打击刑事犯罪运动的決定和对检察机关右傾的批評，並捏造事实，到最高检察院座談会上作假彙报。六月間返省后，便在全省各市检察长会議上，以其自己的反动观点，篡改最高检察院指示，明目张胆地

与省委分庭抗礼，污蔑与反对省委的决定和批評。同年八月，省委四次全会，曾对其錯誤給予严肃的批評，阮途竟污蔑省委对其批評是“打落水狗”。在今年六月下旬开始的省委扩大会議上，許多同志对其錯誤作了进一步揭發批判，阮途反而制造流言蜚語，企圖对积極揭發他錯誤的同志打击报复。省委扩大会議后，又經过省政法联合党組扩大会与全省政法幹部会議及这次省委全会，进一步对其錯誤耐心而又严肃地加以批判，阮途始終毫不講理，在大量事实証据面前，百般抵賴，态度十分恶劣，毫无悔改之意。

根据上述事实，充分說明，阮途是长期混在党內並窃据重要崗位的坏分子、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严肃党的紀律，經省委全会討論决定，开除其党籍，並建議有关机关，撤消其党外一切职务。

中共辽宁省水利局总支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刘宗义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刘宗义，男，四十五岁，原籍山西，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四五年入党。历任工程股长、省农业厅副厅长、省財委秘書长，原任辽宁省水利局局长。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包庇右派分子，同意並补充右派分子論点，保护右派分子过关。

反右派斗爭开始以后，局整風办公室即将封文炳列为右派分子，並提請領导小組討論决定。先后經过五个多月的时間，十几次領导小組会均未定案。其原因是：由于刘宗义利用党組書記，領导小組长的合法职权想尽一切办法，千方百計地加以包庇的結果。其包庇封文炳不仅是为了一个人，而是有意識的以此来保护所有右派平安过关。

主要事实根据有如下几点：

1、欺騙領导，进行假彙报。

刘宗义对封文炳几次鳴放的材料是非常熟悉的，但其在省人委領导小組会上当仇副省长詢問封的材料是几次鳴放的？刘則顚倒黑白的回答說：是一次放的（实际是三次放的）。其所以这样說目的很明显，是企圖說明，一次放的內容有好有坏不左不右，可以不定为右派，以此为其开脫罪責。其次刘在同次会上又說：封的問題，我們党組研究了，滕奇去北京，韓青同志不在家，蘆秉春、吉凱我們三人研究过啦，都認为不够右派……。实际上韓青同志在家，吉凱同志来局不久，蘆秉春同志刚从北京学習回来，不了解全面情况，其所以不讓韓青同志参加会議，是因为韓青同志同意定封为右派分子，可見刘的手段多么恶劣。刘为了替反革命分子——封文炳翻案，曾放棄局內急待处理的工作，而亲自到省委甄别定案組，为封翻案，並向該組的同志宣揚，封文炳如何进步，局領导小組成員如何片面……。千方百計的說封不够右派，你們也不要定他反革命。当时定案組同志回答說：不定右派，是不是反革命，我們还需要研究。而刘回局以后，在領导小組会上捏造說："定案組說啦，封文炳我們不定右派，他們就不定反革命。"

2、利用各种手段对堅持封为右派的同志进行压制打击。

刘宗义公开宣揚："封文炳的材料，一不准分析；二不准加帽；三不經我許可不准上报。"有一次拿着封的鳴放材料对吉凱同志說："老吉！你看这能够右派嗎？将来非得好好整整他們不

可”，並对堅持定封为右派的同志进行威胁，說什么：把封定为右派是我錯了，还是你們对了？这样下去对你們沒啥好处，更会助长你們处理問題“主观片面”。同时曾不止一次的利用指示的手法，对整風办公室有关同志說：“你們处理問題总是有一种情緒，对人（指封）不能有一成不变的看法，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你們不要驕傲，別認为領导上重用啦！提拔啦！看問題就全面，就認为自己了不起啦。……”当首次会議研究封的問題时，韓青同志發言說：“这个材料（指封的書面鳴放材料）无头无尾，够不够右派还得研究。”而刘竟有意識的在同次会上表揚韓青同志說：“韓青同志看問題全面。……”但后来韓青同志根据材料的分析，認为封文炳应当定为右派，从此以后刘却在背后散布說：韓青同志怎样不好，如何无能。此外刘曾公开揚言：“水利局民主太多，集中太少了。……”並經常对有关同志談，“你們应好好看看十五貫”。言下之意是警告大家千万不要冤枉了封文炳。当有一次局整風办公室向省直党委反映局长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时，刘却大加指責說：‘你們反映情况通过我了嗎？讓省領导上知道对我們会有什么看法，你們反映情况应該实事求是的。（所反映的情况确是事实）刘所以这样講是企圖来說明我們向省人委領导小組所反映封的反动情况也不是实事求是的。以此来有目的地捏造事实，为封文炳辯护。

3、有意識的进行包庇活动。

刘宗义恶毒的攻击說：定封为右派，主要是滕奇同志的意見，因为滕奇同志先發言，所以其他同志就随之同意了。並曾不止一次地到处散布說：“滕奇最近看問題有些片面，並带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情緒”。有一次找王兴玉說：“我讓你和滕局长到統計局去看中右标兵材料，不是讓你走形式去了”。这主要是因为王兴玉同志根据中右标兵情况仍堅持定封为右派，而引起刘的不滿加以指責。又对韓青同志說：“对封文炳这个問題，我們应很好的考虑，我是要堅持，不堅持我怕犯錯誤”。言下之意是告訴

韓青同志不要再坚持定封为右派，如果再坚持将会犯錯誤。以此来有計划的威胁領导小組成員，达到孤立滕奇同志和包庇封文炳的目的。更为严重的是，当水利局党組决定在水利局全体幹部中开展大鳴大放时，刘竟利用党組書記合法职权，借故开水利会議，有意識的阻止鳴放；並揚言"是省长同意"的，經再次追問无言可答，可見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右派分子平安过关。

4、同意並补充右派分子封文炳的反动論点，刘公开說：封所放的材料是有所指的，是一种对組織上不滿情緒，那些問題放在你們那个党員科长身上也是一样。他不滿是由于我們工作上有毛病給造成的。同时对封的反动論点都条条作了安排。說什么：我們提拔幹部有的确实提拔快了，甚至越級提拔了，有的提拔后，就送党校学習。这些事实是有的，怎能讓封沒有意見呢？和他一起参加工作的，有的当了科长、处长、主任，他是个秘書你們还給弄沒有了，放在誰身上也会有感覚。封文炳攻击我們社会制度說："肃反后人与人之間的关系都呈現着冷若冰霜的現象"。刘則說：这是指本人講的，由于其肃反被斗，确实和同志的关系不如从前了，如无緣无故的就給他降級，怎能讓他沒有意見呢？封說：原具有活泼乱跳性格的人，肃反后也郁郁不乐。刘又給安排說：这是指其爱人王瑞說的，封說："有的党团員为了討好領导加盐加醋的向領导反映情况"。刘說：这个問題我們也确实有这样的事，封說："肃反过左"。刘又給安排說："我們向省委报封的結論材料时也确实把他說得不象样子（事实並非如此）"。在一九五七年春天大鳴大放初期，当整風办公室負責同志向他反映，現在有人（指封）攻击我們幹部政策說："肃反幹部个个提拔，人人高昇是宗派主义"时，刘回答說："人家有意見，还能不讓人家提嗎？我們确实有宗派主义"。刘为了达到包庇封的目的竟无耻的在党的支部会上說："过去有个青年幹部×××因提拔太快，担負不了任务自杀了。又有×××因提拔太快，犯了錯誤最后槍毙了……"。刘宗义其所以閪談这

些言論，主要是为封开脱罪責，从思想上同意封所說的，党員提拔高人一等，不称职的也可以提拔的反动論点。上述事实不仅証实刘完全同意了封的反动謬論，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做了若干补充和發揮。

总之，刘宗义所以千方百計的利用各种卑鄙的恶劣手段进行包庇右派分子封文炳的活动，不仅是为封一个人，而是企圖包庇住封文炳可以保护茹丕显、范智陞等其他所有尚未定案的右派分子（現均是右派）安全过关，掩盖自己的反动面目以繼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目的。

（二）为右派分子出謀划策。

在去年反右派斗爭开始时，刘曾亲自找右派分子茹丕显到局办公室談話，並为其出謀說：“你应当积極一点……”当听到滕奇同志进来的脚步声，談話沒完即中止了。又对右派分子封文炳說：“你不要有什么顧虑，应当积極参加反右派斗爭。……”据此可以看出，刘宗义已經成了其他右派分子的軍师。

（三）包庇反革命分子，鼓动肃反斗爭对象上告，並有意識的煽动学生鬧事。

刘宗义在整風运动中亲自对王积心（肃反斗爭对象，有重大特务嫌疑）說：“你的問題不大，不要着急，組織上会給你弄清的，你要积極些，同时你可以給省委五人小組写一封信，但千万可不要說，是我讓你写的……”。其次当省委五人小組批准封文炳为反革命分子，並判处三年管制，送劳动教养以后，刘对肃反幹部說：“等蘆局長回来（当时蘆在北京学習）讓他亲自組織重新調查，看看封文炳到底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並指有关同志說：“对封的問題我們决不能草率从事，先不办法律手續，我再研究一下”。公开的抗拒省委五人小組的决定，为反革命分子进行翻案。刘在肃反运动中也是千方百計地进行包庇反革命。如特务分子王鳳書，在肃反运动前先后已有五份历史旁証材料証明該人定是一个特务分子。而刘看看王的材料以后硬說，王沒啥。並

为其辩护說：“思想傾向参加特务組織了，但因四年解放較早，实际还不等于参加”。当省委农林水口決定对特务分子王鳳书进行斗爭时，刘不滿的說：“斗他我沒有意見，看你們能斗出个啥来”。在肃反运动中，当許多同志提議应确定封文炳为肃反斗爭对象时，和此次定封为右派一样他想尽一切办法，对上級和同志們进行欺騙說：“封工作一貫积極，历史是进步的”。更为严重的是对封自己交待的匪三青团区队长和模范国民党員的問題始終不相信。反之对特务分子王鳳書的假坦白則信以为真；在肃反运动中对封，一貫主张一不搜、二不斗。当肃反幹部提出应当搜查封文炳时，他蒙蔽欺騙的說：“我的意見不搜，以后我和‘口’里再說說，看他們的意見怎样？”但据事后刘根本沒有把此問題向“口”里談过。而是以此来欺騙肃反幹部。在肃反中，当滕奇同志向刘反映群众对不斗王鳳書有意見时，刘却粗暴地說：“誰有意見？把名单拿出来”，以此来明目张胆的有目的地威胁肃反幹部。对反革命分子王化的处理刘也有意見，从思想上不同意，对組織有不滿情緒，因此則毫无根据的公开的为王化喊寃，說：这样处理他，今后技术幹部还能敢做工作嗎！言下之意是不应法办。在肃反运动中其为了包庇反革命而有意識的对肃反幹部宣揚說：“肃反是人命关天的事，誰給我搞錯了，誰就給我翻案去……”。在肃反运动結束后，刘还揚言：“我对肃反还有意見，肃反有些事得开会說一說，有些同志（肃反幹部）真不象个样子，封文炳根本不够反革命，硬往上定……”。其次，在一九五六年秋末因市建筑公司承包建筑的水利学校学生宿舍工程，沒有按时竣工，当时师生居住在席棚里，因此意見紛紛鬧的很凶，这时刘宗义对滕奇同志說：“派几个学生代表到公司交涉……”企圖乘这混乱之机，煽动、組織学生去請願鬧事，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

（四）攻击延安整風运动，否定延安整風成績。

有一次和刘焕本（肃反五人小組、整風領导小組成員）同志

下乡，在旅館交談肃反运动情况时，刘宗义恶毒的說：“滕局长沒經过延安整風，不知道那个滋味，只知道整人家，不知道被人家整的那个滋味。我是知道那个味道，延安整風把我也整了，还弄个警察看着我。延安整風有些人被整疯了、傻了；有的被整得妻离子散……”。对延安整風的伟大成績則一字不提，有意識的进行污蔑。

（五）污蔑合作化运动，反对統購統銷政策。

刘恶意的攻击合作化說：“合作化好是好，就是农民沒有粮食吃……”，並說：“現在連人情味都沒有了，吃米、吃油都有数来个客人都沒法招待”。

（六）反对和歪曲党的幹部政策，提拔重用反、坏、右分子。

几年来，刘除亲自为反革命分子封文炳塡写幹部任免呈报表外，还有經过他提名，已提拔或企圖提拔的幹部，其中就有反革命分子5人；历史反革命分子1人；普通反革命分子1人；右派分子4人；党內坏分子1人；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4人。在併省前他就一直很重用这些人，併省后虽經同志們多次提出意見，而他仍置知不理，坚持重用。尤其在整風运动中，还企圖叫当时的疑似右派分子封文炳到新建之渾沙工程处担負領导工作。为了达到扶植反坏右分子目的而經常散布說：“他們这些人有能力，使用他們出不了大問題”。又揚言：“現在使用幹部还不能无产阶級化；技术幹部提拔有“才”就行，当一九五七年春天局內有些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攻时說：技术員不能領导工程师，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的謬論后，而刘宗义大加支持說：本来就是嘛，技术員怎能領导工程师呢？这实質刘宗义从思想上是同意了右派分子关于党天下的党法（我局土工試驗所长是技术員共产党員）。刘宗义对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不但加以提拔和重用，而且还經常有目的地美化他們說他們是德才兼备的好幹部。在群众中給反、坏、右分子树立威信，以阴謀扩大他的反党陣地，达到其反党的目

的。

（七）挑拨是非，打击报复，分裂团結。

在精簡下放幹部时，刘公开說：“封文炳你們給判了三年，还把他老婆放下去，这样作是有点太狠了”。在动員党团員带头报名上山下乡的大会上說：“我們有的同志参加了領导小組会，心里有了底，这不一定，不能这样想……”。意思是說，你們不要先放人家（包括其爱人馮英在內），将来我可以放你們。又說：“你們（指整風办公室）处理問題要正直无私，不能讓人家說出話来，处理不公平，人家不服……”。其次，当确定普通反革命分子韓丽珠退职时，刘說：“他年青，工作还不錯，还可以留下做点工作”。我們回答說：“退职是合适的，長期患病，又有些历史問題，否則将来也得清洗”。这时刘接着說：“那就算了吧！退职比清洗强”。在双反运动中刘为了打击一些同志而有計划的在群众中散布說：“滕局长无原則，武国强主观片面，韓青无能，刘煥本不服从領导……”。在精簡下放期間找王兴玉同志談：“陈尙义調出人事科，武国强主观片面，你应照顧人事科工作。又对武国强同志談：“陈尙义調水文站去了，人事科就剩你一个人啦，中央意見水文站要交了，你千万不要对陈尙义講啊！”

上述同志均系整風領导小組成員。逢甲說乙，遇丙論丁，有目的进行分裂活动，从中挑拨是非，对領导小組成員实行拉打結合的对敌斗爭方法。在一次斗爭会后，刘公开的講：别人揭發我沒意見，那些人（指王大軍、刘文华、谢振武、王恒太同志），过去我待他們比我兒子都好，这回还給我提意見，眞气死人！从这句話不难看出刘宗义的反党宗派思想已达到高峯，同时也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質。

二、日常表現和斗爭中的态度

刘宗义远在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期間，因当时与特务分子关

系密切而被列为斗争对象。一九四七年土改运动有意識給地主隐藏物資受到党內警告处分，三反运动中因其岳父又被群众所斗，对組織表示不滿。在伟大的肃反运动期間百般地包庇反革命分子又受到群众的严厉批判。这次的整風运动又施展其反动的才能，千方百計地包庇右派分子，为一切反社会主义分子开脫罪責。因此，刘宗义在政治上一貫与党对立。

在工作中常常把个人放在党組織之上，唯我第一，目空一切，存有極为严重的驕傲自大思想，对同志态度一貫的蛮横无理，冷酷无情，表現是盛气凌人，对党組織或局务会討論的決議，他个人不同意就不执行。对全局性的工作計划、总結和重要报告，不但不过問，而且完全依靠其亲信反革命分子封文炳去做。对来自群众的批評、建議和同級幹部的意見从不很好考慮，反而以粗暴的方式加以指責和拒絕。对上級机关的检查如提出缺点和錯誤时，就背后加以恶意攻击。对上欺对下压乃是刘的貫用手法。

刘的反动言行經过群众的揭發和斗爭，承認了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但对一些事实仍百般地进行狡猾抵賴，拒不交待。后經群众的反复揭發对証和严厉的批判，在鉄的事实面前，才不得不低头認罪，但至今交待的尚不够徹底，态度很不老实。

根据中央划分右派分子标准定为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經研究开除其党籍，請党委批示。

中共辽宁省气象局支部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敬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李敬，男，四十四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高中畢业，汉族，山东省平原县五区黄庄村人，一九三九年四月参加工作，一九三九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辽宁省气象局局长兼沈阳中心气象台台长。

簡历：历任区队长、教員、厂长、省府科长、区长、副县长、县长兼法院院长、东北气象处副处长、省气象局局长。

平时表現：在工作中很少对工作上重大問題进行布署、检査、总結，表現飽食終日无所用心。在領导作風上独断独行，态度蛮横，家长式的領导，在召开局务会議上不是广泛地进行討論，而以个人代替集体，对上級不請示不报告。长期利用职权进行打击报复，如不順他心的幹部——张文立、陈光則进行刁难，以致最后排挤走；而对其亲信幹部則无原則的提拔重用（如张彬、刘德浩）。违犯党的規定，丧失立場，私自录用人員有十人，其中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及有杀父之仇严重对我不滿的分子即有数人、亲属五人。一貫对抗上級領导，目无組織，当上級批評他的工作沒搞好时，即散布不滿地説：我是个黑局长。当上級检査局的工作时說：省委書記来了也解决不了問題。同时在群众場合公开的說：支部的决定我可以不执行。在历次运动中一貫表現右傾和丧失立場，在鎮反中对已被处理的反革命分子表現婉惜的說：这都是上級找到了他們的头上，点着了他們的名，我李敬認为过几年和平了，我們还可以在一起工作，在三反运动中由于右

傾被撤消了三反的領导职务。在办公时間曾先后叫几个女同志剪指甲，群众反映極坏。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反动言行：

一、在群众鳴放会上煽風点火，挑拨党群关系，如公开煽动地說："党的整風方針，虽然是'和風細雨'，我看用暴風驟雨也行"。又說："对老技术人員和党外人員，我是一貫重視的，而党委强調'政治可靠''历史清楚'，結果把他們調來調去，不信任他們，这不是党的宗派主义是什么？"並說："原省財委检查总結是宗派主义的排內性和排外性，党的宗派主义有两重性，一是排內性、一是排外性，排內性比排外性更严重"。右派分子周琳說："使用幹部有宗派主义情緒"，而李敬接着說："这不是存在于一个人、一个单位，而是由来已久"。並說："我們党內也冷淡，沒感情"。在党外人員座談会上說："現在社会是不敢說心里話，同志之間不亲热，沒人情，总覚得冷冰冰的"。並把党員說成是"特务"、"狗腿子"。平时常說："政治工作人員起不了好作用，政治工作尽背后嘀嘀咕咕，就知道匯个报，背后'鼓揪'人，卖狗皮膏葯"。

二、否認党对科学技术部門的領导說："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白帽子不能領导业务"。

三、攻击肃反运动，否認肃反成績。說："搞了一年肃反，估了好几个人，有什么成績，能說对工作不誤嗎？""如实事求是的說，肃反沒斗出反革命就不能說成績是主要的"。常說："肃反是沒事找事，劳民伤財"。煽动肃反被斗分子齐惠民（右派）上告时說："你有什么意見，你写，只管提，我支持你"。在一次肃反对象座談会上說："老齐你冤枉了，这純粹是唯心主义所造成的"。

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否認社会主义建設成就，說："一九五六年各方面都冒进了，我們的事业計划也冒了。工业、农业合作化、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都冒了"。

五、包庇右派分子，破坏反右派斗爭，在斗爭右派分子大会上，向大家宣布，要注意方式，和風細雨些。並为周琳（右派）策划如何过关。

並利用整風領导小組长的职权，包庇了张秉芝、齐惠民过关（已定为右派分子），並将张彬（右派）吸收到整風办公室。

李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揭發后的表現和态度：

反右派斗爭中虽向領导上承認了錯誤，但检查不深刻，經多次批判后逐漸有所承認。但在关鍵問題上推脫責任。但在群众围攻下，才不得不承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承認自己是右派分子。在斗爭中的态度不老实，听到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原則規定后，表示願意悔改，到劳动中去改造自己。据此，李敬确系党內的右派分子。經过支部党員大会討論一致通过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全体正式党員十八名，参加会議的正式党員十二名，全体通过（本人也举手表示同意）。

中共东北工学院委員会
关于極右分子王銘勳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

王銘勳（曾用名太田章博），男，四十岁，一九四八年入党，台灣省嘉义市人，出身自由职业，現任东北工学院学术委員会委員，机械系教授（三級）兼系主任，党內任沈阳市委候补委員。極右分子。

主要的右派言行：

1、王系机械系右派集团的为首分子，鳴放期間有計划、有組織地向党进攻，支持以排斥党的領导为目的的“改选中心組”

的阴謀活动，积極要求召开凌駕于党之上的具有行政权力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积極带头鬧事，支持並带头签名掀起“八十二名教师签名請願”的事件，签名請願要求中央检查市委工作。並当选为教师代表去向市委第一書記和省委第一書記請願。

2、王銘勳是反党的“机械系大字报”社长，“机械系大字报”煽風点火特别猖獗，在全院起了極大煽动作用。該报反党方針，右派分子分工都經他同意，並亲自批改稿件“下一步怎么办？”在其中加进“党对知識分子政策执行上犯有严重錯誤”一語。

3、本人怀有反党的个人野心。他散布“康院长（兼党委書記）不懂教学，怎能領导教学，东工沒有希望”，主张“沈阳是机械中心，应該有个机械学院”，积極策划三系代表团到北京請願“脫离冶金工业部領导”等活动，並在教师和学生中散布对党不满，煽动学生出大字报签名請願。反右后他說：“这次是大石头沒搬动，反打了自己的脚”。

4、为右派打气，助长反党气焰。在鳴放会上煽动說：“我們应当将斗爭坚持下去，認識这次斗爭的艰苦性”，給右派分子打气，坚定右派的反党决心。

斗爭后的态度：經斗爭后基本上低头認罪，承認了一些反党罪行，但交代检查不深刻。

处理的意見：經党委討論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国家薪給人員中的右派分子处分原則規定，王銘勳屬于情节特别严重，表示願意悔改，本人在技术上尙有专长的極右分子。給以开除党籍，撤銷本兼各职，留用察看的处分，由三級教授降为六級副教授。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曾軍的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右派分子曾軍原系本校普通班第二十二支部学員。在本校反右派斗爭中，第二十二支部的同志們揭發了曾軍的很多極为严重的錯誤，經过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学員的批判討論，业已徹底揭露曾軍的右派面目。第二十二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曾軍的錯誤性質，已于支部大会上通过决定將他划为右派分子並开除出党。党委会經过严肅愼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二十二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請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沈阳市委的意見，得到了沈阳市委的贊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附：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二十二支部关于右派分子曾軍的政治結論

一、簡历：曾軍，男，現年三十七岁。陕西蓝田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延安入抗大，同年十一月入党。来校前任沈阳市物資供应局副局长。現为本校普通班二十二支部学員。

二、主要錯誤事实

1、攻击污蔑和企圖修改党的幹部政策。曾軍在大鳴大放期間，污蔑“沈阳市委在使用幹部上有宗派主义，唯唯諾諾是好幹部，客观上是这样”。他說沈阳市委“所謂幹部的德就是人云亦

云……。现在是人云亦云，上呼下应的人就是組織观念强，好幹部，对那些敢提意見的，就是主观片面，驕傲自滿，組織观念不强。这种情况必須改变”。他污蔑“有些幹部飽食終日，无所用心，像猪一样”。他攻击幹部級別制度，說：“不能从級別上看誰的質量高低”，“职位、級別不能决定智慧真理”，“中央也有犯錯誤的如高崗、饒漱石。邓子恢也犯过右傾机会主义錯誤，再如山东分局的向明等”。他說：“以級別来衡量幹部的好坏，那是扯蛋”。曾軍又說：“关于德、才和評級的标准无統一的东西，有人爭这个东西，也可說是个人主义，但是不爭也不一定完全合理，可是有人一爭，不管合理不合理，就批評是个人主义。“德”是什么？有好几种解释，执行时各人有各人的标准。我說共产党今天有黑暗，但是面不大。党內的黑暗面是正直者受罰”。

曾軍在攻击、污蔑党的幹部政策执行情况的同时，在沈阳地区整風座談会和小組鳴放会上向中央提出了如下的建議：第一，“建議中央今后应規定各級党組織領导人，不得隨便說反党、不尊重党和驕傲自滿的口头話”。当小組同志們質問他是指个别組織还是指全党时，他很激愤地說：“我就是指全党、各級党的組織部包括在內！”第二，“进一步明确規定德才和政治覚悟高低，思想意識好坏，組織性、紀律性高低的标准，在党內要提倡坚持真理，不屈服，不怕掉脑袋的精神，对那些唯唯諾諾的人硬要批評，对过去敢于坚持正确意見的人要提拔”。第三，“为了防止宗派主义，任人唯亲，要改善了解幹部的方法”。除了听組織的反映和到幹部工作的地方去了解之外，他提出“根本一条，是在一个重要問題的討論时作記录，以便事后考察那个幹部正确。……不是单純地听組織上講。对那些敢于逆水行舟，提出自己見解的幹部，应看成是好幹部”。第四，“中央組織部应在全国抽查几个地区、几个部門执行幹部政策的情况”。“党应总結一下提拔幹部的工作，那些是該提拔的，那些是不該提拔的，吸取經

驗教訓"。"对那些吹嘘拍馬的就要降下来"。

2、对于他过去历次所犯的錯誤，党組織对他的教育批評处分，实行全部翻案。曾軍在沈阳地区整風座談会上，对于自己在一九四二年平北挺进軍第十团工作时，因违抗命令，反对領导，受党內警告处分；一九五一年沈阳市召开防空会議动員布置防空工作时，因有恐美情緒，受了批評，一九五三年沈阳市委常委会討論他主持草拟的副食品供应計划方案提出些不同的意見，他竟要挾領导拒絕前往国家計委开会，因而受到支部批評並責令他写書面检討；一九五六年沈阳市人委机关召开党代表大会，他蔑視支部提他为代表候选人的决議，受了批評后，在支部大会上无理取鬧，因而受到支部的严厉批評等，都說成是党組織对他的打击，而他自己却沒有錯誤。他把中央組織部的同志来参加会議比作"十五貫"中的"况鍾"下乡，在会議上歪曲事实，申"冤"告状，推翻党組織对他历次所犯錯誤的处理。根据各方面的調查材料証明，多年来有关党組織对曾軍的批評教育和处分，都是正确的，必要的。而曾軍在鳴放会議上所表現的态度，恰恰証实他是屡教不改的人。

3、歪曲党的民主生活和攻击党的組織。曾軍在沈阳地区整風座談会上說："沈阳市委領导上执行民主集中制有問題，不够民主，誰对市委冲一下，誰就馬上受到批評，調动工作"。曾軍这种歪曲沈阳市党的生活不民主，实际上是为他的无組織、无紀律，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反党行为辯护。例如：在一九五三年他不同意沈阳市委会对他主持草拟的副食品供应計划方案提出的意見，他以"我不能去說我不同意的意見"为理由，拒絕前往国家計委开会，以后又拒絕支部的批評教育，坚持不写書面检討。又如一九五三年他不同意苏簡同志为市党代表候选人，当选举时，便不参加党的会議，而去看电影。再如，一九五六年他拒絕支部提他为沈阳市人委机关党代表候选人，並在支部大会上无理的要求支部書記收回对他的这种錯誤态度所作的正确批評。这些

都是曾軍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的行为。

他攻击党組織說：沈阳“市委喜欢听好的，不喜欢听坏的，已成为習慣”，“爱說优点，不爱說缺点是一貫的”。他列举郊区鎮反、三反等事例来捏造、夸大沈阳市領导上的缺点和錯誤，对自己的錯誤看法，則只字不提，反而把他自己吹嘘成为“一貫正确”的。並屡次自我称賛为“誰都敢頂”的幹部，“是一匹好馬，就是騎不了”。他甚至說：“我学習回去后，一年不講話，不提反面意見，誰說我曾軍进步啦，我就說操你娘”。这說明曾軍仇恨党的情緒，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

三、錯誤根源

曾軍的錯誤，不是偶然的，有其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由于他出身于小資产阶級的家庭，並在旧軍队里沾染了一些坏習慣，抱着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目的参加了共产党。多年来党組織針对他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腐朽思想进行过严格的批評教育。但是，他却把党組織对他的改造看作对他的打击报复，反而埋怨党組織对他提拔不够，長期对党不滿，以致發展到这次大鳴大放期間竟与資产阶級右派里应外合，恶意地攻击污蔑党組織，向党进攻。

四、对待錯誤的态度

曾軍的反党言行，經过了党組織和同志們向他进行了将近两个月的批判和帮助，但曾軍的态度始終是極不老实的，一直是抗拒的。他首先企圖否定在“鳴放”时他在地区整風座談会議和小組会上的錯誤言論的記录。当同志們对他进行严肃批判和耐心帮助之后，他曾在支部大会上承認了某些錯誤事实，但他在后来的检討中特别是書面检討中却避重就輕，对其主要錯誤事实进行狡辯和抵賴，企圖蒙混过关。尤其态度恶劣的是，对其錯誤言行的材料，經过小組和支部与他逐字逐句反复对証后他已簽字同意，隨后却又提出声明，进行翻案。並在最后写的所謂“我的反省”中，对他的反党錯誤事实作了修改，几乎全部推翻。曾軍这种流

倨无賴，出尔反尔，无理取鬧的恶劣行为，虽經支部大会严肃地批判和帮助，但他仍然蛮不講理，坚持錯誤，拒絕改造。

五、結論

曾軍具有極端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品質恶劣，屡教不改，长期对党不满，在大鳴大放期間，公开向党进攻，攻击党的領导，特别是攻击党的幹部政策，歪曲党的民主生活，对他过去历史上所犯的錯誤，实行全部翻案，以致走向反党的道路，堕落为党內的右派分子。为了純潔党的組織，支部大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建議行政加重处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二十七人全体通过）

中共鞍山市委組織部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董惠民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

根据"右派分子董惠民的反党言行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和董惠民在反右斗争中所採取的态度，經过支部大会討論，全体党員一致通过开除董惠民的党籍。

附：对右派分子董惠民的反党言行及处理意見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八月）

董惠民，男，三十三岁，山东省文登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塡表写富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九年十月入党，一九四〇年一月参加工作。历任县委組織幹事，区委書記、县委組織部

长、县委副書記、市委組織部科长、处长、組織部副部长。

一、历史問題

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風，因伪造参加民先履历，受到审查，心怀不滿。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爭时期）随五师南下，一九四六年，在罗南留地方工作，后由中原单身突围未带組織关系，其中經历尚未查清。

董惠民家中共有土地六十多亩，房二十二間，牛、驢、騾各一头，长期僱长工一个半（到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七年土改时由于董惠民兄董崇奖任村长，将其家庭成分定为富农。后在一九五一年土改复查时定为地主，並将董崇奖开除党籍，管制生产。这个問題董惠民从未交代，塡表时一直写富农成分。

二、日常表現

工作表現一般，在基層組織建設工作上，有右傾表現，一貫驕傲自大，自以为是，好固执己見，好从反面看問題。

三、在鳴放、反右前后的反党言行

1、認为胡風是反革命的根据不足，怀疑中央把胡風間題搞錯了。当大鳴大放时期，大連右派分子张国琮向党进攻提出：“說胡風是反革命，不能令人信服”时，董就表示贊揚說：“眞有敢幹的”，他說“用反革命的老匡子套胡風套不上，感到有距离”，他認为“张国琮的話直得考虑”，他認为对胡風处理的結果应該公佈。当有人指出“三批材料”上說明胡風不仅是反革命，而且也是特务时，董又說“那指的是胡風集团，不是胡風本人”。

2、否定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大發展的成績与合作化的优越性，董認为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高潮是“冒进”了。当他与組

織处幹部一起学習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时，他針对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一段講話說：“一九五五年一下子都合作化了有問題”，“如果再稳一点，發展一批巩固一批，是否会更好些”。董說毛主席說的合作化后第一年就增产了“不能說服人”，“粮食增产了，特产作物减产了，总产值不一定增加”。还說：“我的估計沒有毛主席估計的那么乐观”，他認为市場供应紧张，主要不是由于人民購买力提高的結果，是合作化后带来的。他說：“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五年相比，人民生活就不能說提高”。他还說：“从職工收入一九五六年比一九五七年是多，一九五七年物价有的又調价了，生活显得比一九五六年低了”。

3、贊揚、同情、支持右派的言論，为右派辯解。大鳴大放时，他一方面埋怨中央不交底，“是由上而下的自己整自己”，認为中央沒有預料到整風会發展到这种程度（指右派猖狂进攻），“是自己把自己搞被动了”。但另一方面，他又贊揚右派分子张国琮关于胡風是反革命不能令人信服的謬論是：“真有敢幹的”，“值得考虑”，他还說十二个副总理沒有民主人士，說是党的領导，“太簡单，不能說服人，中央各部、各省，也是党的領导，都有民主人士”，“十二个副总理中，有一两个民主人士沒有啥”。他說：“学校实行党委制需要研究，照这样領导下去，是不行的，領导幹部不懂得教学技术，沒有办法領导好学校”。他还为章乃器不劳而获的謬論作辯解，說“不劳而获，不一定都是剝削，我們在銀行儲蓄，利息也是不劳而获”。当鞍山極右分子娄健群，在市委宣传会議上向党發出狂妄的誹謗言論时，一般同志听了都非常气憤，而董却說：“不是事实人家还会說”。他与部內右派分子单維本日常最接近，也最了解，在斗爭单的过程中，自始至終不但不揭發，不批判，还为其辯解，开脫，进行包庇。

4、对革命导师和人民領袖的信念發生动搖，他說：“引証領袖的話，当作千真万确，就是个人崇拜”；“馬克思也不是都

正确，如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单独在一国胜利的問題，后来就証实是錯誤的"。他把对馬克思的信仰說成是"个人崇拜"。在胡風問題、农业合作化問題、整風鳴放等問題上，都表現了他对中央和毛主席的不信任，怀疑和攻击。在学習刘少奇同志关于一九五七年停止接收新党員的講話时，董說："要發展时，就那样講，不發展，就这样講，不是实事求是"。

5、攻击市委領导，他說："市委委員的选举，也不是走群众路綫的"。"市委对依靠厂处长这批骨幹缺乏具体措施"，董特别对第一書記楊士傑同志进行了人身攻击，他說楊書記民主作風不够，"要求簡单化"，对幹部批評較多，"不是諄諄善誘，有些粗暴"；董惠民甚至还用一些自己也不知来源的材料，向領导攻击。为了在市委扩大会議上發言，曾向部內幹部处打电話，到兵役局收集楊士傑同志的材料。

6、董認为我們的人事制度实行包下来（統一分配）的办法有問題，他主张人事自由市場，"需要就招，不需要就解僱，願幹就幹，不願幹就可辞职"，边远地区沒人願去，"可用高工資的办法去鼓励"。

董主张婚姻絕对自由，他說"資本主义国家都能作到，为什么我們作不到"。

7、董对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不滿，他說他的脑子有时剧痛，是那时造成的。他曾向单維本（右派）和門海陞同志說过，"一九四二年整風搞的可厉害了"，"不拘什么問題就一直怀疑"，"是康生搞的，那时康生在中央可紅了，以后他就犯錯誤了"，一九五三年董在自传中写道："我經过了延安的伟大整風运动，我受了委曲，党对我实行了逼供"。

四、董惠民在斗争中的态度

在去年八月的一次部务会議上（部处长七人参加），暴露了董惠民認为"胡風是反革命材料不充分"的認識之后，市委組織

部的正副部长就对他进行了批評教育，說明他对胡風反革命集团的認識的严重性，並指出他一貫好从反面看問題的錯誤思想。第一次他表示願意检討，並要求給他两个星期的时間深挖思想，但在第二次作检討时即改变态度，不但不检討，反而一口否認，进行反噬，說他向来对“胡風是反革命”不曾怀疑过，是李建梓同志未把情况弄清楚即向市委彙报，他是不滿意的。以后連續开过四次小会，均无結果。直到这次市委扩大会上他的問題被提出后，經过書記及同志們再三耐心教育仍拒不交代，直至三月十五日，在摆事实証据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認了以上情况和若干反党事实，三月二十四日作了極不深刻的检討，但三月二十七日写信給書記处，对極不深刻的检討又企圖推翻。此后，又进行了多次个别与小会的批判，虽也作了一些交代，但仍極不老实，始終与党对抗，不願低头認罪，直到现在沒有自动交代过一个問題，甚至在确凿的証据下，仍矢口抵賴，态度極为恶劣。

根据以上事实董惠民在若干重大政策問題上，与党有着根本性的分歧，对党中央負責同志以至毛主席表示不信任，对共产主义革命导师馬克思也表示怀疑，在鳴放反右期間与党外右派分子共鳴，同情、支持和包庇右派，攻击市委領导。

董惠民出身于地主家庭（一直欺騙組織，塡表写富农），参加革命不是出于自觉，在去延安途中，曾有过开小差的思想。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整風时，由于自己假造履历，受到党的审查，心怀不滿，曾后悔不該去延安。好从反面看問題，好在党內找黑点子，但平素靜默寡言，很少暴露，在苏共批判斯大林同志的錯誤之后，受到修正主义者叫嚣的影响（董在三月二十四日自己說是受修正主义的影响，但以后又不检討）董的反党思想有所發展，在整風鳴放期間，他这种反党情緒就比較集中的而又是点点滴滴連續不断的暴露出来。

根据以上事实和分析，我們認为董惠民的問題是严重的，应划为党內右派分子。

处理意見：开除党籍，撤銷职务，降五級（由十二級降至十七級），是否有当？請市委审查。

中共鞍山市文化局支部委員会
关于开除楊东昉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

楊东昉，男，四十八岁，辽宁省辽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四二年入党，原任鞍山市文化局长，極右分子。

一、楊东昉主要的右派言行

楊东昉对党一貫不滿，利用整風鳴放机会，积極煽动群众並組成反党小集团，向党进行恶毒的攻击：

1、鳴放期間在文化局和基層鳴放会上，煽动群众反对党，亲自带头写題为“到底誰說了算”的大字报，恶毒地向党进行攻击。同情和支持剧团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行，在他煽动下，使本市文化界掀起了一股反党的逆流。

汚蔑和反对党的領导。他把党的領导說成是“以感情代替政策、独断专行”；把党的領导比喻成旧社会封建家庭里的“恶婆婆”，把自己說成是一个上下受气的新媳妇；把市委保留歌舞团的决議，說成是“以党代政”。他还主张撤消剧团现有一切管理制度，实行所謂“民主选举团长”，企圖推翻党对文艺方面的領导。在反右派动員会上說：“我要碰一碰”，又說：“我要叫法院留张床位，准备犯錯誤去住”，“鞍山日报要給我留点地方，我要鳴一鳴，放一放”，决心要和党較量一下。

汚蔑鞍山人事关系是：“尖酸、苛薄、嫉妒，病态的关

系"。又污蔑"党的幹部政策是賞罰不明，幹部工資、使用、提拔存在宗派主义"，並以此来反对党的領导。

否定党对鞍山文艺事业領导的成就，把鞍山說成是"只有鋼鉄，沒有文化"，把鞍山文艺界說成一团糟。

2、楊东昉与右派分子陈宝書、成千万、寇冠結成反党小集团，楊东昉是反党小集团首要分子。他們謀划将文化局和戏曲剧团一些党員幹部和积極分子搞走。並积極为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而被开除党籍的陈宝書翻案。在反右派期間，将文化局反右派斗爭的計划和右派分子名单，全面洩露給他的反党集团成員，並訂立反党攻守同盟，抗拒反右派斗爭。

二、楊东昉在斗爭中的态度

初期表現不老实，中間曾以自杀抗拒斗爭，自杀未遂，恢复健康后，对党表現極为仇恨和不滿，經領导帮助和多次党的会議的批判，态度有所較变，初步檢查了本人的反党言行。

三、处理意見

支部全体党員一致同意开除党籍。

中共旅大市委扩大会議对党內右派分子王輔民、黃易明問題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七日通过）

根据市委文教部的检查，大連医学院党委的报告及到会同志們的揭發，会議一致認为：大連医学院前任党委書記王輔民（行政上是副院长）及党委第一副書記黃易明，确系隐藏在党內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他們在担任該院領导工作期間，丧失立場，投降資产阶級，一貫反抗党的領导，攻击党的政策，破坏党的威

信，成为資产阶級路綫在大連医学院的忠笑执行者。

在政治上，投降資产阶級，反抗和污蔑党在历次重大政治运动中的方針政策，充当了資产阶級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內应。王輔民在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不断替資产阶級知識分子的顽固派喊冤叫屈，認为运动"产生了副作用"，"伤害了知識分子自尊心"，並屡次要求党承認"錯誤"。对于肃反运动，王、黃一致誣蔑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有錯誤，是"主观主义"，說中央对敌情估計高了，發动运动急了；黃还認为党的十人小組名义發有关肃反政策的規定，和五人小組出面給非党人士做政治結論不合适，应該由国务院和政法机关出面，实質上就是否定党的領导权；他更否定肃反成績說：成績和偏差相比是"平分秋色"，甚至是"得不偿失"的。在整風鳴放中，王、黃和党外右派一唱一合，互相呼应，一致向党进攻。在反右派斗爭开始时，对于党的反右派斗爭号召，一再抵抗，按兵不动；对于右派的反动言行，不是尽力掩盖，就是积極辯护，企圖为他們开脫罪責。对于党的知識分子政策作歪曲解释和片面执行，只講团結，不求改造；不是按照无产阶級的面貌去教育改造知識分子，而是无原則地迁就，犧牲党的利益。此外在教学医疗工作中，他們对于长期所实行的資产阶級路綫，从来都是採取鼓励与支持态度的。

在組織上，一貫反抗党的領导，破坏党的紀律，並实行資产阶級的組織路綫，自成"独立王国"。王、黃一向目无組織，目无紀律。遇到上級检查工作，則态度厭煩；遇到上級批評，則借詞反駁。对党的指示和决定，有的是敷衍过去，有的就頂回去，甚至公开誣蔑攻击。如王对思想改造問題，就是不顧中央的明文指示和市委的屡次批評而一再公开散播反动言論的。他們極端狂妄，不仅恶意誣蔑市委領导人，甚至还胆敢攻击党中央及毛主席、周总理。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竟採取卑鄙手段，利用資产阶級知識分子以"提意見"为名，向党施加压力。在幹部工作上，亦是貫徹資产阶級的路綫，以資产阶級观点提拔和使用幹

部，单純强調业务能力，不看政治質量，任意排挤和歧視政治質量較高的幹部。同样，在發展党員上也不注意考察政治历史与阶級立場。对党外幹部，不注意依靠广大的进步教职員工，而是实行所謂“名教授”路綫。此外，对兄弟单位，采取極端本位主义，甚至不择手段，企圖吞併鉄路医院。

在思想上，王輔民、黄易明披着伪装的“馬列主义”的外衣，到处販卖修正主义貨色，否認阶級斗爭。他們主张对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可以进行“和平改造”，反对發动学生批評教师。他們主张进行“和平肃反”，反对在肃反中發动群众斗爭。在建党和幹部政策上取消阶級界限，在党内生活上取消思想斗爭。王还散播：“坚持真理和服从組織有矛盾”，“民主和自由沒有阶級性”，“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謬論，黄並認为匈牙利事件是“内因为主”，否認是反革命制造的暴乱。

上述事实說明王、黄已經堕落为資产阶級的右派分子。王、黄二人的錯誤程度和問題重点虽有不同，但他們都是在阶級斗爭的紧要关头，投降資产阶級向党举行猖狂进攻的。他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造成了严重恶果，給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損失。某些阶級異己分子及其他坏分子混进了党的組織和幹部队伍，許多重要部門被右派分子所操縱，医学院党的某些組織，已經蛻化变質，党内外政治思想非常混乱，在很大程度上党已丧失了对学校的領导权。

市委扩大会議全体同志对王、黄的反党言行極为憤慨。並認为：这次会議对王、黄反党言行的揭發和斗爭是我們党的一次重大胜利。鑑于医学院党委所存在的問題的严重性，扩大会議决定：

一、責成医学院党委按照市委扩大会議的精神，採取适当步驟，發动全党对王、黄的反党罪行进行全面揭發与严格清算；並在清算之后，作出适当的組織結論报市委。我們相信医学院的大多数党員是能够坚决站在党的立場上，明辨是非，提高覚悟，徹底清算王、黄的反党路綫的。

二、医学院党委应从彻底清算王、黄的反党言行中，全面地检查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以来的工作，彻底批判資产阶級的办学路綫；特别是肃反、审幹、反右派斗爭必須进行复查，把隐藏在党内外的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彻底清查出来。

三、李震勛同志身为市委委員、医学院院长、党組書記、党委常委委員，对医学院工作中存在的严重問題不仅負有領导責任，而且在許多問題上和王、黄站在同一立場，对党的許多重大政策同党也有严重分歧。医学院党委对李震勛同志的問題应当彻底进行检查，李震勛同志也必須向党彻底交代自己的問題。

四、市委文教部、监委和有关部門，必須組成工作組，在市委領导下，协助医学院党委深入工作检查，从思想上清算王、黄的反党路綫，从組織上純潔党的和幹部的队伍。

中共辽宁省妇联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立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

李立，女，三十四岁，山东莱阳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区委書記，市委組織部副部长，辽东省妇联主任，东北妇联秘書长。反右派斗爭前任辽宁省妇联第一副主任。

李立积極参加了张烈反党的活动。以省妇联为陣地，勾結反党分子林鏡清，施展各种阴謀手段，有計划、有目的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宗派活动。她反党活动的主要事实是：

一、自始至終积極地参加了以张烈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是张烈反党集团中的骨幹分子。李立参加了八月十九日晚张烈召开

的反党集团的秘密会議，当省工会副主席傅承銘同志到她家时，李拼命阻拦，使参加这次秘密会議的人得以跳楼逃走。事后，李立又到徐忠岳家，嘱徐不要說出秘密会議的內容。在张烈草拟向省委进攻的發言稿时，李为张烈出謀划策，指点他如何談起。张烈写检討时，李要张注意分寸。当张烈私自修改过去在各种会議上的發言記录时，李动員記录人不要暴露。李立还亲自出馬給张烈反党集团分子佈置任务。

二、李立在併省时，不滿省委对她的职务的安排，拉攏反党分子林鏡清，打击李紫輝和李田同志，企圖将她們挤走，以达取而代之的目的。李立为騙取全国妇联的信任，利用张烈分工領导妇女工作的身份，张烈到全国妇联造謠說：辽宁省妇联其他主任均不能担当工作职責，只靠李立一人支持工作。以后乘李紫輝同志休假之际，张烈支持李立、林鏡清，不經党組研究，私自决定检查工作，煽动群众向領导提意見，以打击李田、李紫輝同志。张烈在省工会幹部大会上污蔑省妇联工作貪多貪大，計划像綱領，工作是青蜓点水，幹部下乡是散兵无綫，有兵无将等。以此来破坏李紫輝同志的威信，抬高李立的身价。李立，林鏡清还企圖給李紫輝同志扣不执行省委决議的帽子，並从各方面打击、丑化李紫輝同志。李、林互相吹捧，李宣揚机关工作离了林鏡清誰也作不好，林則宣揚李立稳重、老練、朴素、能幹，那一点也不弱于李紫輝主任。李立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重大問題都背着其他主任，先和林鏡清商量好，再拿到会上討論。有的問題不經党組討論，擅自作主。当李紫輝同志不在时，李立就操縱党組，以宗派观点对待与她的意見不同的人。李立飞揚跋扈、横行覇道、任意破坏党的紀律，抵制省委和全国妇联的指示，背着李紫輝同志，决定将她和林鏡清的工資級別提高，省委沒有批准，她們就大發脾气。李、林在幹部中極力搞宗派活动，喜欢奉承，厭恶批評，拉拉扯扯，作風極不正派，对坚持原則不同意她們意見的同志，一律加以打击、排斥。

三、極力歪曲党的妇运方針。李立污蔑妇女工作可有可无，不作也塌不了天，妇女工作沒有历史，沒有前途等，涣散了妇女幹部的事业心。李立在妇女工作中还販卖张烈的經济主义、工团主义思想。把貫徹党的政策和走群众路綫对立起来，說：光强調国家政策，就要脱离群众。

四、恶毒攻击无产阶級专政，包庇反革命分子，散佈各种荒謬言論。她否認肃反运动的成績，說："省妇联机关沒有搞出个反革命，有啥成績。"匈牙利事件發生后，大肆宣揚鬧事声势，制造紧张空气，說："群众鬧事找党員时，党員应带头参加。"反右派斗爭开始时，李散佈說："省妇联机关沒有右派"，極力包庇右派分子王欣明。张烈和李立还千方百計地包庇反革命分子、恶霸地主李双林，吹嘘李双林的技术如何高明，为李出謀划策，污蔑工会党組违反中医政策。

党組織为了挽救李立，一年来一直是耐心教育和帮助她，但是她一直以極頑固的态度对抗組織，不作徹底交代和检查。直到这次会議开始，还企圖蒙混过去，后經过与会同志揭發、批判，反复交代政策和耐心帮助，才交代了反党罪恶活动。

根据以上事实，支部大会認为：李立已完全背叛了党、背叛了无产阶級革命事业，成为张烈反党集团中的骨幹分子、右派分子、政治野心家。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並建議撤消其一切行政职务，生活待遇由十一級降为十五級，参加劳动，进行改造。

中共吉林省林业厅机关委員会关于开除坏分子、右派分子王其清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日）

王其清（原名王亭华），男，三十七岁，汉族，山东省黄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店員，一九四四年参加工作，一九四五年在来东北途中入党。参加工作后，任过教員、文書、科員、矿务局长、县委秘書、区書兼区长、科长、採伐大队长、林务分局长、东北森工总局副处长、森工局长、森工管理局副局长。反右派斗爭前任省林业厅副厅长。一九四七年因犯搞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的錯誤，党内受过警告处分，一九四九年为工作失职，記大过两次，党内再次受警告处分。

整風运动中，經揭發並調查証实，王有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违犯国家法律的罪行。其主要事实如下：

一、一貫同党对抗，积極活动妄圖取消党对企业的領导，恶毒攻击，誣蔑党組織和党的領导人。

王其清一貫認为党不能領导企业，他說："企业党委官僚主义，只能听彙报，作用不大"。同党一直是採取对抗的态度，远在一九五三年在大石头任森工局长期間，一直是抗拒党委的領导；在党委会議上經常大吵大鬧，拒不执行党委的决定，粗暴地推翻党委的决議。百般刁难、压制和打击党委書記，甚至当面辱駡党委書記是："飯桶"，"什么也不能幹"，並积極地活动要从根本上取消党的領导。鼓动撤銷各森工总支委員会，成立相当于科室級的所謂"政治分处"，由副局长兼任"政治分处"的主任。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減少非生产开支为借口，上書党中央提

出在全国森工企业中削减党群幹部百分之九十。当党中央决定在企业里要实行在党委領导下的厂长負責制时，王表示强烈的反对。並歪曲和攻击党中央的决定，"不符合列宁主义原則"。直到反右派斗爭中还直接的祖护右派分子殷渊等关于取消森工党委的反动言論，並一再阻挠党組織对这种反动言論的批判和以此作为定案的根据。

王其溥不仅一貫地抗拒党的領导，企圖取消党的基层組織，而且对党的組織和党的領导人也是經常恶毒攻击和无耻的誹謗。一九五四年調森工管理局以后，对党組書記，党組成員，党委書記也常常公开的或以傍敲影射的手段冷言恶語地諷刺和打击。並乘調整工資的机会公开地挑撥党委副書記对党不滿。在整風期間，他的問題开始暴露时，暗地里搞非組織活动，妄圖轉移鋒芒，煽动群众，攻击党組書記。王对上級党委的某些負責同志也是不分場合地进行誣蔑和攻击，在群众中制造流言蜚語，揑造事实，混淆是非，有意降低領导同志的威信，特別是对那些对他有过批評的負責同志攻击的更加恶毒。他誣蔑党內不民主，並上書中央要求在党內建立"党員来信来訪的机构和制度"以便党員充分的表达"个人意見"。对党和国家的方針、政策指示、决議也拒不执行。一九五三年王以妨碍生产为借口拒絕省工会組織的吉林市文工团在林区职工中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綫。一九五七年拒絕执行森工部和煤炭工业部下达的关于坑木支撥的联合指示，並狂妄地說："中央有指示也不行，部长沒什么了不起的，决定問題一样有錯誤"。后来省委工业部对坑木支撥規格比例又作了規定，王仍不执行。經省委工业部，付部长再三指示，党組作了决定才勉强执行。当时已严重的影响了煤炭的生产。但背后还說怎么能这样批示呢？这是什么原則？一九五八年十月省委組織收听小平同志在辽宁省委扩大会議上的录音报告。会后吳書記指示：关于辽宁省委出現反党集団問題，在沒有公开發表以前不准講，可是王不顧党的决定就对別人講。

肆意破坏党和国家的整体事业，一九五六年軍区后勤部和志願軍营防部，为归国志願軍建造营房，急需手車鋼軌，經省里有关会議研究向原森工局借用。而王却借故搪塞，加以拒絕。一九五七年汛期全厅幹部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正冒雨乘車准备开往現場搶修河堤，然而王不顧河堤决口和人民生命財产的危险，硬把司机扣下来，为他自己开小轎車送他回家过礼拜六。

二、敌視排斥和打击工农幹部

王其清一向敌視工农幹部，对工农出身的同志，經常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排斥和打击。一九五三年大石头职工医院院长韓明同志（农民出身，党員轉业軍人）因坚持医院制度，拒絕付給王大量营养藥品，遭王报复被撤职。第八場主任邢升庆同志（工人出身，党員）屡遭王的斥責，最后借故撤了职。邢被逼曾一度想要自縊。王对工农出身的党委書記王超海同志，特別对副局长王相臣同志的欺压，已达登峯造極的程度。迫使王相臣同志不得不在王其清午睡时給他"打更"，夜間給他送手电或雨伞。尽管如此，王仍然是欺压他。王相臣送文件給王其清閱批，王接过来就摔在地下，並声色俱厉地訓斥說："你連这点事都幹不了，你还能幹什么？"。类似这样粗野行为，真是司空見慣不胜枚举。王相臣在临死前还气憤地說："王其清我死也不能和你算完"。对党委書記王超海的凌辱和欺压也是很严重的。王超海同志时常流露"真別气"。

三、横行霸道，以势压人，品質恶劣，流氓成性。

王其清的国民党作風十分严重，飞揚跋扈，胡作非为。一九五八年三月旅大疗养院派人把患神經病的呂世夫同志（原汪清森工局长）送回长春。王借口呂的病沒好，蛮横地拒絕接收，当时疗养院的同志解释說："我院不能治疗，这是組織上派我們来的，有意見以后再办，先把病人安置下来要紧"。王当时气势凶凶地破口大罵："你們疗养院是共产党領导的？是国民党領导的？就是国民党！"，"你們疗养院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你

們根本沒有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我怀疑你們有政治問題……”。他不仅狂妄地辱駡旅大疗养院組織，而还命令招待所的同志通知派出所把疗养院的同志都看起来。逼得护送人員找省委，当省委組織部陈部長，工业部肖部长接見护送人員后，决定由森工管理局将病人收留下来，王开始还拒不收留，不得已收下来，还表示对肖、陈部長不滿。

王共清这种恶劣作風是一貫的。早在一九四八年在伊春当採伐大队长时，就曾带領一些农民不顧主管单位的阻止，打开林务局仓庫，强索材料。把作业所长的行李扔出去，强占所长宿舍。領款时，門衛要出門証，王掏出手槍夺門而出。並多次持枪威吓农民。一九五〇年美溪作业所一个电話員，就因沒有及时給王掛通电話，被王开除。

王共清也曾用过最卑鄙无恥的手段玩弄、奸污女人。远在一九四六年在鶴崗工作期間，曾嫖娼宿妓，胡作非为。一九四七年在鶴立县工作时到处乱搞女人，連江口区有不少妇女遭到王的侮辱，其中有农会主任，区幹部的爱人，也有老百姓的女人。尤其不能令人容忍的是：当县里領导幹部都分头下乡，搞土改和鎮反之际，王乘机奸污了县公安局長、独立团长、罗北县长的爱人，以后又調戏副县长的爱人才被揭發。一九五〇年在伊春夜里打电話以送腊为名，把女电話員騙到室内，拉拉扯扯，企圖强奸。

四、抗拒改造，敌視整風运动，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場，死不改悔。

王在历史上犯过許多錯誤，党組織不断地对他进行过教育，但他始終无动于衷，屡教不改。一九五八年整風期間剛作完自我检查不久，就發生了旅大疗养院事件。事后不但拒絕检討，抗拒省委工作組检查，反而要流氓，訛詐和威胁組織，对党組成員施加压力，抵制对他的斗爭。

当省委布置繼續深入整風时，王極力反对在各厅局深入整風，並叫嚣：“解决各厅局問題，解决不了粮食，鋼鉄翻番問

題”。积極主张把整風鋒芒移到上边去，企圖逃避对自己的斗爭，向省委，省人委掀起一場进攻的風暴。深入整風期間，揭發了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以后，王不但拒不交代，相反地却强詞奪理，狡辯抵賴，企圖掩蓋他的罪恶活动。当在省直机关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上，揭穿了他的花招之后，他就惱羞成怒，捏造事实，向党进攻。並諷刺和反击代表們对他的批判。最后拒絕参加大会，拒絕检查。

在停职反省期間，不参加机关劳动，不写检討書，並誣蔑大家对他的揭發是“乏味”，“欲加之罪，何患无詞”。党委的同志催他写检討，他又挑衅地說：“請党委轉达省直党委和党代会，快点处理，我什么都准备好了，就等进法院了，最好馬上就来逮捕我，越快越好”。

王其清一貫仇视党，长期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並不是偶然的。王出身于中农家庭，长期受地主資本家亲属的影响，在旧商人的堆子里又作过几年的特殊的店員。其資产阶級思想是根深蒂固的。王带着这种思想在抗日战爭接近胜利时混入了革命队伍，不久即鑽入党內。虽然經过十几年的教育和历次政治运动，但其資产阶級本質沒有改变，特别近几年来却越加發展。所有这些恶劣行为足以說明他是一个混入党內的品質極恶劣的坏分子，同时又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为了純潔党的組織，党委会决定：开除坏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王其清的党籍。建議行政撤銷其一切职务，以法懲办。

中共长春市委員会
关于極右分子范政的結論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范政，男，三十四岁，共产党員，一九三八年入党，现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極右分子。

一、主要反动言行

1、經常散布对党中央、党的領袖和中央許多負責同志的誣蔑性言論，制造和散布流言蜚語，破坏中央威信，对于中央对高崗問題的处理，心怀不滿。对苏共中央及苏共領导同志也經常誣蔑，極力贬低苏联成就。

2、常在反教条主义的藉口下，以修正主义的观点来曲解和攻击党的某些重要的方針政策。如曲解和攻击党的文艺方針和向苏联学習的方針，实际上也反对党向右派分子斗爭的方針。反对党的組織原則，反对党的紀律，攻击党的幹部政策，丑化老幹部，要用文艺形式挖"老幹部的灵魂"。

3、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早在沈阳、哈尔滨等地工作期間就与右派分子刘宾雁、张震結成反党集团，范是其中的骨幹，調动工作后仍不时来往，进行反党活动。来长春后，又同部内几个右派分子糾合一起散布对党不滿的言論，破坏市委領导威信。

4、为人虛伪成性，狂妄已極，在生活上則是腐化墮落，靡烂不堪。据交代的材料，在近几年来前后曾与十四个女人發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二、反党的思想根源

范政虽然是在党的直接教养下长大的，但长期以来，一直沒有受过严格的斗爭鍛炼，思想沒有得到很好的改造，进入城市后又沾染了严重的資产阶級思想，以至使他成为品質很坏和一个具有野心的人。再加上在反对高饒反党联盟的斗爭中，他不但沒有得到应有的教訓，相反的在他父亲李常青（註：李是高崗反党集团主要成員，整風运动中定为反党分子，已开除党籍）的影响下，又助长了他对党的仇恨与不滿。因此范政今天成为反党的右派分子、右派的骨幹分子並不是偶然的。

三、斗爭中的态度

他的問題被揭發以后，态度尚好，經过斗爭，对他反党的言行基本上作了检討和交代，並有决心悔改和重新做人的表示。

四、处理意見

开除党籍。留用察看，参加农业劳动，进行改造。从原来的十一級降到十六級。

鑑于范政曾任过市委宣传部长，其言行在幹部和知識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拟連同其他两个幹部中的右派分子，在一定范围的幹部会議与报紙上进行批判，以教育幹部，肃清影响。

长春电力設計院整風
領导小組关于極右分子张涛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

张涛，男，四十四岁，家庭出身富农，个人成份学生。山东嘉祥县人，一九三八年入党，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现为长春电

力設計院院长、党委常委委員。

主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一）以修正主义观点，改造党的面貌。

（1）否定党的領导作用說："党委不懂业务，不懂技术，怎么个領导法呢？对生产很难討論"，"五年总結都是技术問題，我也沒看，党委討論也沒有什么"。"我們这个单位同大学差不多"；"大专学校党委制是值得研究，学校要党委領导，校长幹啥呢？馬寅初幹啥呢？""象我院这类机构……行政上搞的計划、設計等工作，党委不能去搞，所以在我院如何領导应当研究"。"党就不能在一切工作上發号施令！"

（2）污蔑党的組織原则——民主集中制說："党是民主制，不是什么长制"，"党的書記嗎，就是把大家的意見記录一番，書記書記就是記記录，这就是党的民主"，"党务工作不能由書記一人負責，大家都是党委委員，都有責任，都能决定問題"，"不是非得書記出面才是党的領导，行政幹部出面也是党的領导"。

（3）成立非法組織，代替党委領导，說："党是管党員政治思想的，行政也有一套系統作政治思想工作"，"象我院这样机构，应当有一些人組成的会議，来討論一些重大問題"。一九五五年初他来院不久就倡議成立了既脫离上級領导又不受群众监督的"領导幹部小組"，"交流思想，交流情况"。一九五七年夏，又成立了院务会，在此会議上討論的問題，事前不向党委請示，事后也不报告党委，特别是請党委書記参加这个会議，說什么："党委書記应参加院务会議作为成員，否則在会上說話別人爱听不听，苏联赫魯曉夫是第一書記，又是主席团委員，德国烏布利希是第一書記，又是副总理"。此外，还繼續实行代替党的領导的"党政工青碰头会""核心小組"認为这是党的領导的一种形式。

（二）污蔑省、市委，抵制派遣幹部，赶走党委書記。

（1）污蔑省、市委說：“市委开的会不够劲，能解决啥問題？这是水平問題。”“市委怎能領导人大、师大、六五二呢？我看这是省委客气，饒斌、程仿吾、匡亚明都是怎样的幹部，还是省委領导好”，“市委工业部只抓些工厂……不了解我院的业务”。

（2）抵制市委派遣幹部說：“省委还能給我們派来好幹部？”“市委只照顧自己”，“一定是市政府缺幹部，由下边来抽調”。为拒絕执行市委的决定，还給电力部基建总局打电話、打电报，誹謗說：“市委調走楊林，派来一名駐长部队同志的爱人作党委書記那行？”，“新来的女同志能否胜任尙屬疑問”，“根据‘八大’精神应加强党委，若如此調动，似乎削弱”。以后借着张松林同志同意党員出坏分子魏丰年的大字报之机大肆攻击，說“市委說加强我們这兒党的領导，张松林也不长气，看市委怎么办吧”，“現在鳴放嗎，对市委放一下，問題是有，当然市委是了解的，而在許多問題是是非問題，市委是不知道的。这段工作也有很多缺点，市委督促检查不够，过去一年来我們吃了亏了”。“蔡部长（检查組长）你是代表上級党委来的，要講正气”。同时在背地里进行活动，說：“先把张松林这个事搞一搞，剩下的事再同市委弄一弄”，“我昨天晚上在会上發脾气，蔡部长講的不够劲，张松林一点也未检討，因此我生气了”。

（3）企圖赶走党委書記。张書記尙未到职前，他就極力誹謗貶低，以“部队同志的爱人”，“女幹部，水平又低，又在家住”等等作为理由拒絕前来。到职后則糾集一些臭味相投的人千方百計地企圖赶走。先是背地議論“张松林根本就不行，水平太低，差的太远，作不了工作，一天淨出事”，“去市委反映情况片面，传达市委指示片面，不知丢了多少內容”，“开会三言两語，归納不起情况来”，“那次会也沒有提出个象样的东西来”等等，以制造不良气氛，制造赶走张的思想准备。繼之公开出

馬"面对面斗争"。在第二次鳴放前夕，鼓动地說："对张书記的意見和看法問題，在整風时好好整整吧！"当张松林同志同意党員出了魏丰年的大字报，他們几人就立即議論，"这张大字报不是打击报复嗎？这样的大字报不好，影响鳴放"，在去市委回来以后又議論："市委說影响大就处理，怎么算影响大呢？"于是背地或公开的散布起来"影响还不小呢！""翟部长已經定了，就是打击报复"，"明天开会不要有顾虑，有啥講啥"。在市委来人参加的党委会上他攻击說："张松林本身来說，是个人独断，並不重视党的集体領导，别人意見也不听取"，"情节非常严重，非常恶劣"，"党委本身是气憤、等待、洩气、走了算了、不幹、不滿，何必在这幹呢？""一年来沒开个好会，过去的会大都是不是吵架，就是湊湊"，最后詭称对张的检討气憤，"我代表設計院的党員不能不对此歪風邪气斗爭到底"。会后有人指出他的言論使张松林今后不好工作，他狂妄地說："不好工作就滾蛋唄！"

（三）阻撓反右斗爭，袒护右派分子。歪曲反右方針說："反右生产两不悞，反右为了生产，生产也是为了生产，生产忙可以請假"，並屡次向党委要积極分子名单和斗爭計划。还認为当时查出二十二名右派分子多了，主张查錯。除在时間和数量上限制斗爭以外，还指責搞臭右派的作法說："这东西画的不象样子，你們根据什么画的？""什么时候揭下去？"对右派分子百般袒护，堅持不定刘玉庭为右派分子，竭力推翻已經市委批准的右派（关晋昌），公开批准已斗爭的極右分子凡尙新、陆誠三出席重要会議。

斗爭中的表現：

斗爭开始，訂立攻守同盟，避重就輕。經过几次斗爭后，承認了事实，低头認罪，願意悔改。

結論及处理意見：

张涛出身于富农家庭，反动立場沒有根本改变，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沒有徹底改造。几年来，生活上斤斤計較，思想上驕傲自大，目空一切，竭力吹噓自己，貶低別人，只能領导別人，不服別人領导，工作上独断专行，严重右傾，用人不問政治，組織上进行宗派活动，拉攏臭味相投的人，打击不順心願的同志。他这种思想、言論、行动受到了限制，便对党不滿，尤其近一年来更为囂张，正如他自己說的“今年情緒就更不好了，听到个事，情緒就来了”。在这次大鳴大放中，原形畢露，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成为極右分子。

处理意見：开除党籍，撤消原有一切职务，留用察看，降低待遇（十一級降至十六級）。

新华社黑龙江分社整風領导小組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章洛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历史情况

章洛，男，三十五岁，广东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一九四〇年八月参加共产党，一九四四年十月参加工作，一九四八年到新华社工作，先后曾任过記者、組长、新华分社社长。

章洛历史上曾失掉过党的关系，章的家庭系恶霸地主，土改时，其父亲被我判处死刑鎮压。

（二）反党言行

（1）章洛誣蔑省委"瞒上压下"、"报喜不报憂"，他自称是"中央記者"，有監督省委的責任和义务。他以歪曲的事实写信給党中央，他認为"这样才能使中央了解省委的眞实情况，好来糾正省委的錯誤。"在行动上，违背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結的决議，进行非組織活动，反对省委領导。集中表现在"此風不可長"反党事件后和省委領导的較量。

（2）章洛誣蔑"省委政治思想領导是抽象的，省委不懂新聞业务，地方党委不能領导新华分社向全国报道，向省委請示只是走走形式"。

（3）章洛誣蔑省委一貫"不民主"，批評不得，一批評就炸。他追求資产阶級民主，反对民主集中制。

（4）章洛誣蔑黑龙江省千百万人民在共产党領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为"一般化"，他認为中共黑龙江省委应有自己的"新創造"，而省委却是"照抄中央的东西。"

（5）章洛丑化与攻击省委領导核心，誣蔑省委領导水平低，他說：欧阳同志头脑不太健全，喜欢作長篇报告，但內容一般化，沒啥新东西，發了脾气乱罵人。

章洛对省委另外四位書記和宣传部于林部長也都有过丑化和攻击。

（6）章洛誣蔑省委領导"特殊化"的"此風不可長"反党稿件，是他反党活动的集中表现和总暴露。"此風不可長"能在人民日报上發表，是章洛把黑龙江日报"內参"（按指"此風不可長"稿件）轉給新华总社內参組，他並附信說如不能用請轉給人民日报而引起的。特别是他抗拒省委对这个反党事件的批評与省委分庭抗禮，採取非組織活动与省委較量。在他領导下的干部中，散布对省委抗拒情緒，他表示不当社長也要和省委爭清楚。

（7）章洛在“肃反”、“整風、反右派”等政治运动中，丧失立場，向斗争对象洩密討好。

肃反运动中，章洛对确定王良为肃反对象思想不通，一九五七年五月，大鳴大放期間，王良来哈尔濱时（王已調北京总社工作），带着对肃反不滿的情緒，曾質問章洛为什么斗他，章洛向他表示道歉說：“我对你是了解的，斗争你是省委决定的”。

章洛对分社在斗爭右派分子任永达的紧要关头时，又对任洩密討好說：“我們有右傾思想，确定你为右派是省委文教部帮助确定的。”

在肃反、整風、反右派运动中，章洛包庇黄沙（黄沙是章洛的妻子）。肃反运动时，章洛曾为黄的历史作过辯解，整風反右运动中，章洛身为分社整風領导小組組长，对黄沙的右派言論，曾向整風領导小組成員作过开脫性的解释。

（二）章洛的态度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章洛和于长欽在总社談分社过去存在的問題时，总社領导同志指示，回分社在省委領导下把問題搞清楚。章洛先回分社，他立刻便把在总社談的情况向編委作了簡单的传达。同时，他認为这次批判是于长欽在整他，並以挑拨离間手法，把于长欽在总社說过韓之非（分社編委）思想落后有問題等情况，在韓之非面前全部講了出来，造成很坏的影响，当时章洛还說于长欽可能回分社工作，影响韓当場表示了“他回来我就走”。

經过初期的批判揭發后，章洛开始認識自己的反党的右派罪行。但是存在一定侥倖想法，态度不够好，表現了不誠恳，不老实，患得患失，有时有对抗情緒，經过領导同志多次个別談話和大家的批判，在揭發出的大量事实面前，开始低头認罪，並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开始有了交代和检討，在处理过程中，有放下架子服从改造的表現。

（四）結論和处理决定

根据章洛上述反党言行和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分社整風領导小組决定把章洛划为極右分子。

根据章洛的实际情况（妻子黄沙是右派、身体很弱、四个小孩，监督劳动很难自食其力）和他身体較弱等情况，分社整風領导小組决定：按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标准的第四类处理，即：开除党籍，行政撤消职务，降級、降薪，由原十二級降为十六級，另行分配其他工作。

中共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党組关于右派分子閻伟鋒的反党活动和处理意見的报告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閻伟鋒，女，四十一岁，官僚破落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历任小学教員、区妇救会主任，热西分区妇联会主任，察哈尔省妇联会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华北分院民庭副庭长，一九五四年调我省检察院任副检察长，十一級。

一、閻伟鋒的主要反党事实

1.煽風点火、包庇右派，和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向党进攻。閻伟鋒在整風前夕，就和省院肃反中被触动的現在是右派分子陈光伟、吳玉嵓、宋惠之和疑似分子李文珍以及张庆云等人糾合在一起，向党展开了进攻，攻击肃反运动。一九五七年春乘机关处理张庆云、刘巩問題之机，在机关墙报上書写了不少反动稿件和漫

画，誣蔑誹謗党沒有民主、肃反是打击报复、領导无动于衷、人面兽心等。当时的反动气焰極为囂张，曾引起了广大幹部的义憤。而閻伟鋒（党支部書記）和他們糾合在一起兴風作浪，批准反动稿件的刊登。当邵中堂、张安甫等同志向她反映壁报稿件有問題，並要求对反动稿件进行批判时，閻伟鋒别有用心地說："人家这是正义的批評，壁报是自由园地嗎！"（指反动稿件）。陆检察长对反动的稿件提出批判，閻伟鋒更不惜使用卑鄙伎倆加以反对，一面指示办公室主任刘巩同志，出面答复接受反动稿件的質問，一面背地散布王副检察长违犯机关制度，支持右派分子对王副检察长的攻击。当陆检察长發現这些問題即进行不断批判，並不准刘巩答复时，閻伟鋒即公开蛮横地說："我說話还不如放屁哩"。在党組会上研究反革命分子陈鉄农的肃反結論时（陈鉄农現已逮捕法办），她明目张胆地为反革命分子开脫罪責，她不仅反对五人小組将反革命分子陈鉄农的反党反領导的現行破坏的事实写在結論中，反而旁敲側击誣蔑肃反是打击报复，在会議上她公然說："我不怕說我右傾，也不怕和我算老賬，有人打击报复我"。机关整風运动进入反击右派的阶段后，閻伟鋒常不参加領导小組会議和反右派的斗爭，反而打击运动中的积極分子。去年六月下旬，省院整風領导小組开会划分右派分子时，再三地請她，拒不参加，故意刁难整風領导小組。对右派分子召开辯論大会，因陆检察长参加省人代会議，王副检察长到高检开会，整風領导小組研究决定由閻主持这个会議，当时陆检察长指示："要作好准备工作，一定要将辯論会开好"。她即当場拒絕陆检察长說："現在不开等人代会結束后，你回来再开吧！我看你是对我不放心"。由于閻伟鋒在整風运动中身怀鬼胎，则不惜採取一切卑鄙的手段，监視領导，打击积極分子。有一次开整風領导成員会議后，閻見到党支部副書記楊庆浩、王生光同志，从陆检察长屋里出来的晚了些，閻随即追問陆检察长："楊庆浩、王生光和你說什么来？"陆检察长說："搞大字报的問題，我叫他

們和你商量”。这时閻即威胁說：“支部工作我不管了，支書我也不当了”。当郑江同志（五处处长）到王副检察长屋內請示一个問題出来后，閻又将郑叫去質問：“你和王检察长說什么来?!”不仅如此，在反击右派斗爭时，閻作鋒为了保护自己，蒙蔽群众，轉移群众的斗爭視綫，而包庇右派分子南星更为突出。丁石川（副处长）同志将张丽芳同志反映的右派分子南星抵抗反右派的斗爭向閻彙报后，閻即指責說：“这是对領导的态度嗎?”指示丁石川同志要批評张丽芳。整風办公室将群众揭發南星的問題向閻彙报后，她即指示办公室主任說：“要和他們說一下，別反到好人身上来”。閻恐怕群众斗爭的鋒芒指向南星而燒到自己，她極力向陆检察长說：“你給张安重他們談一下，別反到好人头上来”。当南星反党的丑恶面目暴露后，即向閻要求休假，她为了袒护南星过关，使其逃避运动，便替右派分子南星向陆检察长請示休假，当陆检察长不准时，閻作鋒即不滿地說：“你不要替人家考慮問題了，人家的問題个人会考慮”。

2.捏造事实，制造分裂，破坏党的团結和統一。一九五七年整風前夕，省委指示：由省院党組討論提出对刘巩、张庆云同志問題的处理意見时，她在会上却公开地反对省委指示，讓党組进行討論，並荒謬地說：“过去处理张庆云，支部参加与否我是参加了，那时我沒有堅持意見，盲目地跟着党組跑了，今后要接受教訓，支部不能跟着党組跑了”。閻这一阴謀失敗后，便进一步地捏造事实向党进攻，向陆检察长說：“裴仰山同志給我打来电話，要在党組会上討論你的思想”。尤其在整風运动中，閻怀疑人事处楊庆浩同志，向省委反映了她的問題。她借着省委指示要从省院調一名处长的机会，又捏造了省委决定，向陆检察长說：“王志杰同志对我說，省委决定調楊庆浩，不能变动”。更不可容忍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她借向高检彙报工作之机，在牛喜珠案件上，捏造了张老的指示。张老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对牛喜珠案件要抓紧处理”。但閻从高检回来后向陆检察长传达时即捏

造张老指示說："牛喜珠案件不管林鉄检討不检討，我张鼎丞要检討"。陆、王检察长将她捏造的这一指示向明河同志作了彙报，当时明河同志指示："要閻写个文字材料报省委"。閻伟鋒不但不写，反而抵賴說："我对明河同志有意见，你們（指陆、王检察长）都去北京开过会，为什么不讓你們写材料，偏讓我写，这是不相信幹部"。閻伟鋒憑借副检察长的身份，独断专行，抗拒党委的决議、指示，为时已久。一九五七年整風初期，承德地委为了及时打击現行罪犯，經研究决定将逮捕拘留条例第五、六两条（包括对現行犯的批捕权限），下放到县委。而閻同年六月到承德检查工作时，以她检查出的所謂"八起錯案"为根据，即指責分院对批捕权限控制的不严，县里超越了职权，乱行逮捕，不依法办事，扩大了現行犯的范围。公然推翻了地委的决定，並指示分院："将审查批捕的权限仍控制地委，各县不准随意扩大現行犯的范围"。早在一九五六年冬季，閻伟鋒听到省委决定要从省直各部門抽調幹部到专县检查工作的消息后，閻即秘密告訴南星将三处人員赶快分散下去，逃避省委抽調幹部。同年河北幹疗院，有一住院的党員幹部身死，省委电話指示：要检察院立即解剖查明原因。而閻伟鋒多次抗不执行，反而再三追問省委何人打来的电話。有一次当省委召开会議时，閻去听报告，被服务人員查問了一下，她回机关后，即大發雷霆，罵河北省排斥外来幹部。一九五七年七月高检指示，糾正过去各地参与公安机关偵察、現場勘驗、搜查逮捕，扣押等监督，而閻伟鋒拒不执行，企圖把专政矛头指向人民內部，擅自将自己搞的违背高检指示的材料通报各地。当时丁石川（副处长）同志再三向她建議，此材料不必通报，她不但不予考虑，並蛮横地說："我說發就得發，有錯误我負責"。此外，閻伟鋒攻击党，誣蔑領导的事实是带一貫性的，如誣蔑陆检察长无能，說話抓不住中心，爱摔舌头。陆检察长有一次批評省院几个同志要求退出工会不換工会証，她即散布說："陆检察长給工会掌腰，多管閑事，事务主义"。並誹謗

說："工会对我沒福利，我对工会不感兴趣"。在伟大的肃反运动中，省委通知各机关五人小組成員去省委开会，陆检察长指示，讓她参加省委召开的肃反工作会議，她拒不参加。一九五六年省委和省人委在一天召开三个重要会議，須要三个检察长去参加，当陆检察长征求她的意見参加那个会議，她毫无理由的拒絕說："我那个会議也不参加"。

3.散布流言蜚語，污蔑工农幹部，品質恶劣，作風蛮横。閻平时对处长一級的幹部，經常进行誣蔑、誹謗，她散布郑江（五处处长）不象个处长样子；赵佐臣（办公室副主任）办事办不好，連个会也开不了；楊庆浩（人事处处长）沒能力，作不了人事工作。並誣蔑寇庆水（副处长）同志拙嘴笨舌，說話說不出一个原則来；馬庆瑞（副处长）不行，幹不了工作。相反的赵佐臣同志向她反映右派分子李涛思想意識不好，她即說："这个幹部不錯"。閻伟鋒作風蛮横，品質恶劣更为突出。陆检察长和閻同时坐車出去开会，若先接了陆检察长，閻就不滿意，曾有一次先接陆检察长回来，車走到帅府胡同南口（离机关还有几十步）遇到她，汽車鳴笛，她就不躲道。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不仅在本院，还涉及到下級检察院。一九五六年閻带領工作組到邢台检查工作时，分院請她看戏，因向地委沒借到汽車，閻竟然将戏票撕碎。

二、处理意見

党組認为，閻伟鋒这一系列的反党言行，是有她的阶級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的。閻自小生长在官僚破落地主的家庭，在家过着不劳而食的剝削生活。虽然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后，經党長期的培养教育，但其反动的阶級本質尚未改变，資产阶級的个人主义佔着統治地位，自参加工作后，就怀着"当領袖的欲望"。她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更不是孤立的，远在察哈尔省工作时，她曾攻击过妇联会主席，調来省院后，即和其他右

派分子糾合在一起，内应外合，向党进攻。她的反党事实被揭發以后，經大家多次帮助下，她在几次检查中，玩弄手法，进行頑抗抵賴，在群众摆事实、講道理面前，亦不作交代，抱敌对情緒，态度極不老实。

据此，党組一致同意省委关于对右派分子閻伟鋒开除党籍，撤銷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安排工作的批示。党組意見由十一級降为十六級，可安排到农場工作。

× × ×

省委已批准訂其为右派，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另行分配較低工作。

中共河北省委监委

中共唐山鉄道学院委員会对右派分子白鉄岩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白鉄岩，現年四十二岁，辽宁省沈阳市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个人成份是学生，一九三七年七月参加革命，同年十月由王达、张桂二同志介紹入党。由于入党动机不純，經不起党的考驗，同年自动脱党。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又重新入党。曾任晉察冀日报編輯，东北铁路总局厂务部長，大連鉄路工厂副厂長等职，現任唐山鉄道学院副院長、党委委員。

白鉄岩在将近20年的工作历史中，从許多重大問題上証明他是一个資产阶級的極端个人主义者，爭名誉、鬧地位，在領导作風上施行家長統治，粗暴蛮横，一貫违反党的政策，对党不滿。

在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期間，白鉄岩任东北鉄路总局厂务部

部长时，向其姐夫美国間諜于葆廉洩露軍事秘密，給党和人民造成很大損失。在“三反”时期，又表現严重的自由主义，抗拒运动，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要求各单位領导把“三反”运动搞好，否則要受撤职处分，白則公开散布說：“这是吓唬神經衰弱的人”，曾被停职反省一周。在大連鉄路工厂任副厂长时，破坏国家財經制度，並假报成績，鬧不团結等，受到中共大連市委在党报上公开批評，白鉄岩对此一直不滿。在这次整風运动前后，白鉄岩又向党向人民大肆进攻，主要有以下事实：

1、借唐山鉄道学院建校問題公开煽动群众，把火引向中央，企圖用群众压力反对中央关于唐山鉄道学院在唐山扩建的决定，並捏造事实給滕部长写信，企圖威胁，同时給同学作煽动性报告說：“建校問題不是学校无能而是上級的官僚主义”。“可以組織代表团或築报团到中央去談”，並企圖同意学生要求停課，討論建校問題（实际是鬧事）的意見，並在工会委員会上提出三点綱領性的反党建議：第一、建校問題是一个細致的艰苦斗争；第二、目标要明确；第三、建立組織机构，进行調查研究，以加速建校問題的解决。在白鉄岩及其他右派分子的策划与煽动影响下成立了反动的“建校促进委員会”及进京代表团，与在学院的墙壁上貼出了“收复失地”“重返花园路”“反对鉄道部、高教部对唐院慢性謀杀”等反动标語口号，形成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囂张气燄。从許多事实分析，白鉄岩是蓄謀已久，有計計有步驟，有目的地採用各种手段企圖推翻中央关于唐院在唐山扩建的决定，以达到他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慾望，湖使群众对党不滿抗拒党和国家的方針政策，是公开反党反中央的恶毒行为。

2、否定党对高等学校的領导，反对学校向工农开門的方針。白鉄岩公开散布說“高等学校党委制有无問題不一定”，並散布“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等反动謬論，仇視工农幹部和不关心工农幹部学习，其实質是企圖把党及工农幹部推出大門。

3、反对民主集中制，歪曲党的政策。白鉄岩認为毛主席十

条方針对学校关系不大而反对深入学習与貫徹执行。認为鉄道部幹部政策有問題，幹部外行不懂业务。整風时在学生座談会上歪曲党的“肃反”政策，說：“过去紅旗政策时期，肃反一杀是几十几百”，並在給畢业班作“再論无产阶級专政历史經驗”学習报告时，汚蔑党的历史，說：“过去党不懂得团結——批評——团結，开除了陈独秀、张国燾，現在看来是不必要的”等等。

4、誹謗鉄道部的領导幹部，蔑視唐山市委及兰州市委的領导，散布对学院党委及其他同志的不滿情緒，破坏党的团結。

5、白鉄岩还丧失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質而一貫玩弄妇女：在一九五二年白鉄岩就曾利用职权和地位玩弄了在他所領导下的两个女职員；在学院工作期間白鉄岩身为高等学校的副院长（当时代理院长）、党委委員，不顧党的影响又玩弄了一个女学生，特别是在此次整風检查中竟与該女生去信欺騙該女生說他已离校（实际他正在校作反党言行的检查）並要求保持这种不正当的关系，而不向党作交代，这种品質異常悪劣，亦是党所不能容忍的。

半年以来，党内外对白鉄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了多次揭發和批判，而白鉄岩並未作徹底的检查和交代，直到支部大会討論其处分时，对党仍不老实，对其丧失共产主义道德品質的行为仍隐瞞不作交代。二十年来白鉄岩一貫拒絕党的教育，堅持錯誤，以致最后堕落为資产阶級的右派分子，已成为党的叛徒和敌人。为了純潔党的組織，党委同意該支部对白鉄岩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並建議上級領导撤銷其一切行政职务。

中共邯郸市委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张田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我市整風运动中，徹底揭發和批判了市委委員、矿务局党委第二書記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我市党組織內两条道路斗爭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对于从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純潔和巩固党的組織，增强党的战斗力，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發展，有着極为重要的意义。

张田虽受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根本沒有确立，当民主革命轉入社会主义革命之后，由政治上的动搖而走向叛党。当波、匈事件發生后，特别是我国人民內部矛盾也比較显露出来的时候，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活动赤裸裸的暴露出来，而且达到了最高鋒。张田是一个極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有强烈的个人野心，热衷于追逐个人的名利、地位，达不到目的则对党不滿，尤其是当他攫取矿务局党委第一書記的野心未逞，便發展到仇恨党，反对党的地步。

张田反党活动的突出表现是：在政治上完全站在資产阶級右派的立場上，和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样，恶毒地攻击和反对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項政策。

他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正确性，否認中国农业合作化的成績，他把波、匈事件的發生归之于农业合作化，誣蔑說："苏联农业搞了几十年，还沒有搞好，现在荒地很多。中国不出問題則罢，出問題也是出在农业上。"当我国人民內部矛盾比較突出起来的时候，他进一步夸大並捏造事实說：

“我国农业合作化搞坏了，很多好地都荒了。什么千斤亩、千斤队，都是下級幹部为騙取荣誉向上級作假报告，村幹部强迫命令很严重，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再这样下去老百姓就造反了。”他不仅如此而且恶意的誣蔑說：“毛主席只知道好的一面，下乡也是到好的地方去”。

他否定肃反、审幹的成績，恶意的歪曲事实說肃反、审幹搞糟了，老幹部离心离德了，知識分子消沉了。他誣蔑党組織在肃反中对重点人“集中”、“搜查”是“侵犯人权”、“违犯宪法”。恶毒地攻击肃反中的积極分子，說积極分子写检举为的是得奖而陷害人，和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实行內外夹攻。他並公然替反革命分子辯护，說人家要革命，我們不能象赵太爷那样，不讓人家（反革命）革命。更恶劣的是，替反革命分子开脫罪責，擅自武断地将反革命嫌疑加以否定。他为了达到其反党目的，曾积極地在受过处分的党員中、在肃反对象中、在被党审查过的人員中进行串連活动，对其表同情或帮助其翻案。並揚言我只要在南边（指峰峰新市区）走一遭大民主就会起来。不难看出，他已經完全站到和党对立的地步。

张田对于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都从根本上加以反对，他說：“历史上的运动，偏差很大，伤人过多，錯誤相当严重。”他誹謗省、市委根据四中全会精神解决矿区領导問題是“以宗派反宗派，是无情打击。”他在党的幹部政策和建党問題上，散布取消阶級分析的观点，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什么阶級成分也沒有了”，“知識分子知識很多，不用培养就够党員条件了。”他甚至連党报也进行恶毒的誣蔑，說：“人們写假稿子就登报，不那样找个叉就受不了”。

整風运动开始后，张田則完全和右派分子站在一起抵抗党所領导的反对资产阶級右派的斗爭，他对于这場严肃的政治斗爭，一直抱着拖延、抗拒和反对的态度。一方面对于中央指示：轉向反右派斗爭，解决敌我矛盾問題；用阶級分析方法划分左中右的

問題；反右派斗爭必須依靠党团員和左派群众；对于党內右派也应和党外右派一样，一視同仁等等，公开加以反对。另一方面則把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歪曲为是因肃反得罪了人家，或借口是过去的积極分子等，对右派分子加以包庇、縱容、袒护等，以达到破坏党对右派分子的斗爭。

张田不仅是在政治上和党对抗，並且从組織上猖狂地向党展开了进攻，粗暴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領导原則。

他把資产阶級的技巧权术搬进党內来，本来党組織过去对他一直是信任的，解决矿区問題他是积極分子之一，他的工作一直是被重用的，但他却混淆是非，顚倒黑白，說什么党組織对他不信任，自己一貫受打击和排斥並打着为矿区鳴不平的幌子，借以煽起群众对他的同情，使党組織处于困难和被动地位，企圖达到他反党的目的。他为了抗拒上級党的領导，把下去帮助工作的市委負責同志和工作組，都說成是市委对他的不信任，对他的"监視"。他把工作中的成績都归为己有，貪天之功为己功，反之他把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錯誤，加以夸大，强加于别人，借以达到反对别人的目的。

张田为实現其反党目的，在局党委內部爭权夺势，独攬大权，还用了剝削阶級的技巧权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抓别人的小辮子，鑽别人的空子，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重大問題不經党委討論，就擅自决定处理。个人意見經常强加于人，遇有和自己意見不一致时，就大發脾气，斥責别人对他不尊重，或者說人家不懂，而武断的加以否定，严重的破坏了党的集体領导原則。

市委認为，张田所以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首先，我們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历史时期，无产阶級同資产阶級之間的斗爭不仅存在着，而且有时还表現得特别尖銳化，这种斗爭不可能不在党內反映出来。张田所以在波、匈事件發生之后，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人民內部矛盾也比較显露出来的时机在政治上背叛了党，完全站在資产阶級

右派立場上，猖狂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正是社会上的阶級斗爭在党內的具体反映。

应該指出，张田虽受过党的多年培养教育，但由于他固有的反动的思想观点，沒有得到根本改造，所以一有条件就会暴露出来，並力圖按照他的面貌改造党，这次事件的發生，实質上是他的反动思想的总暴露。

应該看到，张田的叛党是他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發展的必然結果。张田是一个極端的个人主义者，他有强烈的个人野心，追求名利、地位的慾望極高，虽然党对他一直是信任和重用的，但他貪而无厭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慾望，却始終得不到滿足，所以他总怀疑党对他不信任。当其受到党的批評时，就更加对党不滿。一九五七年，他攫取第一書記的野心未逞，对党更恨之入骨。因此，他便由極端个人主义，一步一步地發展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步。

应該着重指出，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揭發之前，矿务局党委对他並不是沒有斗爭的，当揭發了他的罪恶活动之后，市委和局党委的負責同志都曾对他进行談話，帮助他提高認識，正視錯誤，力求对他进行改造。但是张田却一直堅持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場，並两次以自杀的叛党行为，拒絕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挽救。上述事实充分說明张田已經完全叛变了党，成为党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

市委認为，张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对于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他損害了党的威信，損害了党的团結統一，給革命事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損失。鑒于张田已經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員的条件，因此决定开除其党籍，撤銷其市委委員和矿务局党委第二書記职务，並在党內外予以公布。

中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局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斐然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王斐然，男，五十五岁，河北阜平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职員，一九二一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入党，一九二七年脫党，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县財政科长、县长、专員、雁北办事处主任、边区行政委員会司法处长、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华北分院副审判长等职，北京解放后任北京市人民法院院长。現为中共北京市委候补委員，市监委委員，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长。

王斐然在整風反右派斗爭期間，支持同情右派分子的言論，与右派分子共鳴，利用他的領导职务，对和他关系密切的右派分子多方袒护、包庇，与右派分子賀战軍訂立攻守同盟；反抗市委領导，污蔑市委不懂法律；反对无产阶級专政，堅持宣揚旧法观点，如“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等；依靠重用旧法人員和其他政治历史上有严重問題的人；长期以来組織反党宗派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以上事实說明右派分子王斐然，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員的立場，成了党的叛徒。为了純潔党的組織，支部大会到会党員五十三人，其中預备党員三人，正式党員五十人，一致通过开除右派分子王斐然的党籍。

附：右派分子王斐然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要言行

一、整風、反右派斗爭期間的反党活动

支持同情右派言論，与右派分子共鳴。整風初期，法学界座談会上，有人攻击党对政法部門和高等院校的領导，会下王斐然对右派分子賀战軍說："唉呀！这風不整真不行呀！宗派主义多严重，真是糟得很。"在高級法院的整風座談会上說："現在看来整風是非整不可，从报上看来，簡直是怨声载道"。王斐然利用他的領导职务，对和他关系密切的右派分子多方袒护、包庇，如对右派分子郑孟平、李接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材料拖延不报，市委批准郑孟平为右派之后，他还說："先斗吧！将来甄别定案时再說。"王斐然不仅在整風前后支持和縱容賀战軍进行反党活动，賀战軍被撤銷整風領导职务和划为右派之后，仍对其包庇、袒护。賀战軍被撤銷整風領导职务时，王事先了解賀的問題，但在向群众宣佈时，他一再强調賀是右傾問題，不是右派問題，並为賀出主意只检查右傾。王斐然不但不积極領导反右派斗爭，反而給群众潑冷水，在主持斗爭右派分子賀战軍的会上，群众要求賀徹底交代問題，王竟說："这就是交代嘛！这就是交代嘛！"另一次会上群众責令龙离、余靜佳（与賀战軍都有攻守同盟）交代与賀战軍的关系，王竟大声制止說"不要强加于人！"

与右派分子賀战軍訂立攻守同盟繼續与党对抗。右派分子賀战軍的反党言行，有的与王斐然是共同的，有的受王斐然支持縱容，王为了隐瞒自己的反党罪行，利用其妻吳作賢与右派分子賀战軍串連，通風报信，訂立攻守同盟。王斐然多次讓吳作賢到賀的宿舍观察动靜。賀战軍訂为右派后对吳說："放心吧！好汉作事

好汉当，不怨天不怨地，怨我自己錯了，一貫道講話，不拉前不扯后。”並說：“王院長的問題我能兜多少兜多少。”反右派斗爭深入的时候，賀对吳說：“鬧来鬧去，团結問題非得把王斐然鬧出来不可。”賀还对吳說：“王斐然告訴过他，刘仁同志批評賀战軍工作不积極，男女关系有問題。”吳作賢告訴了王斐然，王說：“怎么把这問題也談出来了。你告訴他不要这样說出。”吳又轉告賀战軍。王囑咐吳与賀的串連活动中要“多听少說”並对吳說：“發現情况先向我說，然后再告訴組織”，“賀战軍說我的問題你不要叫組織上知道。”吳作賢全照办了。

二、反对党对法院工作的領导

1，反对党的領导、誣蔑市委不懂法律：王斐然借口审判独立，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領导。一九五五年向郭步岳同志說“現在审判独立不起来，主要原因是党委干涉，現在区委干涉区法院，简直連判决都不能下了。”一九五六年复查案件，王又对郭步岳同志說：“市委不懂法律，有些事情不好办”等等。

2，抗拒市委指示与党对抗：一九五六年复查案件期間，在政法联办討論复查的案件时，馮基平同志等对王斐然、賀战軍提出的荒謬論点不断地进行了批評，王始終堅持錯誤，会下对賀战軍說：“唉！建設法制真是个艰苦的事，不容易，应当耐心等待覚悟提高，才知道自己（指馮基平同志）是錯的嘛！”还讓賀战軍到会上去“百家爭鳴”。不仅如此，在行动上抗拒市委的指示。一九五六年八月底馮基平同志根据市委指示，在政法联办会上明确指出：除了冤案以外，一律暫不改判，需要改判的案件，待研究后再定。但王斐然竟擅自将有爭論的案件进行改判（一九五七年二月四日市委在討論法院工作的会上，对其右傾与抗拒市委指示的問題提出了严肅批評，王也始終未作任何檢討，也沒有採取措施）。拒不执行市委的决議，一九五六年彭真同志在市人代会上提出要各单位檢查官僚主义作風問題，市人委根据彭真同志的

指示作了专門佈置，各单位都作了检查，唯王斐然借口工作忙，始終未作检查。

三、反对无产阶級专政，坚持和宣揚旧法观点，歪曲、誣蔑党的方針、政策

1，王然斐大量散佈“无罪推定”“有利被告”等反动論点，叫幹部在实际工作中“大胆参考伪六法”。一九五六年最高法院工作通訊第四期刊登了“无罪推定”的文章，王亲自起草通知各級法院幹部学習“无罪推定論”，並推荐給郭步岳同志，在貫徹全国第三届司法会議精神的大会上說：“审判員一方面审案子，一方面可以作被告的辯护人。”对于“証据”、“坦白”、“前科”等也都要根据有利被告的論点去解释。

2，歪曲誣蔑党的方針政策

一九五六年复查案件期間，王斐然說：“过去提五个方面的敌人，这个概念不科学”，現在这样提更“沒有法律根据”。在复查案件中他把現行的反革命說成是历史反革命，把反革命罪解释成一般刑事罪，把严重罪行認定成一般罪行。在討論人大常委“关于寬大处理和安置城市残余反革命分子的决定”时說：“軍、中統特务分子是反动組織中的一般成員”（即不应当算作反革命分子）。

3，說鎮压反革命太严了

对于处理敌逆产案件，王斐然提出“不与民爭利”。当一九五六年中央决定对反革命犯实行寬一点的精神时，王斐然認为“过去統治的太严了。”他說：“不只鎮反，連別的方面都寬了嘛，老是那样还得了。”

4，攻击人民民主法制

王斐然把法院产生錯案的原因說成是由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他說：“我們办案子，只有框框，沒有格格。”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政法联办討論检查前門区法院案件时，王还在

会上説："概括起来产生錯案的原因有三条：（1）从領导到一般幹部法制观点不强，不依法办事；（2）幹部的法律知識欠缺；（3）法制不完备，所有刑事案件都沒有法律。"

四、依靠、重用旧法人員和其他政治历史上有严重問題的人

王斐然一貫依靠、重用旧法人員和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他在一九四九年接管伪法院时，违背中央和市委的指示，虽然解除了伪推检員的职务，但却留下了一些伪推检以上的人員，以后又陆續从新法学研究院吸收了大批旧司法人員，其中大部分是历史或現行的特务、汉奸、地主恶霸等反革命分子，並且还利用一些私人，也大都是旧法人員。司改后仍未作認真清洗，这些人很多被安置在重要审判崗位和行政崗位上，对他們推崇备至，还讓老幹部和青年学生幹部向他們学習。右派分子余樾，其父是北洋軍閥时代的大理院院长，本人曾任伪推事、检察官多年，旧法观点根深蒂固，王却贊尝余是"老于英雄見好汉。"並积極主张提拔余樾为中級法院刑庭副庭长，並要吸收其入党。

五、組織反党宗派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王斐然与右派分子賀生高之間早在司法改革以前就已互相有意見，司改后，王斐然認为賀生高在司改中对其进行打击，因而对賀生高怀恨在心，遂拉攏右派分子賀战軍和賀生高进行宗派斗爭，双方各自拉攏培植一批私人势力，明爭暗斗，互相排挤。在学習四中全会文件期間，王斐然与賀生高完全与四中全会的自我批評、加强团結的精神背道而馳，互相攻击，进一步分裂党的团結。在学習四中全会文件之后，形成了以王斐然和賀生高为首的两个对立的反党宗派集团，这两个集团在日常工作中，政治运动中进行着反党的宗派活动，这一活动一直到反右派斗爭他們被揭發为右派分子为止。

中共北京市司法局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賀生高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賀生高，男，四十五岁，陝西省清澗县人，貧农出身，貧农成份，一九三四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任县保衛局长、陝甘宁边区保安处副科长、专区保安处副处长、北京东郊分局局长、管訓处处长、北京市法院副院长，現任司法局局长。

肃反运动中，因袒护斗爭重点张思之，阻碍肃反运动，被撤銷五人小組領导职务，后来又継續与张思之进行非組織活动，始終不肯眞誠检討，受党內严重警告处分。整風运动中因将中間分子梁文茜（現为右派分子）叫去参加左派分子会，洩露机密，严重丧失立场，被撤銷整風領导小組职务。

賀生高的主要反党言行：

一、对肃反中的处分不滿，企圖翻案，乘党整風之机，煽風点火

整風开始后，煽动肃反中重点张思之（現是右派分子）說："肃反問題是个重点，其实他（指五人小組王斐然）把結論作出来，承認整錯了，在群众中宣布一下，就把大部分問題解决了。"並說："肃反問題不解决，整風沒办法。""遇到机会你就講，讓群众了解眞象。我現在不能說什么，我要談話，問題就复杂了，你們談，我把它搞成簡报。"在整風鳴放会上，又煽动肃反中被从寬处理的反革命分子郭可宏（右派分子）說："老郭，你在市委（指市委召开的知識分子座談会）說了那么多，为什么現在不說了。"並多次讓郭将攻击法院党內不团結的問題写

成書面材料交給他，以証明肃反是打击报复，当郭可宏和肃反斗爭重点赵威侯、陈建国（都是右派分子）貼出反党大字报后，他又鼓动說："可以自由醞釀，不算自由主义。"並对郭說："現在誰是不是反革命还不清楚嗎？！"当陈建国将潘守謙（反革命分子，现已开除）回机关鳴放情况告訴他后，他說："放吧，放出来就是好事情。"又煽动周奎正（右派分子）說："有問題你揭吧！不管什么都可以揭。"当肃反斗爭重点譚泉（右派分子）問他对肃反有意見怎么提时，他即指示說："就說是对肃反中的一些作法有意見，不是对肃反有意見。"

二、反右斗爭中包庇右派，阻碍运动

反右开始后，司法局党員幹部陈甲在支部会上批評了賀生高，並說周奎正、张思之、譚泉是右派，会后賀即为周撑腰說："你在下次会上揭他（指陈），你的問題我知道，不是什么大問題，你不要怕他，他說別人是右派，問問他是什么派。"在政法学会斗爭右派分子楼邦彦的会上，他同情地說："够啦！够啦！有所检討就行啦。"又对周奎正說："你在批判他們时，找个时机检討一下，自己就脫出来了。"当司法局整風領导小組确定张思之、譚泉为右派时，賀竟两次找刘杰三同志說："你說的話馮（基平同志）相信，你抽工夫亲自找馮說一下，张思之沒什么問題，过去肃反时是王斐然打击报复。"右派分子张思之在被斗爭期間到新华書店偸書被抓获，賀还多方袒护包庇，說张是神經失常。为此张被释放后，写信感謝他，当市委多次找其追問此信时他假装沒收到，向党隐瞞这一反党行为，直至张思之当面对証时，他才不得不承認，但拒不交出信件。

右派分子周奎正在会上揭發了他的反党言行，群众反映朱金涛有問題，他即对朱說："注意周奎正要轉移目标。""反右斗爭你出了不少力，虛心一点，不要在群众里嚷嚷，大家屁股都有屎。"企圖讓朱隐蔽起来。司法局整風領导小組研究朱金涛（右派分子）的反党材料，他百般为之辯护。会議通过之后，他又亲

整風領导小組長楊义同志不在召开非組織会議研究朱的材料，並指定其中一成員給市委打电話的机会，暫时不要批。反右深入时，他說："把能下放的幹部都下放，不要把幹部都弄成右派。"右派分子郭可宏揭發了他。他找郭談話，說郭交代問題有阴謀，並威胁說："你的事我不管，等处理你的时候再說。"

三、攻击党对司法工作的領导，污蔑鎮反政策

他說："咱們的审判員憑空气办事，中央說寬就寬了，說严就严的要命"，"审判員办案随風倒，固然是問題，但主要是放風的（指中央的政策、方針）把風放的太大，放了十二級台風。誰都吃不住，不倒也得倒。"他認为："盲目长判不能怪下面，要找放風的地方。"

他擅自修改张友漁副市长批示的关于处理强姦幼女案件时，同志們批評他，他非但不接受，反說："张友漁又不是金口玉言，为什么不能改。"他又长期不貫徹市委批示的"一九五七年全市司法工作計划和提高案件質量"文件。並說："不是市委批的，是政法部看的。"他还恶毒地攻击历次鎮反运动說："我們遇到运动就要找典型，群众一反映就判罪，找不到点心（典型）就要拿月餅"。

四、賀生高一貫依靠、重用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培植个人的反党势力，进行反党宗派活动。肃反时化装到前門外与斗爭重点张思之訂立攻守同盟，阻挠张思之交代問題。並一再贊揚潘守謙（反革命分子）、张思之、譚泉（都是右派分子）"年青有能力，是法院的精华"。他还对潘、张說："你們的历史問題作不了結論，因为領导上意見不一致，我早就沒意見了。""要不是我，他們（指党組其它成員）早把你們整苦了，他們就是想把你們整成反革命。"张思之、譚泉肃反后政治历史問題尚未作結論，賀即将他們分配到律师协会任法律顧問处副主任。並說："市委政法部沒有同意，我就宣布，还是我这个人大胆"。周奎正（右派分子）历史問題很复杂，賀却把周当作左、右手，並且

先后要提用及郑孟平（右派分子）为司法局办公室副主任。又把肃反中被从宽处理的反革命分子郭可宏留在办公室作秘書工作，並向其示意：“你有历史問題在这兒还容易弄得清，在别处不了解你，可能搞成反革命。”机关肃反五人小組向他提出不应讓郭在办公室作秘書工作，他說：“肃反作結論由你，使用幹部由我。”

賀生高是个严重的个人主义者，一貫目无組織，重用有严重政治历史問題的人，培植个人勢力，进行反党的宗派活动，肃反运动中因袒护斗爭重点张思之进行非組織活动，受党內严重警告处分，又堅不接受处分，並对党不滿。攻击党对司法工作的領导，污蔑鎮反政策，整風期間向肃反斗爭重点煽風点火，指示他們从肃反問題上向党进攻，並出謀划策。反右派期間讓中間分子参加左派分子会，严重的洩露了机密。更严重的是，反右派期間接到右派分子张思之的信，不但不交給組織，在市委的多次追查下，又伪装沒收到向党隐瞞，还百般的包庇右派分子。以上問題說明，賀生高已完全堕落为党內的右派分子，成了党的叛徒。为了严肃党紀，純潔党的組織，支部大会决議开除賀生高党籍。

中共北京市房管局第二支部委員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馬陵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馬陵，曾用名业韶、許智，男，三十八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四一年入党，一九三九年十月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偵察股长、市、县公安局长、南京市公安局保衛处长等职，一九五五年調北京市机关房管局（房建局前身）任副局长。

馬陵的主要錯誤如下：

一、在整風初期，慫恿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一九五七年五月右派分子卜一明大肆誣蔑党独断专横不民主，叫嚣配备录用幹部要实行考試制，攻击三反、肃反是主观猜测和对人格污辱等。馬对这些反动言論不但不駁斥，反在背后对卜說："你的發言不够尖銳，太和風細雨了"，並指使卜将發言內容整理一下，送北京日报。右派分子朱荣傑發表了沒咀的人是好幹部，局內党群之間有墻沟等反动言論，馬贊揚地說："小朱的發言很好"。

二、包庇右派分子。反右斗爭开始后，整風領导小組討論卜一明的右派言行时，馬說："卜的动机不坏，有爱护党的意思，应划卜为左派"。当整風領导小組研究右派分子郭若希（馬陵的爱人）的右派言行时，馬很有情緒並带有气憤的口吻說："对郭的間題，我不發表意見，我要求党組审查我有无洩密的地方"。並要求郭若希当場对質。第二次会上馬向党組質問說："我請問党組，郭若希是不是右派，她的言論是否代表我馬陵？"又說"郭的錯誤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小資产阶級意識"。在整風領导小組已确定郭为右派时，馬向整風办公室要了郭的材料，並在材料上划了很多問号。並告郭說：你發言原記录沒有記着"要領导小組四人下台"，你不要乱承認，当郭被批判时，就在馬划問号的間題上一直要賴。

三、同情和宣揚右派分子华攬洪的謬論。他說："我們建房按人口比例比解放前降低了30%。我們重建不重管，不如英国、日本，他們都有管房大臣。"他又否定一九五六年房建局的工作和总支工作的成績（这一年馬去学習了）說："一九五六年的工作成績是不是主要的，还是缺点是主要的，我有怀疑。"

馬陵的反党行为不是偶然的，早在整風以前他即在房建局拉攏与自己臭味相投的分子，攻击領导同志，破坏党的团結。整風开始后，他認为时机已到，一方面鼓励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一面当他們的真实面目被揭露后，馬又以整風領导小組成員、副

局长身分为他們开脱、辯护，並与郭若希出謀划策，抵制对她的批判和帮助她翻案。由于馬陵披着党員的外衣，並窃据整風領导小組的成員，致使建房局的反右斗爭受到一定的影响。

馬陵堕落为右派是有他的阶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馬的家庭是地主，个人成分是学生，是在日寇侵华后从民族主义的立場参加党的，虽然受到党的長期教育，但沒有自覚地进行自我改造，当他在党的領导下作了一些工作、有了一定成績时，即以此作为爭名夺利向党討价的資本，当党不能滿足其个人慾望时，即对党不滿，並逐漸發展到与党对立，以致堕落到一个可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为了严肅党紀，純潔党的組織，于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召开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馬陵的党籍。

中共北京地質勘探学院委員会对右派分子陈子谷的处分决定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陈子谷，原名陈年裕、陈端坤，男，四十二岁，家庭出身資产阶級，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入党，現任北京地質勘探学院副院長。

一、陈子谷所犯錯誤的主要事实

（一）在大放大鳴时的一系列言行

1、在五月十五日党委召开的講师老助教座談会上，当右派分子尹贊勛和林景陸攻击匯报制度，說"匯报不全面，層層上报轉达不眞实，領导偏听偏信，把匯报者看成第一号好人"时，陈

子谷在会上說："我也有亲身体会，的确如此"；"我在延安沒有入党时也吃过这样的亏，也有人在領导面前說过我的坏話。"又說："肃反斗了誰都不知道，要出佈告叫被斗人来登記。"

2、在五月十八日大系动員会上，当时学院內已貼了大字报，右派开始攻击肃反，污蔑党員，並責駡党委沒有整風决心，当时党委指定他去大系向全体师生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党組織状况、党員脫离群众、反映意見不眞实、党委不团結和肃反問題上說了下面一些話：（一）"我們党組織自下而上都这样渙散，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們下面党团幹部不接近群众，不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見，就是反映意見，也带些个人情緒。"（二）說"党委会意見不一致。"（听了就感到党委內部不团結）（三）关于肃反問題說："現在大家对肃反意見很多，这問題很复杂，要分析研究，有人提意見說陈子谷領导斗爭教員，事实不是这样，当时我在总务处工作，我沒有在肃反五人小組，当时是韓代望他們搞的，后来我作党委書記，連肃反斗爭了誰都不知道，善后工作要党委負責，就由我签字盖章，我曾反映过不了解情况，盖章很困难，后来上級党委决定党委書記盖章，我就盖了。"

3、在五月二十一日普地教研室第二次座談会上，当右派分子王豪、馬万鈞、蔣蔭昌、边兆祥等攻击党委是宗派主义，攻击肃反斗爭沒有根据，并大叫寃枉，号召知識分子要有骨气的时候，陈在会上說："这就說明我們三害严重，特别是宗派主义更严重。……肃反是夏天搞的，当时我是搞总务，以后秋季調到党委会，我自已不清楚到底斗了那些人……我們材料不足就搞，侵犯人权，党中央指示我們的不是这样，我們搞錯了应負完全責任。"对于普地教研室的肃反对象，他全部否定，当面卖好。說吳达文（肃反对象，現尙未作結論，特嫌分子，右派分子）"我和他在一起比較了解，表現很好……怎么斗了？如果我知道，就不会这样做的。"並說："不能說凡从国外回来的都有問題"。說"蔣蔭昌（極右分子）先生怎么会受到批判呢？在斯大林逝世时还表示要

参加民盟"，說："高平（右派）先生被斗我也不知道……"，又說"我們对知識分子的特点估計不足，敌我不清，时代前进了，但思想跟不上"，又說"自己也是个知識分子，是留学日本的，因此很了解知識分子的心情。边先生（極右分子）这样的人，都是沒有什么的好人。"

4、五月二十三日普地教研室第三次座談会上，边兆祥、馬万鈞右派集团反党达到高潮。右派分子杜恒俭說："整風应撤銷我院党委領导，地質学院的人好似生活在魔鬼峽谷中"。右派分子杜冠中說："人事工作一团糟，裙带風盛行，迷信党員"，右派分子馬万鈞說："现在我好象回到了以前和国民党斗爭的时代似的……现在我才了解为什么这次劲兒这么大……将来就会有第二次革命……地質学院搞得烏烟瘴气，一塌糊塗，共产党在地質学院表现为私产党了……肃反中採取望風捕影的作風和国民党沒有两样"等。在右派分子猖狂恶毒地进攻面前，陈在会上却講："完全支持同志們的意見"，認为"是爱护党的"，並且說："肃反时我在总务处，关于吳达文問題的看法，我还受过批評"，他更歪曲事实說："肃反总务处沒有搞几个，只斗了一、二个，其中有一个有些問題，很快作了平反，但是其它单位沒有接受我的意見，显然是违反市委指示的"。还提到"总务处本来也提了很多人要斗爭，当我审查时都删去了"。在当天下午地質类教研室座談会上右派分子曾提出要表揚进攻党最猖狂的極右分子于仙筹时，他在当天晚上座談会上說："于仙筹、赵传珍、李度容……等我本来要提拔，但党委不同意，說我拉攏人"，又說："任湘（党員）比朱志澄（右派）高一級，就是宗派主义"。

5、在五月二十九日第四次座談会上，陈子谷把他朋友的信給極右分子边兆祥等看，並讓边給右派分子传閱，最后边兆祥在会上念了信。大意是："我們（指与陈子谷）是老朋友了，我是肃反中被斗过的，本来这也沒有什么，但那些假积極分子們，今天有的高升了，有的入党了，这到的确使人生气"。陈在会上

說："上次会的情况我是理解的，所以我才讓大家看信"。这封信給王文魁等不少右派分子看过或念过。

6、对王文魁問題：王系中統北平市学生工作組成員，写过黑名单，肃反时已作結論，因按当时条件不够而沒有肯定他是反革命分子，但肯定是参加反动組織，陈是在王的結論上亲笔签过字的。一九五五年陈在給王文魁談話时对王說："你的材料我已經看了，关于你的反动組織关系問題，由于某些原因，他們並沒有吸收你。"整風开始时王文魁想翻案，找尹鳳翔同志談話，对斗爭他不滿。五月二十九日当王文魁看大字报时陈問他"他們（指党委）找你談过嗎？"王接着說"我認为三反沒作結論不能作为斗爭的根据"（尹鳳翔同志是說三反时的历史問題未作結論），陈表示同意。王又說："尹称有一个姓名、籍貫、特征和我一样的人是軍統。这人是否就是沙滩我認識的那个同名同姓的人是軍統？"陈說："可能就是那人"。因而王文魁極为不滿。認为沙滩那个王文魁並不和他同籍貫。陈子谷又把他朋友的信念給王文魁听。

7、六月七日右派分子以溫昌芸事件来攻击党委陷害青年，党委会对溫昌芸問題已作了結論，認为錯誤是由官僚主义造成的，責令有关党員检討，恢复溫昌芸名譽，並已将結論公佈。当日下午右派分子組織了溫昌芸問題辯論会，企圖通过会議作出党委陷害青年的結論，並攻击左派大字报。辯論会的主要組織者，右派分子蔡瑾在六月七日晨看大字报时，問陈子谷对溫昌芸事件的看法，陈說："依我个人看法可能不是一般官僚主义造成的，这是个人不成熟的意見，不要外传"。当蔡瑾說想組織大字报編委会来辯論此問題时，陈表示同意。六月十日蔡瑾感到气候不对又找陈談到溫昌芸事件。蔡瑾說：搞了討論会。陈說"这不要紧，关于溫的問題党委也沒有下結論，粗枝大叶是解释不了的，党委意見有分歧"。

8、陈子谷和右派分子拉关系：陈拉右派分子边兆祥、吳达

文說：建院时和吳、边在一起工作过，我是了解你們的，肃反中我要是知道是不会这样作的。又說我也是华侨，不能說凡从海外回来都要斗。陈在反右期間有一次从校外坐汽車回来，在校門附近見了吳达文赶忙下車，向吳握手問好，說：你的問題很快即将解决，以致安慰之意。陈再三說右派分子邢鳳鳴是个好同志，同意把肃反时的材料退还右派分子丛耀先和邢鳳鳴。陈又說右派分子林墨蔭是思想問題，我了解他，我和他哥哥認識，他不会有問題，一定要王哲民同志承認錯誤，並且亲自道歉，又叫刘光鼎（党員）轉告林好好工作，肃反斗錯了（王哲民曾一再告訴陈不要給林道歉）。陈經常見了極右分子馬万鈞点头握手致意，並在五月二十五日对馬万鈞說："你是搞自然科学的，我想不到你竟有这样高的馬列主义水平，真是很不簡单"。

（二）在反右期間的言行

一、右派分子张忠胤对陈說："过去报載領导幹部提高文化、科技水平，我認为可与体力劳动結合起来，如顧棠起（党总支書記）王健（总支委）現在我系工作，可以下实驗室去扫地……"陈說："我也有这种看法，可是他們不同意"（他們指党委）。

2、在民主党派反右中关于兰仲雄、李世忠、王語今問題。八月党委研究确定兰是右派分子。育英同志和陈子谷二人去市委，市委批示兰是一般右派分子沒有問題，如果"以民盟主委搞联合机构，代替党委領导"一事屬实則是極右。回来后当天晚上陈对盟幹部說："兰仲雄党委不同意扣右派帽子，你們要扣就由你們扣"。后来池际尙、关英又找陈問这句間話的意思陈說："不給兰扣帽子，是党委有意保护兰过关"（事实上党委並无此意）。第二天晚党委会上育英传达市委批示，陈当时說："可能我們二人理解不同。"但党委最后仍認为兰是右派。会后关英又問陈，陈說："看一个人要从一貫表現去看，党委有保护他过关的意思"。兰仲雄的斗爭会共开了四次，陈分工領导民主党派反右，但只参加一次，發言內容只是說"党委那一点对不起

你。"同时，八月二十日市委确定李世忠不是右派。但在这以后的盟幹部会上，陈說："李世忠是右派。"一直到十一月一日召开教职学生代表会議时，有李世忠代表池际尙、关英間肖英同志才知道不是右派。对右派分子王語今。党委常委会两次討論，絕大多数同志均認为王是右派，只因陈子谷不同意而未通过，当第三次会議通过了王語今为右派又經市委批准后，陈子谷事实上不执行党委决定，当时党委由陈子谷負責民主党派工作，陈避而不参加斗爭会，請他也不去，斗爭王語今三次，他一次也沒有参加。

3、"山野"問題。陈子谷以个人名义支持学生会文学社出版的一个名为"山野"的鉛印刊物，並为其創刊号題頌詩。当党委提出这問題应由党委討論决定是否出版时，他大發脾气，認为他已給"山野"写了發刊詩，沒有必要再討論，甚至攻击党委，不知道就是官僚主义。后来党委会决定由陈子谷領导，並决定"山野"出刊不許拿到别的学校去卖，陈在領导"山野"时期，亲自为"山野"向右派分子王語今約稿，刊登在"山野"第三期，並同意"山野"去地質学校銷售。陈在审閲"山野"第四期稿件后同意登載右派分子郭荣光的翻案文章，該班群众聞知此事不同意發表，陈又同意編委提出的将名字涂去，换个笔名發表的意見，結果此文登在"山野"第四期上。整風开始后，党委要求印刷所全部为校刊服务，陈却亲自去印刷所叫排印"山野"，特別在反右期間又亲自指示印刷所限期赶印"山野"，影响了校刊的正常出版（我院印刷力量不足）。

二、对陈子谷所犯錯誤性質的分析

根据以上事实，我們認为陈子谷在右派进攻的緊要关头，为了达到个人主义的野心目的，不惜卖党求饒，有意拉攏右派分子，攻击党委，抬高自己，实际上起了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作用，成为党的叛徒和資产阶級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首先，陈子谷从肃反問題上来向党委进攻。当右派大肆污蔑

肃反时，陈公开向右派投降，根本否認我院肃反的成績，說："斗爭的材料不足，侵犯人权，党中央指示我們不是这样，我們搞錯了，应負完全責任"，"斗爭了誰都不知道，要出佈告叫被斗人登記"，"平反工作不認真"等。对于我院的許多肃反对象他深表同情，为他們喊冤叫屈說："吳达文很好，怎么斗了？如果我知道就不会这样作"，"蔣蔭昌先生怎么会受到批判呢？在斯大林逝世时还表示要参加民盟"等。不仅如此，更阴险的是陈在肃反問題上竭力表白抬高自己，推卸責任，並利用右派进攻，把右派的火力引向党委身上。他歪曲事实說："我沒有参加五人小組，只是签名盖章，当时是韓代望他們搞的"，"总务处沒有搞几个，只斗了一两个，其中有一个有些問題，很快作了平反，但其它单位沒有接受我的意見，显然是违反市委指示"。为了达到他拉攏反党力量的目的，当时只要肃反对象找他，他不分青紅皂白就道歉，如亲自向肃反时只經过批判的托匪外围"死水社"成員，極右分子林墨蔭道歉；向寬大处理的中統北京市学生工作組成員極右分子王文魁道歉；向至今尚未作結論的特嫌分子吳达文道歉。虽然党委再三告訴他这些人沒有斗錯，但他仍在会上会下一味道歉。此外陈並向許多右派分子和肃反对象念他朋友攻击肃反、污蔑积極分子的信，这更說明陈子谷不但否認我院的肃反成績，而且对其它地区肃反成績也同样是否定的。因此，我們認为陈子谷在肃反問題上不只是严重丧失立場，主动向右派投降，而且是有意識的拉攏右派，認敌为友配合和运用右派力量来达到反对党委的目的。

其次，陈子谷在許多原則問題上歪曲事实，顚倒黑白，贊同支持右派的言論，並多次向右派透露党委意見分歧，自己与党委並不一致，是右派分子的知心朋友。如在座談会上当右派进攻匯报制度和积極分子时，陈直接了当地以党員副院长，党委常委的身分起来用亲身經历作証。当右派攻击說宗派主义是全院的主要矛盾，党委認識太差时，他贊同的說自己認为"宗派主义最严

重"，並举例說任湘（党員）比朱志澄（右派）工資高一級就是宗派主义。当右派借温昌芸事件攻击党委陷害青年时，陈迂迴地应合說："不是一般粗枝大叶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並且造謠說："党委內部意見不一致，有人要說粗枝大叶"，实际上党委对此問題已作了否定的結論並出了公告。当右派分子要表揚極右分子于仙箬对党的攻击时，陈竟无耻的捏造事实，以討好右派說："于仙箬等我原想提拔，党委說我拉攏人"右派分子攻击党委外行，水平低，不了解知識分子特点，陈就說"我們对知識分子估計不足，因而敌我不分"並一再在普地教研室座談会上及对个人来訪者表明自己是高級知識分子，能体会知識分子的心情，自己也曾留学日本。因此我們認为陈子谷在以上这些原則問題上，也是严重地丧失立場，成为右派的应声虫，明确表示了要作右派分子的强烈願望。同时也表示了只有他才了解"知識分子"心情，一貫正确，言下之意，只有他才能領导学校，党委不能領导，以攻击党委，达到其个人野心的目的。

陈子谷有意和右派分子拉关系，組織力量，与党委分庭抗礼。給很多右派分子以安慰，支持，經常拉拉扯扯，重私人关系。如陈子谷因認識極右分子林墨蔭的哥哥，便認为：林墨蔭肃反被批判是錯了，林就沒有問題了。右派分子邢鳳鳴經常吹捧他，他便認为邢是好同志，並埋怨团委学生会为什么不用他，为什么"斗爭"他(实际上肃反並未斗爭只是找他談一次話)，直到反右期間陈在負責民主党派反右工作中，拒不执行党委和市委的决定，根据个人好恶任意認敌为友，認友为敌，拉攏自己所好的一些"民主人士"，用資产阶級的私人关系来处理严肃的政治斗爭。陈領导"山野"是向党委的示威，把"山野"作为个人的独立王国，通过"山野"，組織自己的力量，与党委分庭抗礼。"山野"的成立，人員配备，約稿对象的确定等均不經过党团組織，独自一套，其宣传內容更与党委中心任务无关，反右时期，"山野"出版的第三、四期，沒有一篇反右文章，但却有陈子谷特約

的右派分子王語今的“告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郭棠光的翻案小說，“山野”的編輯对党委宣传部的同志更是側目而視。很清楚，陈子谷已經發展到在組織上向党鬧独立，自成一套，在严重的阶級斗爭中，削弱党的战斗力。

根据以上分析，我們認为陈子谷在肃反問題上，和其它一系列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上以及組織原則上明显地站在資产阶級右派立場，为了个人名誉、地位，爭权夺势不惜在党遭到攻击的时候，出卖党的利益，向右派投降，並拉攏引导右派向党委攻击成为右派在党內的代理人，堕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

陈子谷堕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並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陈出身于資产阶級，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立場並沒有得到根本改造，全国胜利后更滋長了極其严重的驕傲自滿，功臣自居的思想。一九五一年三反时，党曾批判了他“爭名誉地位，不尊重組織，不能很好服从組織决議”，但三反后，陈到处表示对其批判不滿。一九五二年来地質学院后，严重的居功自傲，鬧名誉地位繼續發展，以致爭夺权力，一貫打击报复，制造不团結，破坏党內正常生活。从一九五二年担任临时支部書記起就拉曹添（宣委）攻馬杏垣（組委），对曹添說“馬杏垣世故深，修养差，你不要跟馬走”。以后不断地在党內鬧关系問題，如刘型（院長、党委書記），肖英（副院長、党委副書記），韓代望（党委副書記），丰原（副教务長、党委常委），尹鳳翔（党委副書記）等。陈在任党委書記时，集中力量攻击刘型同志，同时又攻击肖英同志。无中生有地說因工作关系和肖英同志接触較多的总支書記是和肖英同志在搞宗派，並找人談話动員給肖英同志提意見。党代会后，陈因未被选为党委副書記而不滿，与党委对立，拒不执行党委决議，經常鬧“副院長和副書記誰領导誰”。对其它的党委委員經常散佈流言蜚語，进行攻击。党委会議經常不到或迟到，对于以上錯誤党委对他进行了多次耐心的批評教育，但他不仅毫不悔改，並且对党委怀恨在心，一直發展到

大鳴大放，右派向党进攻时，陈子谷灵魂深处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丑恶面目就暴露出来，因而墮落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

三、本人态度

經过四次党委扩大会議揭發事实后，陈子谷对重要事实均加否認，只承認思想意識和組織紀律有問題，为此，党委又召开对証会，在沒有拿出事实根据前，他矢口否認事实；当摆出証据后，他推說記不清了，或狡辯說他的出發点不是如此。直到市委正式批准为右派分子后，他仍然对自已的錯誤性質認識不足。

四、处理意見

根据以上分析，陈子谷屬于一般右派，所以应按右派分子处理。他至今仍不認識錯誤，在事实面前狡賴，由此应按中央关于处理国家薪給人員右派分子的規定第四条处理。撤消一切职务，分配較低工作，按政府幹部十七級待遇。党內开除党籍。

中共山西省委
关于开除高沐鴻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

高沐鴻，男，現年五十八岁，山西省武乡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一九三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爭以前曾任高小教員。抗战期間曾任县长，“黃河日报”主編，太行区文联主任。一九四九年全省解放后，历任山西省文联主任、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一

当一九五七年夏季我党發动整風之后，高沐鴻和党外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相呼应，趁机向党展开了猖狂进攻。他假借反对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文艺上的公式主义，發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他这种背叛党的立場，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給党、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招致了严重損失。高沐鴻的这种背叛行为，是我国当前无产阶級同資产阶級、社会主义道路同資本主义道路的斗爭在党內的反映。在这場斗爭中，高沐鴻在政治上已經堕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对高沐鴻这种背叛行为的揭露和斗爭的胜利，不仅純潔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团結，而且大大提高了党員的阶級覚悟。

二

自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爭鳴”政策至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爭的这一短暫的时期內，高沐鴻曾經写了“一切为了提高一步”，“从魯迅先生想到”，“追根”，“几个問題的我見”，“故乡春吟”，“艺术上的典型与真人真事”等八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对当前的現实生活，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以及党的文艺方針路綫，进行了悪意的曲解和誹謗。这是他的反动世界观和資产阶級个人主义的总暴露。高沐鴻向来以“独立思考”相标榜，“不說別人說过的話”，“不走別人走过的路”。然而当他决心反党的时候，却与資产阶級右派分子自然而然地同流合污起来，拾取右派分子的余唾和牙慧，向党發动了进攻。

高沐鴻和一切右派分子一样，他向党的进攻首先是对准了党的思想战綫。他憑靠着个人仅有的一点資本——二十三年党齡的“老資格”，以一个“追求真理”的“正直”的老共产党員身分出現，来进行煽風点火，

高沐鴻在他所写的文章中，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系統地曲解和誹謗馬克思列宁主义。他認为在我国教条主义已經“形成了一种社会势力”，“重重地压在人們的头上，使得人們思想不能自由呼吸”。“教条主义已經几乎搶占了思想界的統治地位”，因此，人們只好“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只好“言論它之言論，行动它之行动，修养它之修养”。他在分析教条主义的根源时，竟認为教条主义产生于权威，根植于“一种統治势力”，“当反动势力居于压倒优势的时候，教条主义的發生，乃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反动势力去服务的；在革命势力占压倒优势的今天，教条主义的發生，則又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革命势力去服务的。这就是它的規律”。很显然，高沐鴻的痛斥教条主义，目的在于反对占压倒优势的革命势力。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提出反問：“教条主义从何而来”。他自己認为“这却是一个尙未加以追求解决的問題”。所以他說：“在某种情况下，教条主义是无罪而有功的，而反对教条主义倒是无功而有罪的”，“你敢触犯这些商标嗎？你就得小心你的脑袋！小心‘軍法从事’！这些清規戒律，实际上有时竟变成了森严的‘軍法’——原来就是教条主义！”从而他得出結論：“为保障革命的正义（这里所說的革命正义应該是括号內的革命正义），而来剷掉这个表面上向革命献媚的家伙，实質上蛀蝕了革命的蟊贼！”必須“打倒教条主义！打倒教条主义的权威！”

看啊！高沐鴻的面孔多么兇恶！原来是要以資产阶級勇士的姿态来打倒馬列主义了。他在“追根”一文中說：“教条主义的信徒們，毛病就在于无所思考，不肯思考，尤其不敢思考。在思想領域里完全沒有个自己。”按照他的邏輯，思想領域里大公无私，完全沒有自己的人，就是教条主义，就是要打倒的对象。而他所讚揚的自然就是那些在思想領域里充滿了个人主义的信徒們了。这是十分明白清楚的招供。

高沐鴻在“故乡春吟”的長詩中，把农村幹部当作“教条主

义者”作了極其丑恶的形象的描繪，他認为凡是根据党的政策方針办事的人，都是教条主义。他写道：“蛤蟆你不往水里跳，为什么站在岸上学人吹喇叭？老鼠你不往洞里鑽，为什么作模作态学人样？”在高沐鴻的笔下，农村幹部竟成为蛤蟆和老鼠，其用心之恶毒可想而知了。

高沐鴻在他所写的文章中，对于党提出的克服官僚主义問題，首先下了結論，認为这是“有点贼喊捉贼的形态”。在他的笔底下，把我們的国家机关和幹部，描繪得比国民党还更加可怕。他說：“不知民間疾苦，首先就是官僚主义！認定自己的生活理应比人民高出若干倍，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完全服貼于这一观点，从而淡忘了和人民同甘共苦是宝貴传統，这就是官僚主义！反对人們反对这种官僚主义，我以为就是最大的官僚主义！”誰曾反对过人們反对这种官僚主义呢？这不是極其恶毒的造謠誹謗嗎？事实是他把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幹部形容为一群为了“升官發财”，“无穷富貴”，“吃喝玩乐”的剝削者，这种恶毒的歪曲現实，是多么阴險的挑撥！

高沐鴻对宗派主义的理解是更为荒謬和反动的。在他看来，“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政策，是只准“放”，不准“爭”。如果对于放出来的“牢騷和偏激”，“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不正确的东西”，根据社会主义原則加以批判，那就“明白是一种宗派主义在作祟”，“这将会限制人們‘放’和‘鳴’的积極性，而使大家停步不前。”这就是說“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不必遵循什么原則，不必要什么标准，不要批判資产阶級思想，这分明是为資产阶級辯护和效劳！

高沐鴻在文艺路綫問題上，也是和党存在着根本分歧的。他坚持反动的資产阶級文艺路綫，反对党的文艺路綫。党从来認为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級事业的一个組成部分。社会主义的文艺必須接受共产党領导，必須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現实主义的創作方法其所以是最好的創作方法，首先是因为这种

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相联系的。因此，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就应該为工农兵服务，应該学習馬克思列宁主义，应該同群众結合。然而高沐鴻却千方百計地反对这条路綫，甚至不惜採用謾罵、誹謗手段。他在談到工农兵方向的时候，明目张胆地写道：有人"担心一个党員作家有时会忘掉了这个方向……为什么他們不去担心过去宣传'工农兵'方向以致于造成体裁与形式不够多样化呢？难道这种担心已經不必要了嗎？我看未必。掩护在一句已經确立的口号之下，不去理解'百花齐放'的新意义，这乃是宗派主义思想情緒在作祟呀！"看！他污蔑毛主席倡导的工农兵文艺方向是宗派主义。他說工农兵文艺方向限制了人們的积極性，扼杀了人們的"独立思考精神"。說我們的創作不自由，死气沉沉，沒有生气，对生活不敢进行大胆干預，因而只好閹割生活中的一切矛盾。种种謬論，不一而足。他妄称党的文艺不敢尖銳地批評与有力地諷刺現实，是由于死抱着"无缺点論"，"无冲突論"的尾巴的結果！高沐鴻認为艺术家不来批評社会上一种概括的典型的錯誤和缺点，那就是要求艺术良心同这种錯誤和缺点和平共居，那就是要閹割艺术的天职，使艺术家停笔。这一連串的无中生有的誹謗，无非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綫。高沐鴻从来也不提文艺的党性、阶級性，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必須接受党的領导，文艺家必須学習馬列主义，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等等問題。相反的他却热衷于"独立思考"，"創作自由"，"揭發黑暗"，"自由市場"，"艺术良心"，"艺术天职"，"自由平等"等一套資产阶級的东西。

高沐鴻不仅在思想上言論上反对党的文艺方針路綫，而且他选择时机，認真地行动起来了。一九五七年二月，"火花"編輯部退回他的反动詩稿"故乡春吟"，他竟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威胁編輯部說要辞去"火花"編委职务。他看了省文联副主任姚青苗（非党員）的反动文章之后，給姚青苗写信說："咱們携起手来，一同前进"！姚青苗自受到高沐鴻的鼓励后，反党反

社会主义的文章接二连三地發表出来。姚青苗在报紙上提出“开辟文化自由市場”的要求之后，高沐鴻利用副部长的地位，立即响应組織“詩社”，准备出版刊物。他对于以省文化局主办的“文化周刊”編輯任一的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活动也頗感兴趣。他支持任一的提出办“同人刊物”的要求。高沐鴻身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資产阶級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不但不保衛党的利益，反而和右派分子站到一个立場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質，于此暴露无遺了。

三

高沐鴻的反党思想，是有其阶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受了資产阶級的教育。入党以来，虽經党的长期教育，並沒有在思想上得到“脫胎換骨”的徹底改造。在他的灵魂深处，仍然是地主阶級士大夫思想占主导地位。无論对組織对同志均以“硬骨头”自居，目无組織，唯我独尊，傲骨磷磷，驕横不遜。总是感覚党对他是一种莫大的約束。在一九四四年整風期間，他曾提出过“还党清白，还我自由”。並且写道：“如果感覚不到共产主义入骨浴髓的快感精神，則我无宁再保持历史上的那个伟大崇高的个人理想主义；保持这份历史遺产，仍为有用之物，可以无敌于天下……”“不能不为自己的私人利益打算一点，以便找得生活支柱，再則，干脆为人民服务，有失元神，絕非我这精神衰老之人可以担受！”“我的整風整了个什么結果呢？滿可以自招自認，也曾千瘢万痣的找得根源，都开出葯方，只是体弱吃不得苦葯而已……如果党不諒解，我也任其不諒解存在”。这是高沐鴻十五年前的自白。从这些自白当中，可以看出一个堅持反动立場，坚决抵抗思想改造的个人主义者的面孔。而到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的期間，在治陶会議进行整党的过程中，他又曾說过：“难道我連做一个光荣的小資产阶級的权利都沒有了嗎”？就是这样，他的所謂“伟大崇高的个人理想主义”却成

了包庇地主的代名詞。因此他曾經受到党的当众警告处分。从此之后，他一直是心情阴暗，落落寡合，对党採取了对抗的态度。由于他这种極端个人主义思想和反动的阶級立場長期未得到改造，因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堕落为資产阶級右派分子是必然的。

四

对于高沐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的指示，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初起，曾經召集有关单位党的負責同志，先后举行了五次会議，揭發、批判了他的反党言行，並帮助他进行检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党的全省代表大会上，对高沐鴻又进行了批判斗爭。省委的負責同志亦曾多次与他談話，帮助他認識他所犯錯誤的严重性。在此期間，他曾作过四次检查，並声言接受大家的帮助，决心悔罪。但是在检討以后，却又推翻了自己的检查。根据揭發的材料証明，高沐鴻曾表示："我那敢反党反社会主义？""現在我新的东西沒有建立，旧的东西也沒有了，这不是什么也沒有了嗎？"可見他的检討是完全虛伪的。因此四月中旬，在省委第九次全体委員（扩大）会議上，对高沐鴻的問題又作了討論，一致認为高沐鴻是党內的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为純潔党的队伍，維护党的紀律，决定开除其党籍。並建議有关方面撤消他的省人民委員会委員的职务和省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資格。行政級别由十級降到十三級，另行分配工作。

从高沐鴻堕落为右派分子的事实中証明，一个共产党員如果不徹底改造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沒有真正地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来，无論他有多么長的革命历史，最終都有可能堕落为反党分子，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个人主义就愈将无容身之地，全党同志应該吸取教訓，尤其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应該响应党的号召，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加强鍛鍊，加强学習，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級的思想意識，使自己成为又紅又专的共产主义的革命战士。

中共山西省交通厅机关支部委员会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李景良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李景良，男，現年四十五岁，辽宁省昌圖县八面城人，家庭出身城市貧民，本人成分軍人，一九三七年二月参加工作，一九三七年六月入党。曾任晋豫边游击队大队长，参謀长，太行四、五分区参謀长、情报处长，山西省人民政府秘書厅秘書主任、山西省交通局秘書主任、副局长等职，現任交通厅副厅长，党組副書記。

李景良一貫进行反党反領导活动，挑拨离間，拉攏对党不滿的分子、受过处分的分子和个人主义严重的分子，特別是与胥德林、张水林、郭进田等人，长期互相勾結，攻击党的肃反政策及其他各項重要政策，破坏党的团結，打击报复同志，企圖从根本上推翻交通厅党的正确領导，实現他可耻的目的——篡夺交通厅的党政領导，建立独立王国，进一步反党反領导。

一、攻击党对他的审查。当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及波匈事件前后，他即攻击党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对他的审查，攻击当时党的領导人李达、冷楚等同志，向省委工业部大鳴大放，五次上書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說：“我要求必須补偿我这四年多的待遇，不能补，必須拿出充足理由。我不能承認住了四、五年监獄，結果沒問題，而不承認是弄錯了。”“整風中所以胡說，也是环境逼迫的……，”並在交通厅各种会議上向幹部散布說：“我有情緒，是因为工业部給我結論上写成‘特务根据不足’所致”。

二、一九五七年他又利用整風、鳴放的机会和其他右派分子

里应外合，向党發起了猖狂的进攻。攻击党的棉布供应和招生政策說：“过去动員男人穿花花布，进行服装展覽，布票不够还可以补發，听說今年后半年布票要对折，这簡直是‘抽風’”；“去年（指一九五六年）动員許多人考大学，今年又說招的多了，連高中畢业生也不能升学，这叫幹啥”。說什么“厅有厅长，党有書記，我受过审查，我还有意見，我沒顧虑”；“我知道省委也不相信我，賺徙这十二級”。在他主持的鳴放座談会議上誘导座談对象說：“三反、肃反問題都可以提”；“你們尽量提吧！章伯鈞还有錯誤言論，我們都是他的部下……”；“你們不要光給小和尚提，也要給老和尚提意見”。在几次座談会上右派分子都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而李景良在每一次座談会結束时，特別是在人民日报“六八”社論發表以后，全国已經开始反击右派的时候，都总是說，“大家意見提的很好，扯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上去，請繼續大胆地提，說錯了不負責任”。他还在总結反右派斗爭大会上給右派分子撑腰並重新發起进攻說：“有人說搞两个通訊社不对，我看只要需要，搞三个通訊社有什么不可以”。

三、拉攏煽动各种坏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最突出的表現在对党的肃反、审幹等政策上，如对张水林問題，他和胥德林、郭进田、张水林一样認为肃反中处理张水林是党組書記王振德同志对张水林进行打击报复，因而在张水林释放后，他即向张水林道歉說：你的問題我原来不了解，运动还能不冤枉人？一直为张水林鳴不平，並想方設法讓张水林任副处长和做机务处政治思想領导工作。不仅如此，还想方設法要赶走党組書記王振德同志。王振德同志調住高級党校学習后，李景良便企圖通过合法手續免去王振德同志党組書記职务，任命他自己为党組書記。因王系在职学習，未獲批准，未达目的后，即攻击和威胁省委。

四、利用职权打击报复。由于他恶毒地猖狂地向党进攻后，生怕同志們揭露他，于是誰給他提意見他就打击报复誰。如李正一

同志在划李景良为左派时（李景良不在場），有过不同意的表示，别人在会后告他“李正一要划你右派”，他便于去年九月十二日發动了对李正一的斗爭。企圖轉移斗爭目标，妄圖将李正一一棍子打死，掩盖他的罪恶。

五、李景良自一九四三年受到党的审查后，对党引起了刻骨的仇恨，对革命心灰意冷，在此思想基础上拟出了：“健康、要好、积蓄、建家。不焦思，心静口紧”的“座右銘”。几年来念念不忘地在施行着。不仅如此，在政治生活中，对党的会議，政治报告不願参加，不看党刊，不买政治学習書籍，飽食終日，无所思事，革命意志衰退，人生观腐朽透頂。

总之，李景良是带着極端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走进党內的，企圖在党內發展自己。当党的事业要求他必須服从党的利益时，他却口口声声强調他和党存在着矛盾。在政治立場上、思想感情上，公开与党决裂。为了达到他反动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竟不惜利用一切机会，勾結一切坏分子，对党不滿的分子，在审幹、肃反、整風、反右派斗爭等重大政策上，猖狂地向党进攻，以至堕落为右派反党集团的头子。

为了純潔党的队伍，严肃党紀，經支部大会討論一致通过，决定清除李景良出党。並建議行政上給以撤职、监督劳动的处分。

中共山西省
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厅支部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韓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韓林，女，現年三十八岁，山西省平定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現任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长、党組成員、省党代表大会代表、省直总党委监察委員会委員、省妇联常委委員。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和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互相呼应，攻击无产阶級专政和党的各項重大政策。当右派分子儲安平的"党天下"謬論發表后，韓林就积極响应。她曾在省妇联代表会議上說："儲安平說国务院十二个副总理沒有民主人士，我們妇联是統战組織，更应該有民主人士当主席。"当时即有人反駁她的这种謬論，但她仍然坚持。最近检查时，說她当时認为，沒有民主人士就是"宗派主义"，实际上就是"党天下"。对社会鎮反，她說："一九五五年敌情並不严重，錯案比例很大，是否把人民內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了？"对机关肃反，她說："你們說机关肃反成績是主要的，为什么斗了四个，就錯了三个，只抓住一个？"否定鎮反、肃反的必要性，在无产阶級专政問題上向党进攻。此外，她对党的統購統銷政策、賠买政策、下放幹部政策，也均进行了攻击。

（二）包庇縱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她的弟弟

韓彬，是一个汉奸，曾到日本受过訓，日本投降后又到了国民党軍队里，一九四九年从綏远跑到长治找她，她介紹韓彬投考长治工业学校（未往），太原解放后，她又把韓彬介紹来太原山西公学，畢业后混入太原市公安局（不久逃跑，現在石家庄邮电局工作）。韓林对她弟弟的这些政治情况一直未向組織交代。反革命分子、一貫道点传师张改鳳，在一九五零年鎮反运动中，改名換姓潛逃来太原隐藏在韓林家当保姆达五年之久，一九五二年省妇联黎顯同志發現自己用的保姆是一貫道徒时（与韓林保姆张改鳳是同乡，並有来往关系），曾向韓林建議对张改鳳进行审査，但她毫不理睬，並且还給张犯的兒子（系一貫道徒）介紹了工作。一九五五年鎮反运动中，张犯被揭露之后，她仍設法对张犯进行袒护，她竟亲自領张犯到公安机关进行所謂“坦白登記”。张犯被交回原籍太谷处理时，还讓张犯带走她的一个孩子，並先后給张犯所在村的幹部写信三次，以省法院的名义給太谷公安局写信一次，表示对张犯生活的关心和負責，起到減輕张犯罪責的作用（只判管制三年）。张犯被管制后，还来过韓林家四次，領导發觉后对她提出批評时，她还对抗說：“这是人情”。曾先后贈送张犯人民幣七十余元，同时又伸手向国家要求救济七十元。更恶劣的是，韓林把张犯被管制，說是打乱了她的家庭，使她不能安心工作和学習，对党和政府抱了極大不滿。她的另一个保姆柳淑貞（坏分子），曾进行偷盗、流氓、投机倒把、挑拨是非等违法活动，在全民整風中幹部家屬及群众对她揭發出很多問題，大家公認柳淑貞是坏分子，而韓林不相信党和群众，並对領导街道整風的幹部說：“群众揭發的問題不确实，某家屬对柳提意見是报复，柳淑貞是有缺点錯誤的好人，不是坏分子。”对柳进行包庇袒护。公安机关确定柳淑貞为坏分子带去集訓后，韓林曾因此气得病在床上。反右派斗爭中，机关右派分子吳輔国态度蛮横，不低头認罪。由于韓林和吳輔国在發表右派言論上有共同之处，她不是支持群众向右派斗爭，反而指責大家：“斗爭过火”。並且

还說什么："吳輔国在肃反中被錯斗还能沒有些情緒，不然把你們斗爭一下，看你們有沒有情緒"。阻挠反右派斗爭。由于她站的是敌人的立場，在处理案件上曾为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开脫罪責。如对罪行極为严重，非杀不可的現行反革命犯晋全銘，改为无期徒刑。对詐騙国家公款三千三百元巨額而又无理取鬧的罪犯左斌，竟以民事債务糾紛，改判释放。

（三）抗拒和反对党的領导。韓林不仅在各項政策上反对党的領导，而且对省委和省政法党組的領导也是很不尊重的，並且有过抗拒和反对的行为。如省委指示检察院、法院、司法厅三个机关合灶，她採取了抵抗的态度。肃反期間，她是机关五人小組成員，省委通知开会，她抗拒不去。黃石山同志由省委开会回来，要开会进行传达，派人两次去叫，她不来，第三次叫来之后，在会上大哭大鬧，使会議无法进行。黃石山同志对她提出严格批評后，她不但不接受，反而还誣賴說："党对我不信任"。对政法党組的决定，她可以任意不执行。如賀振国与周治田爭执小孩案，在政法党組作出处理决定之后，她不但不执行，反而一味偏袒賀振国，助长賀振国、崔文芳夫妇无理取鬧。

此外，她还在幹部中經常散布流言蜚語，攻击領导，破坏团結，其情节也是非常恶劣的。

二、斗爭中的态度

韓林对其以上罪恶事实，長期以来不主动向党交代，領导指出以后，才进行检查。在检查中間，开始检查不深刻，避重就輕。在斗爭深入，經大家多次批判斗爭后，虽然初步低头認罪，承認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問題，但内心仍幻想按内部問題处理，因此，在宣布她为右派分子以后，曾一度公开向領导及群众对抗，态度極为蛮横。領导为了帮助她認識錯誤，叫她談話，她竟对抗說："你們是共产党員，我是右派，沒有什么可談，該杀就杀，該关就关，要槍斃就槍斃，浪費一粒子彈，有話現在不說，

可能得了神精病再說，或者带进棺材里也不說……”並說：“我还要綉上‘右派分子韓林’六个大字带在身上，我还覚的很光荣”等等。后在大会上作第五次检查时，同志們批判她检查不深刻，她又对抗說：“嫌我检查的不好，我就收回来。”但不久又有悔悟，承認了錯誤，表示願意检查。最后在領导和同志們的帮助下，作了比較诚恳的检查，認識了罪恶。

根据她的以上錯誤事实，充分証明韓林已堕落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为純潔党的組織，严肃党的紀律，經支部大会討論决定，开除右派分子韓林的党籍。

中共陕西省衛生厅支部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月明党籍的决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王月明，男，現年四十六岁，陕西淸澗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革命職員，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五年加入党，曾任县委書記、地委組織部长、地委副書記等职。現任陕西省衛生厅副厅长、党組委員、衛生厅机关分党委書記等职。

一、主要反党言行

（1）誣蔑和辱罵省委，不断地向党进行“政治爆炸”。

王月明为了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卑鄙目的，企圖借前厅长陈純炳同志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錯誤，通过一九五六年八月間衛生厅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議来斗垮陈純炳並撤换一批直属单位的負責人，以树立他个人威信。后因未能实現其企圖，王就气势凶凶地跑到省委，当着李書記的面恶毒地攻击省委。他辱罵“書記

处是老爷班子”、“省委是蜕化了的省委，是堕落的省委”、“他娘的是什么省委”、“我怀疑到底是共产党的省委还是国民党的省委”，还說：“考虑你們这些出席“八大”的代表是否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还說：“我願意牺牲个人換取省委对衛生工作的重視”等等。

一九五六年九月間，又对李書記說：“我看为革命負責的人，不一定是官高职显的人，我看在困难的問題上，誰都負責，誰都不負責。省医院的問題，我看書記說句話，由赵部长就可以解决了。”同年十月十八日上午，王月明又在李書記召开批評他的一次会議上誣蔑和中伤省委及省委領导同志，並歪曲省委的政治生活，他說：“省医院的問題长期不能解决，是書記不讓部长解决，有人說是高枫对省委一些主要領导同志献殷勤的結果”。並說：“就是将高枫换了，对于你們几个負責人看病，也不会不方便嘛”。又說：“将市衛生局局长中調一个人到衛生厅作副厅长的意見，由于省委个别負責同志不同意，就未实行。究竟省委是集体領导，还是根据个别人的意見？不根据工作需要办事，我怀疑省委的政治生活是否有不健康的成分”。他說“省委对陈純炳的态度，我有很多意見，省委包庇陈純炳”（省委对陈的問題已作过处理）。会后王月明又給张华莘同志轉李書記的一封信上說：“省委要包庇陈純炳到底”等等。

到一九五七年六月正当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王月明的态度也是非常恶劣的。如当姚尔明放出反党言論后，王对其談話时还說：“你們医院鳴放还健康，你鳴的也好”。以后在研究斗爭姚尔明时又說：“姚尔明不好是高枫压制民主和宗派主义造成的，姚尔明的思想代表着衛生厅一部分幹部的思想，姚尔明不能斗爭，要斗爭就要脫离群众。”同时，当省产校校长张鋁重同志請示王月明如何处理学生鬧事問題时，王不但未予协助，反說：“党內人心不齐，鬧事是必然的”。当二衛校学生出現鬧事現象，衛生厅党組要他去解决这个問題，他亦不去。

当大鳴大放时期，王月明在李經綸同志面前更露骨的誣蔑說："我看党內沒有眞理，老实說我曾一度想退党"；又說："省委書記还不好当嗎，我看只要会批評人就行了"。

一九五八年元月二日晚，衛生厅党組召开扩大会議（张华莘、刘显曾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議）研究王月明的检討提綱时，与会同志一致認为他的检討不深刻，提了一些意見和批評，王不但不虛心考慮，反而粗暴无理，又一次向党攻击，他說："我認为自己沒有了不起的錯誤，我認为几年来的工作还是努力的。因之，要自己检討好，还是有困难的"；"这几年总是我对省委为什么不滿？誰晓得"。又說"一九五六年衛生厅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議，我看到根本开不好，不如給省委来个'政治爆炸'（指辱罵省委那一次）"，"我有反党思想，为什么反党，不是为个人利益，还是为了陕西省一千七百万人民的衛生事业"。同时，在会議上他要求张华莘、刘显曾同志不要他作自我检查，还說："因有反党思想，不好检查，組織上作个結論，該撤职查办，开除党籍，由組織决定；如要检查，由党組研究，我照本宣讀一下。过去我鳴放的不少了，要定右派也可以，党內沒有眞理"。並且說："对陈純炳迁就，我不知省委是什么原因"，"我要省委检查衛生厅工作，始終不检查，是对衛生厅放棄領导"。

（2）經常散布反对省委的謬論，在他的反党思想影响下，衛生系統形成一股对党不滿情緒。

王月明恶毒的誣蔑："省委很不重視衛生工作，从衛生厅工作上似乎感觉不到党的領导。省委的領导有严重的官僚主义，省委的負責同志，也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並說："省委对困难問題誰都不願意沾，对党的事业不負責任"；王还不止一次地說："几年来我得到的經驗是要斗爭，共产党內不斗爭不行。"

王月明也不放过任何可以向別人散布对省委不滿的机会，如省委負責同志帶病下乡，需要帶个医生，王月明就向人說："省委就是特殊，到那里沒有衛生院、衛生所，下乡还要帶医生"；

在一次党組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衛生系統某些幹部提拔得不适当时，王反說：“省委提拔王荣、江云都合适嗎？作过地委書記的还沒当上省委的部长”。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王月明在护士座談会上，擅自宣布护理員可以直接晋为护士，曾造成了下边的工作混乱，結果王月明又把責任推給省委，說“省委不批，我有啥办法？”

为了反对省委，破坏党的团結，王月明不惜玩弄两面派手法。如一九五五年陈純炳的鑑定，其中尽是优点（是陈自己主持厅务会作的），省委察覚后指示王月明应給陈另作鑑定，並曾多次督促，直至現在陈的鑑定还未作，而王月明却常說：“省委包庇陈純炳”。一九五七年陈純炳調离陕西时，要两个書箱，衛生厅已买了两个箱子，事后却又請示省委文教部，文教部意見：由衛生厅研究决定；鳴放中群众批評此事时，王月明却說：“陈純炳买箱子，带护送人員是省委张、刘部长同意，李書記批准的”。

一九五六年工資改革时，王月明以个人名义，向省委提出要将陈純炳的工資級别由九級晋至八級；王季陶由十一級晋至八級；楊在泉由十一級晋至九級，后因未批准，王就对这三个人說：“你們的級别，我已向省委提了意見，省委不批”。

在王月明的反党思想影响下，一些幹部的錯誤思想有了滋长。如有的誣蔑省医院高枫同志是“溜省委的尻子”，因而一九五六年發生了衛生厅医防处三个科員在科长王活同意下联名誣告高枫的事件，誣告材料是經过王月明审閱同意后發出的。后經查証，並无事实根据，系捏造中伤幹部。高枫曾三次要求王月明亲自处理这个問題，王竟答复說：“你的問題厅里解决不了，你請省委解决吧”。

王月明不但自己散布反对党的謬論，他对于别人放出的对党不滿或誣蔑的言論，都表示支持。一九五七年六月王参加省医院的鳴放座談会，听到了誣蔑省委的謬論，他当即指示王子績（省医院办公室副主任，党員），将这些謬論整理后报給他。一九五七年冬，赵書記曾去信讓衛生厅考虑，为照顧一幹部的爱人关

系，将其未婚妻分配在西安附近工作，而幹教处副处长王秀士却多次說："省委破坏了幹部制度"，这种錯誤說法曾在党內进行过批評糾正，王月明也是知道的，但当王秀士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整風会議上又說："省委破坏了幹部管理制度"时，王月明却立即插話問："是誰，名字都可以講出来"，王秀士接着說："是省委赵伯平書記"，总之，王月明認为一有机会，就散布反党情緒和言論。

（3）王月明主管衛生厅的人事工作，在提拔使用幹部上敌我不分，丧失立場，使幹部工作異常混乱。

据目前查証，在衛生厅及直屬单位的人事幹部和重要部門中，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騙子、政治历史不清及有严重思想問題的就有十余人。如刘玉田是一个伪造历史的政治騙子，一九五七年却派至省地方病防治所任人事幹事（最近才处理）。薛忠信曾是个伪警察，讓担任省精神病院人事幹事，薛曾利用职权，借調动工作之际，伪造其爱人級别（最近才撤换）。袁国华是历史尚未弄清，据检举系三青团分队长，一九五七年發現有三青团問題后，仍提拔为衛生厅幹教处副处长。陈宝生思想意識很坏，一九五六年王月明在通远坊疗养院检查工作时，提拔为該院人事科副科长。任建貴历史上脫过党，解放后品質恶劣，道德敗坏，曾被清洗出党。而后又从教育厅要来担任省中医进修学校政治教員。賀普安因严重的不負責任，在工作中發生多起医疗事故，曾被管制两年，期滿后，三原县人委电話告訴王月明："如果你們要用，应监督使用"，王反而将賀提拔为省产校附設产院代主任职务，並提为技术六級。一九五六年工資改革中，有人提出安国瑞是叛党自首分子，应考虑提級是否妥当，王月明却說："管他叛党不叛党，只要有能力就行"。

王月明敌我不分，丧失立場还表現在对其他人的信任上，如右派分子吳霽棠独攬防痨协会，一貫反对党的領导，象这样的人，他从不过問。对右派分子姚尔明，王也是非常信任。

（4）散布消極情緒，工作不負責任。

王月明在衛生厅几年以来不負責任，将衛生业务工作推給王季陶，致使党的方針、政策不能很好貫徹，王月明对此熟視无睹。在党的工作上，王月明身为衛生厅机关分党委書記，一九五七年全年只参加了两次党委会。一九五六年發展的六个高級知識分子，档案材料只字未看过，一个人都沒給談过話。对上一級的指示是照抄照轉、推压，下边送来的报告，从来沒有看过。当下边的同志請示工作时，不但不給出主意想办法，却散布消極情緒，他常說："科員对科长有意見，科长对厅长有意見，我这个厅长还有一肚子牢騷哩"，又常說："衛生厅的工作誰来也搞不好"、"一个单位一个党員負責幹部，工作还可以，两个党員就弄不成了，三个党員就更乱。"

在精簡机构工作中，省医院提出一些困难，王說："任务嘛！看怎么执行，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地方病防治所提出精減中的問題时，王月明說："多編少編沒有什么，人多了就多作点工作，人少了就少作点工作，能作到什么程度，就作到什么程度。"

二、在批判斗爭中的表現及其所持的錯誤态度

王月明在批判期間曾检討过三次，其态度是有一些进展和改变，但仍不願徹底認識錯誤交代問題，企圖蒙混过关，反复无常。如第一次检討时不承認有反党思想，第二次检討后，即又找李經綸同志談："你批准我捏造事实的話，我就承認有推翻省委的野心"，且說："昨天的检討重了，提的高了"。第三次检討后，又找李經綸同志說："我已徹底交代了，再不能深了，若要再深，只有說假話或者死路一条"等。甚至在一次小組会上，对同志們批評他的意見，不但不加考虑，反而当散会时，气势凶凶地摔門，憤憤而走。最近又說他要进行第四次检討。

鑒于上述反党事实，王月明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員最起碼的

条件，經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支部扩大会議討論，全体党員一致通过将右派分子王月明开除出党。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楊林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右派分子楊林原系本校普通班第十八支部学員。在本校反右派斗爭中，第十八支部的同志們揭發了楊林的很多極为严重的錯誤，經过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学員的批判、討論，业已徹底揭露楊林的右派面目，第十八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楊林的錯誤性質，已于支部大会通过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並开除出党。党委会經过严肃愼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十八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請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陝西省委的意見，得到了陝西省委的贊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附：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十八支部关于右派分子楊林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簡　历

楊林，陝西省子长县人，現年四十九岁。文化程度高小畢业，家庭出身貧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零年二月参加工作，同年四月入党。历任陝甘紅軍支队中队长，县苏維埃政府副主席，边保司令部供給部长，盐务总局局长，旅供給部长，旅政

委，一野后勤供給部政委等职。来校前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党委書記。在高級党校学習时期，任普通班第十八支部書記。

（二）主要錯誤事实

（1）恶毒地攻击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領导，誣蔑党和国家的領导人。

1、誣蔑一九四七年的土改运动，攻击党中央对运动的正确領导。他說："一九四七年土改三查时搞得太过火了"，"群众要怎办就怎办"，"把不該斗的也斗了，农村中發生惨死現象"。他还說："当时所用形形色色的刑法，就是桀紂时代也沒有这些"。他又說："东北土改發生偏差和少奇同志在土地会議講話有关，听說高崗为此問題对少奇同志还有意見"。他还責备中央沒有总結，未"向全党作个交代"，"在八大也未提"，借此来追究中央和少奇同志的"責任"。

2、为叛徒高崗抱不平，否定中央对高崗問題的正确处理。他認为："高饒問題应該公布"。在核对事实和检討中他承認說："自以为高崗反对的是少奇，而少奇主持四中全会处理高崗問題，对高的錯誤估得重了，帽子大了，逼得紧了"。使高崗"回不过头来，不敢承認錯誤，以致自杀叛党"。他还認为"高崗的錯誤，中央負有一定責任"。同时，他又說："高崗过去有功"，对其处理应"将功折罪"，因而認为中央处理是"太过火了"，企圖为高崗翻案。

3、誣蔑中央基建方針"冒进了"，中央領导"一陣風"，有忽左忽右的現象。他說："中央一冒，影响我們各个方面都冒了"。他又說："一件事一下急起来，馬上公布动員搞，过去又放松了"。如一九五五年要降低工程标准和造价，……陈云同志过去算过賬，窝工费由建筑部門拿还是合算，"过几个月降低标准的劲又松了，結果造成了浪费"。他又說："現在少奇說要动員家屬回乡（家），过去刘部长（刘秀峯同志）对我說过，少奇

同志說：你調上海工人应該把家属带来，盖一条象上海式的街坊，他們就習慣了。都是你（指少奇同志）說的，我們怎么执行”。在工資問題上他認为：“也是‘一陣風’，也就是忽左忽右的現象”。他还攻击說：“周总理說上半年增加工資是对的，下半年国家穷了，不該增加工資了”。

4、埋怨中央布置任务太多，把自己工作中問題的責任归咎于党中央和国务院。他說：“我們搞建筑是主要的，可是中央給下边任务太多，中心太多，如增产节約、肃反、审幹齐头前进，都是中央来的”。“自己忙的要死，还要受上級批評，下級也埋怨我們，我們是挨头子、受气工作，不是监察部門来找麻煩，就是报社来找麻煩”。他还說：“李富春、薄一波同志今春在西安又要反对‘大少爷’作風，我看首先要反对他們自己，这些事都是他們决定的”。在查对事实时楊說：“浪費这股風是从中央刮下去的，是上行下效”。他还說：“我們单位是矛盾的集中点”。“各部門互相扯皮，除由于本位主义外，就是各有各的制度，互不統一，这些制度大都是国务院批准的”。“这是政出多門，朝令夕改，各搞一套”。“国务院和国务院打架”。

5、为寒假路費問題攻击財政部。他几次向同志們散布說：“我們工資里沒有包括路費的因素”，曾和个別同志說：“要不發路費就向中央鬧，給中央写信，派代表請願”。他見到財政部在报上公开检討給高級党校發路費問題时，不滿意地說：“这还不是要手腕，这就是給关上門了”。在向中央和学校提意見时，他提出了应該發路費的八条理由来攻击財政部是“单純財政观点”，甚至他还誣蔑李先念同志說：“他是老幹部，当上副总理忘了老幹部的苦处”。

（2）对党和国家的几个重大政策有严重的抵触情緒。

关于統購統銷政策，他認为：“在执行中有过死过严的情形，西安市有的学生餓跑了，工地工人餓的睡不着覚，劇团演員下台后沒有吃的哭鼻子。国家並不是沒有粮食，却不讓百姓吃飽，

鉄路沿綫粮堆霉烂"。

他对中央規定的三反、肃反运动控制数字不滿。他說："中央規定要老虎数字，我有意見"，"肃反中也有指标，我不反对数字，但应有較大的伸縮性。我們局內肃反搞到的多数是历史反革命"。

他認为："我們很多計划是按照苏联的办法搬来的"。並說："你們鉄道部（指同組鉄道部的同志）、財政部多是硬搬苏联的一套"。

（3）对陝西省委"八大"代表选举不滿。

他認为"陝西省委选举'八大'代表时'民主精神不够'"，並說："我們这么大单位，省委也不照顧一下，代表候选名单是由主席团指定的，我們只是划个圈。""我是組織服从，思想不通"。

（4）对中央决定留校整風，公开表示对抗。

学校传达中央指示留校整風时，楊在支委会上气憤地說："提早結束是邓小平一个人决定的，留校整風也是邓小平一个人决定的，都是邓小平一个人决定！"他还說："党中央和学校动員我們給中央提意見，提了意見回来就留下来整我們"。当学校發下整風参考資料时，楊表現了很大的抵触，曾两次提出要看学校給中央所作的原报告。他从整風反右派斗爭以来一直抱消極态度，放松对支部工作的領导。

此外，他在一次小組会上还說："三反时首先带头作检討，新三反又要检討官僚主义，反保守检討右傾、保守，反冒进又得检討盲目冒进。老幹部总得挨整"。

（5）革命意志衰退。

在小組閑談中他說："我現在四十九岁了，盼望再活二十岁，最小的孩子二十一岁了，不管卖苦力、蹬三輪，也能謀生了"。在查对材料时他說："我幹了将近二十八年，象老騾子一样，力量出尽了，該讓位了。現在学不进去，上进心不强了，有

浓厚的暮气。但要求保持中将待遇，走路不背鋪盖”。

此外，他还說：“在評軍銜时，我曾想到：自己轉业了，不値錢了”。

（三）錯誤的根源

楊林在鳴放期間，表现了上述一系列的反党反中央的錯誤言論，是有其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的。

楊林虽然二十八年来，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为党作了不少工作；但是，由于他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沒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把工作中的成績归功于自己，認为党亏待了他。因而，他的居功自傲和名位思想就日益滋长和發展起来，常常表现了狂妄自大，以老卖老，自以为是，不是把自己置于党的領导和群众监督之下，而是把自己与党平列起来，甚至同党对抗，以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观点看待党的組織。早在一九五四年陝西省学習四中全会决議时，他所作的打油詩中，就有为高崗丑表功的內容，並受到过批判。他虽在形式上作了检討，但思想上並未解决問題，反而認为中央对高崗的处理是从宗派和成見出發，这就完全走上了与党相对立的道路。

（四）对錯誤的态度

楊林对其錯誤的認識，虽然經过了一些反复，但从整个检查批判过程来看，他的态度还是比較好的，对土改和高崗問題作了基本的交代，承認了自己是党內的右派分子。值得指出的是楊林对其錯誤的徹底检查和認識还是不够的。

（五）結　論

根据以上事实，楊林由于严重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的發展，在資产阶級右派向党进攻时，就完全站在右派立場上，在重大的政治問題和一系列的方針、政策性問題上，对党中央、国家

領导人員进行了誣蔑和攻击。因此，我們認为，他是党內的右派分子。

为了巩固党的組織，純潔党的队伍，根据党中央处理党內右派分子的原則，第十八支部支部大会全体同志一致通过，开除楊林的党籍。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文良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五日）

右派分子王文良原系本校普通班第四支部学員。在本校反右派斗爭中，第四支部的同志們揭發了王文良的很多極为严重的錯誤，經过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校学員的批判、討論，业已徹底揭露王文良的右派面目。第四支部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王文良的錯誤性質，已于支部大会上通过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並开除出党。党委会經过严肃慎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四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請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陝西省委的意見，得到了陝西省委的贊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附：中共中央高級党校普通班第四支部关于右派分子王文良的政治結論

（一）簡　历

王文良，男，現年五十四岁，陝西清澗县人，貧农出身，一九二八年入党，曾任清澗县委書記，中央組織部二科交通，陝甘

宁边区交际处副处長，西北軍区軍邮局長，西北局統战部处長等职，来校前任陕西省委統战部副部長。

（二）主要錯誤事实

第一，对三反运动进行攻击。

（1）否定三反成績。王文良說：“三反是伟大的嗎？我是挨过整的，我認为是錯的。”又說：“西北軍区是以官僚主义反貪污，以官僚主义反官僚主义。”

（2）对于三反中某些規定和方法不滿，並联系到对肃反运动进行攻击。他認为“三反百分之十、肃反百分之五的規定不科学，三反百分之十真害死人”！对于大胆怀疑，他認为是錯誤的，至今还有保留意見。

（3）对于三反善后工作亦極为怨恨。他說：“三反报紙上公布了的貪污分子，搞錯了的为什么不給平反？外国搞錯了死了的还給恢复名誉，我被公布好几次，打过了，公布过了，就这么算了？”又說：“别人受委屈不管，收拾人的中央保护他，說是忠心耿耿，不要难为他，难道受委屈的就不忠心耿耿，为什么不应該受到党的爱护？”尤其是他借此狂妄地提出：“为了国法，中央应进一步地注意善后工作”，並攻击党的历次运动“都有違法現象”。要中央检查。

（4）对在三反中曾批評过他的西北軍区司令員×××同志，經常肆意辱罵，不容别人置辯。

第二，攻击中央的正确路綫。

他在鸣放期間說：“王明路綫錯了，难道你毛澤东路綫就都正确嗎？”他污蔑中央的領导說：“‘左’、右那一次不是从中央来的啊！”

第三，不滿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审干，並借此誹謗中央及中央一些領导同志。

王文良說：“中央整下不整上，搞錯了許多人的××，为什

么在七大时汗毛未动，还选为政治局委員。”又說：“××給人难处，善于察顏观色；他要怀疑的人，你哭、笑、站立都不对；你积极工作，他說你装正經。××最会給人看相，这是他在延安的杰作。”他还造謠說：“延安中央党校还有一个‘紧急治罪法’，是中央搞的，还是××搞的？××有权公布这个法嗎？”

第四，替資产阶級的剝削行为作辯护，对中央某些政策怀疑和不滿。

（1）他認为定息不是剝削，曾說：“是国家賜予的，为什么非說人家剝削不行呢？”

（2）当中央公布了广西平乐地区虛报产量的情形以后，他便推論到全国都可能有虛报产量現象，从而怀疑全国一九五六年粮食增产的可靠性。

第五，反对留校整風的决定，散布反中央的言論。

他怀疑党校向中央关于整風学習报告材料的正确性，要求学校把向中央反映同学中右傾思想的报告材料“交二十六个支部書記核对”。当大家一致表示要展开思想检查时，他說：“沒有什么問題，我是不發言。不發言，沒有什么討論头，就不会延长时間了。”有的同志說：“应該明辨是非”，他则以煽动的口吻說：“你們不要太天眞了”。更为恶毒的是他竟說：“中央这一手（指留下整風）办的很拙劣！”

（三）錯誤根源

王文良由一个具有将近三十年党龄的老党員，走上反党反中央的道路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

一九四二年王文良在延安中央党校学習时，因他曾被捕过，对他的历史进行了审查，便对党極为不滿。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时，因他領导运动不力，和私商互請吃飯，铺张浪費等被停职反省。他对党这样的正确处理，不但不虛心检查自己，痛改前非，反而揹着老資格的包袱，顚倒黑白，到处喊“寃”，長期对党怨

恨不已，加之，他居功自傲，長期不注意政治学習，更促成他和党离心离德，以致在这次整風学習中，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終于走上反党反中央的路綫。

（四）王文良对待錯誤的态度与表現

当运动开始，对其錯誤进行揭發时，他态度蛮横，拒絕检查；經严厉地批判后，他才作了一些檢討，而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却躲躲閃閃。反右派斗爭开始以后，在同志們反复的帮助下，才承認了錯誤，並在支部大会上进行了交代和检查；但对其在三反运动中所謂"冤屈"真相，一直有意歪曲，經組織上掌握了眞实情况与其对証材料时，他仍採取了堅不承認的蛮横态度；后經严正的批判，王文良的态度才有了轉变，在联支大会上作了較为誠恳的交代与检討，承認了自己反党反中央的罪行，承認了自己已墮落成为党內右派分子。

（五）結　論

根据上述事实，足以說明王文良已經蛻化变質，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員的条件，成为党內的右派分子，經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开除其党籍。

中共中央高級党校委員会
关于开除右派分子王曉天党籍的决定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四日）

右派分子王曉天原系本校普通班第十五支部学員。在本校反右派斗爭中，第十五支部的同志們揭發了王曉天的很多極为严重

的錯誤，經过支部大会的批判和全体学員的批判、討論，业已徹底揭露王晓天的右派面目。第十五支部根据中央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王晓天的錯誤性質，已于支部大会上通过决定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並开除出党。党委会經过严肃愼重的研究之后，同意第十五支部的决定。这一决定已报請中央审批，中央征求了內蒙党委的意見，得到了內蒙党委的贊同，最后中央也已批准这一决定。

附：关于王晓天的錯誤事实材料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王晓天，男，四十一岁，吉林省长春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工作，一九四一年三月入党，来校前任內蒙粮食厅副厅长。

一、一貫对党的領导不满，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攻击內蒙党委。

（1）在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报告的录音后，他对小組內一位同志表示斯大林沒有錯。这位同志說："斯大林的功績不能抹杀，但錯誤也是严重的，如肃反扩大化，十七次党代表会的代表被杀了多少人！"他就說："那么中国肃反就沒有扩大化？死了多少人呢？"他又說："我就不同意三七开。"

今年五月中，他一看到校部社会科学資料室發下的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論社会矛盾索引"，其中斯大林的目录有三十六个，就說："硬說斯大林沒說內部矛盾，人家說了这样多，我一見到这个就高兴。"后来，他又到另外一个同志的房間里，翻了翻那本索引，又拍拍桌子，气憤地說"毛主席說斯大林沒有說过內部矛盾，你看，他說了多少啊！"

（2）同年五月中当他看到刘少奇同志在湖南省委幹部会議的講話中，講到現在人死了还有等級，北京人民公墓葬坟什么样

的幹部葬在那一等，多少面积，都有规定。他就对一位同志說：“这不都是中央规定的嗎？现在又批評别人。”

少奇同志在报告中講到，过去是私有制，因此对分配沒有人去比，现在是公有制，大家都有一分，分配要公平合理，大家都要比一比（大意）。他却說：“那不見得，国民党时代农民也跟地主比。”

（3）同年五月中，当他和小組同志談到工資福利問題时，他說：“去年一股風，要提高工資，周总理还作了检討，同天又說提多了，又和解放前比。”一位同志反駁他說：“这是沒有經驗。”他說：“按你这样說，什么都沒有經驗，那就沒有問題了。”

（4）同年二月，当他看到报上刊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發展养猪的决定后，他对小組內一位同志說：“你看中央总是这么幹，連生猪的問題也要發联合指示，这有什么好处呢？这样的指示到下边以后，就会造成以党代政。”（去年下半年当他看到中央和国务院發表一个联合指示后，也曾表示过不滿。）

（5）在今年五月底的一次小組会上，他認为中央对大放大鳴估計不足，沒估計到过去工作中的錯誤，他覚得中央有驕傲自滿情緒，对錯誤估計不足，因此放后就乱了。

在一次小組会上，他認为“籠統地說成績是主要的，錯誤和缺点是次要的，不足以服人”。这句話在“六八”社論發表前后，他都說过。

（6）在今年五月底的一次小組会上座談对整風認識的时候，王晓天說：“原来說今年准备，明年整風，毛主席还这样說，一回来馬上就整風了，忽左忽右。”这句話在和同志們交談时也說过。

（7）在去年八大選举时，他在小組会上和个别交談时曾說：烏兰夫如果不是少数民族，連中央委員也当不上。他認为烏兰夫同志能力不强，他在內蒙工作时，曾对少数民族幹部說：烏

兰夫同志当选七届中央候补委員是沾少数民族的光，引起少数民族幹部的憤慨。去年九月二十七日还和一位同志說过："內蒙党委委員都是飯桶。"

（8）据內蒙森林工业局局长反映：有时和王晓天联系解决粮食問題，直接找他談問題时，他就高兴，事情也解决得快；如果是經过內蒙自治区党委要他解决問題时，他就不滿意。

（9）今年五月下半月，在一次小組会結束后打扑克时，他說："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坏。"当时有一位同志批駁說："有些共产党員吧。"另一位同志說："即使有些共产党員不好，也不能比国民党还坏。"又有一位同志說："象国民党那样就够啥了！"

（10）他曾跟內蒙的一个幹部不止一次地說过："現在省长和部长以上幹部的生活比国民党时代的官还舒服。"

（11）在鳴放期間，有一次小組討論整風問題时，他曾提出："为什么每次都要搞运动？"

（12）今年上半年，有一次，王晓天突然問一位同志："为什么要繳党费？"

二、"六八"社論后，仍否認右派向党进攻，反对留校整風，贊同右派分子言論。

（1）六月八日前听了校党委的传达，他和一位同志个別談話时說："原来叫放，这时又說夺取政权，怎見得夺取政权？为什么别的支部沒有这样講？"他又去問支部書記："別的支部有沒有这样传达？"看到六月八日社論后，在小組討論时他又說："对右派批評是否过早？从那里看得出右派是在进攻？怎見得是在夺取政权？"

（2）在六月八日社論發表的一天（或后一、二天），他对其他支部一位同志說："社論有什么根据說右派要推翻我們？""何必用这个办法呢（指用漫画諷刺的形式）？要多用說理。"

（3）在六月二十二日小組討論留校整風时，他認为学校第

一次提前結束是“惊慌失措”，“从那里看得出右派是在进攻，說那样几句話就在夺取政权？”

他又說：“学校的計划变化太多，忽东忽西，說資产阶級夺取政权，我就想不通，我也沒有看出什么。所謂紧张就在大城市，其他地方不見得紧张，現在給人家印象似乎資产阶級声势浩大不得了。学校所說右派思想是如此嗎？听說学校学員們所提意見已發到中央各机关，有点大惊小怪。現在这也是問題，那也是問題，連入学考試卷子也搬出来了，以前幹什么了，为什么不早說？搞得那样紧张，又要整思想，搞右派分子”。

他又說：“来高級党校就是学馬列主义，提高社会主义覚悟的，一年都沒有提高，如沒有解决思想問題，两个月也解决不了問題。有些人的思想問題一辈子也解决不了。”

（4）六月八日以后，他在一次小組会上說：“对肃反問題的估計是不是成績是主要的，这种看法有問題，我看缺点錯誤需要适当估計。”

（5）六月八日以后，他認为林希翎所說的“对現实不滿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有正确的一面”。

（6）在看了儲安平的检討后，他在小組会上和个别对一位同志都說过：“原来知无不言还有个界限？！我过去还不清楚。”

三、否認、諷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今年五月底，小組討論农业合作化时，他覚得合作化的問題很多，並用老根据地一个中农的言論加以証明。有的同志談到农业合作化后政府对农民是有支援的，他問給了些什么？同志們說明政府給农民貸款，肥料、种子等，大力支援了农民。他却說：“給的多，但是向农民要的更多，还有公粮。”

今年四、五月間，有一次一位同志到他屋里去，临走时他說：“我看合作化就沒有优越性。”

（2）去年十二月他在支部大会上听了中央批發四个有关

农民生活情况简报的传达后，回到屋內就說：“反正是农民倒霉。”

（3）今年四月間，他看到衛生球是黑色的就說：“还說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衛生球都是黑的！”

（4）今年四月間，当他听到布票打折使用以后，他說：布也不够了，这还算什么优越性呢？（大意）

（5）去年在討論“八大”文件期間，有一次，小組同志爭論三个改造的性質問題，王認为資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改造的性質是一样的。其他同志認为資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是沒收，消灭的問題，而农业、手工业改造則是提高的問題。后来王曉天說：“土改才多久，又集体化了，农民沒有意見嗎？农民的覚悟有那么高嗎？”

（6）在学習資本論时，他曾到五組两位同志的屋里，問道：“咱們經营粮食賺錢，是不是剝削？”五組两位同志說：“咱們国营商业，利潤都上交，怎能說是剝削！”他就說：“唔唔，我还以为是剝削呢。”

四、对党在內蒙提拔少数民族幹部有不滿情緒。

（1）去年小組討論“八大”文件时，他表示，对机关幹部民族化問題同意賽福鼎的發言而不同意烏兰夫的發言，認为烏兰夫自己是少数民族，强調反大汉族主义，不全面。

（2）在另一次小組会上，他認为少数民族幹部提多了，就是把內蒙全部少数民族都提来作幹部也不够，对于多提少数民族幹部想不通。

五、严重的个人名利思想。

（1）去年，在一次小組討論临結束时，他曾說：“反正什么都要有錢，有錢就能行！”“到了共产主义还是要有錢才吃得开。”类似这样的話，他說过不止一次。

（2）今年三月中旬三組一位同志到王的屋內找組織委員交党費，王曉天将表格拿去看过以后說：“你們連个十級的也沒有

嗎？”“把我們也塡上吧！”

他在去年开学后即到处打听支部同志們的級別。据原来介紹王入党的一位同志說：王晓天很关心級別待遇問題，他一到党校遇見我即問，你是交多少党費？还說过去某某等二人是我們在专署的科长，現在还是十二級，落后了……等。

（3）今年三、四月間，当小組一位同志談到幹部下放和減薪問題时，他說：“我看还是在城市好。”表示不願下去，即使下放不減薪，也不幹。

当談到平日工作中下乡問題时，他曾表示不願下乡，常說下去不受尊重，下乡不解决問題。据他自己說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四年中只下去过一次。而且只是到县以上机关。

（4）小組选举他当副小組长，在临散会的时候他气憤地說：“我才不当这个奴才呢！”

（5）王晓天認为在內蒙地区工作生活艰苦，願到大城市，不願在內蒙地区工作。

（6）王晓天原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入党，同年九月轉正的，但是，他在入学报考登記表上，却塡写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入党，一九四一年三月轉正。当他的两位入党介紹人糾正他的入党年月时，他还不老实承認，甚至对其中一位同志是不是他的入党介紹人，表示記不清楚。

中共兰州市委員会
关于右派分子秦汝哲的政治結論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秦汝哲，男，汉族，現年三十三岁，山西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工商业，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〇年入党，現任兰州市公安局长，市委委員。

历史上的主要問題：一九四七年晋綏土改时，曾被群众要去和关押三天（因其兄秦儒英逃跑，家无主事人故要去被斗）。

秦汝哲的主要右派言行：

一、同意右派言論

1．同意右派分子水梓提出：公布刑法、成立法学院、建立考試制度。他說“水梓提出成立法学院，我看很必要，目前，我們司法幹部急需要受正規的法律訓練，至于水梓提出的幹部要实行考試制度，过一个时候可能考虑实行，目前是不成的。”並同意右派分子屈凌汉攻击社会主义工資制度的謬論。

2．一九五六年赴外参观，在长春学習“八大”文件，討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时，秦不滿罗部長对黄紹竑的指責，他說：“在黄紹竑的發言中看不出有什么攻击，罗部長不冷靜”。

二、挑撥党群关系，煽动肃反对象翻案

1．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市公安局第一次鳴放座談会上說：“有些問題处理現在看是不合适的……我考虑也不够适当，

談出来不合适的可翻案……，比方我們現在要檢討，但由于处境不同的限制，有些問題就覚不出来。比如李振基（右派分子）的情緒，过去覚来了，但象今天談的就沒有感覚到，我們头上沒有压的喘不过气的滋味，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他們（指肃反重点分子）受的多，就有急切需要反掉的希望”。

2.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日第二次鳴放座談会上說：“有些問題大家还可以研究，如宗派主义問題、官僚主义問題等，現在党与非党等关系，应該轉变了，是时候了，……有些处理如有問題可研究推翻，希望能帮助查这个問題”。

三、攻击肃反运动

1.肃反运动結束初期，他認为“肃反成績不算太大，缺点却不少。覚得斗爭的面較寬，斗出来的眞正的反革命分子不多，有些可以由审幹方面解决的問題，也当肃反重点斗爭了”。

2.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全体股长以上的幹部会上，作題为“有反必肃，有錯必糾”的报告，实际上是片面强調了“有錯必糾”，丢掉了“有反必肃”的方針。

3.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二十八日在市公安局两次召开的鳴放座談会上，有些肃反对象要求看自己的肃反档案时，他答复說：“你們可以看”，並說：“有些处理过的事情，如果有問題可研究推翻，希望能帮助檢查这个問題”。

四、反对党的幹部政策和組織原則

1.整風开始有些非党幹部（有些后来是右派分子）提出，公安机关派幹部出外工作，介紹信上註明政治情况（党团員），对联系工作不便，他們要求取消，他表示“可以考虑”。由于他的支持，曾一度有的非党幹部外出工作写介紹信时，就拒不用印有政治情况的介紹信了。

2.整風开始后，在一次非党人員及一些有意見人員座談会

上，非党幹部罗鳳鳴提出“为啥調去学習都要党团員呢”？他說：“这个誰也沒有規定，就那样执行着哩。”

3.在鳴放中有些非党幹部（有些現在是右派分子）提出，为啥公安局科、分局长幹部都要党員？他說：“我看有些人是可以提拔的”。

4.他还說：“我們过去对历史上有点問題的人扣得太紧了，比如有些人是伪党团骨幹，但給敌伪作事时間短，解放后給我們工作多年了，对这些人扣得紧，实际上是对党的教育作用估計不足。”

五、反对党的領导，拒絕执行上級的政策和指示

1.一九五六年中央提出反破坏事故斗爭，兰州市布置作了一个时期，到一九五七年三月总結經保工作时，他認为兰州就沒有多少破坏事故，提出反破坏事故，有点脱离实际，並認为現場保衛工作与安全检查工作，基本上是一回事，主张交安全检查部門去管。並将中央經保工作上的反破坏事故斗爭的首要任务，擅自改为“安全生产，防止事故”。同时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召开的二科科、組长会議上說：“反动的标語，传单謠言不能当事故看待，向中央写一报告（实际中央早已作了决定，反动标語等应以事故看待），鬧鬧事件不要当敌情看待，如果把反动标語当事故看，反破坏事故斗爭口号再提一百年也是正确的”。

2.省公安厅提出严厉打击美、蔣特务，他認为“甘肃騷乱事件突出，不能和沿海地区相比，我們这里美、蔣特务就沒有發生多少，这个口号提的不具体，甘肃应从細致的調查研究工作做起”，“反动标語大都是小孩写的，残余反革命基本肃清”等无敌或少敌的論調，在他出外参观回来后对科长說：“其他地方对敌情也不一定熟悉。”又說：“未参观前，对兰州的工作提心吊胆，这次把其他地方一看，也就放心了。”並認为“兰州經保陣地越来越大，政保陣地越来越小。”因此，去年四月在他的积極

提倡下，将市局政、經、文三偵察科合併为一个偵察科，一个保衛科。

一九五四年，他曾主张縮减分局，加强派出所，撤銷了分局股，将分局变成督导性質，实际上派出所並沒有加强，而是从組織机构方面削弱了对敌斗爭的力量，使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

3.一九五七年省公安厅指示兰州市应搞打击刑事犯运动，开始他对是否搞运动，动搖不定，叫不叫运动曾討論过，其实是不大同意搞运动。以后虽然同意搞，但亲自研究督促不够，以致运动进展緩慢，打击不力，运动結束后，刑事案件依然上升。

4.中央規定要局长亲自批准的某些偵察手段，也交給正、副科长去批。

5.中央公安部規定，市局六科的业务要定期向中央公安部有关业务单位写专題报告，而他却提出科、分局一年写一次总結报告。

秦从去年十月停职反省到现在已半年多的时間，对上述反党言行毫无認識。尤其在党代大会期間，經大小会揭發批判后，秦不但不低头認罪，反而以拉攏引誘、暗示煽动等手段，利用党兴民等四人，公开替他辯护，解脫罪責，企圖混淆敌我界限，蒙混过关。

根据上述事实，經中国共产党兰州市第二届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討論通过，将秦汝哲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銷一切职务，分配待遇較低的工作。

中共青海省委員会
对右派分子刘杰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五月)

刘杰(女),汉族,四十岁,陕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七年二月入党,现任青海省妇联主任,全国妇联执委,行政十級。

刘杰是孙作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員之一,夫唱妇随,对孙作宾的反党罪行,毫无揭發,这次会議中,一再包庇。

一、主要反动言行

(一)刘杰極力反对党的肃反、审幹、反右派斗爭。她說:“肃反、审幹冤枉了一些地下党員,这是不了解地下党的艰苦与情况所致”,“雷鳴(原青海日报副总編輯、党內右派分子)說过,省委是老虎屁股不敢摸,雷主持青海日报新聞方向有錯誤,这是否就够上右派。”又說:“一个人給弄上几条缺点就成为右派了”。主张楊希尧(民盟主任,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在內部斗一下,不要上报。当孙作宾指示他的反党集团成員之一潘光亚平反秦志伟的反革命問題时,她說:“老潘!你也是被整过的人,其中情况总是知道的。”在大鳴大放时,她鼓励孙作宾反党集团的另一个成員毛文辯說:“有意见就放”,当大会印發了两份攻击省委的匿名信时,她說:“难道群众連个匿名信都不能写?还說發揚民主叫人家提意见嗎?”对于达參事件,她說:“河南叛乱……去年打了也不解决問題,弄得很慘,民族关系搞坏了”。

(二)汚蔑省委不能代表妇女利益,她說:党要教育幹部

"認識……工作做的再好，如不把妇女工作作好，只算作了一半，党員再好，也只算起了半个党員的作用。""省委委員中沒有妇女委員，一河水开不了。""如果我不离甘肃，早就是省委委員，現在新疆的呂銘是省委委員，我也不比她差吧！"

（三）汚蔑青海省委是"陝北宗派"，說省委"陝北人佔多数，其它地区的不过是陪衬，部队幹部亦不多，部队同志很有意見，妇女就更不用說了，这对团結各方面不利。"潘光亚交代"我是說了省委陝北人比例大，孙与刘杰都說比例就是大"。有人提出"省委不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她說："这个說的正确，民族統战工作就搞的不好。"

她对于孙作宾，却有意吹嘘："孙書記的职务頂不頂中央一个部长？""他是西北局統战部部长，（实际是副部长）就当不了一个第一書記？"

（四）对于孙作宾在民族、統战工作上的投降主义，刘杰是夫唱妇随極力支持和执行的，她認为"青海省三百多名上層民族代表人物家属，在群众中有广泛深刻的影响，是民族妇女的代表……她們是本民族中有特殊作用的人"，"我想向省委提出讓蔡塔，尤黑尕作县长或副县长"。为了扩大个人影响，不經組織批准，常以个人名义出现，給王德海、康克明等人的老婆送礼，給尕囫（河南蒙旗亲王，已故）送礼，还給西藏某上層妇女写信問好，显示自己重視統战工作。她推荐右派分子馬乐天（司法厅厅长，划而未斗的右派分子）的小老婆赵湘（妓女出身，已划右派）为西宁市妇联副主任。

（五）介紹現行反革命分子唐仲常（中华革命党中央宣传委員，解放后又以唐为首組織中国社会党）去劳动局安置了工作。

（六）会議开始后不久，就指示毛文群为孙作宾找根据，說"高、孙是关系問題"，說：孙作宾的主要問題是与組織关系沒摆对，革命意志衰退和严重右傾。同时对她自己的問題讓妇联副主任王玉芝捎話給全国妇联，怕省委把她"弄錯了""冤枉了"。

二、整風中的态度

包庇、抵赖，至今仍未徹底交代。

三、处理意見

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銷党內外一切职务。

中共青海省委員会关于右派分子潘光亚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五月）

潘光亚，男，四十四岁，汉族，甘肃省清水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現任青海省委統战部副部长，这次下放为河南县委第一書記，行政十級。

一、主要反动言行：

潘光亚是孙作宾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幹

（一）污蔑党的領袖。

（二）污蔑省委書記，除孙作宾外都是“鉄路警察”。

（三）与孙作宾合謀，借民族統战政策执行情况检查，到处煽風点火，专門搜集“五五一条”作为攻击省委的毒箭。

（四）抗拒省委領导。潘在处理“达参叛乱”善后工作中，报請要給四十余名上層头人送礼，省委批复不能送，但他拒絕执行，反送了九十五人，而且連叛乱头子們也都送礼道歉。

（五）攻击和污蔑省委的幹部政策“是稳重的吃得开，积極的吃不开”，“青海的幹部沒有一个水平高的，都不見得称职”，“青海的幹部政策是宜守不宜攻”。

（六）潘是孙作宾一貫反党的極先鋒，二人称兄道弟，无話不說，潘可以駡孙"羞你八輩子祖宗"，孙也可以駡潘"羞你的先人"。早在一九四七年潘在孙的指使下即曾恶毒地攻击当时隴东地委書記李合邦同志，污蔑"隴东地委是宗派主义集团"、"地、县委書記都是陕北人"；在甘肃他支持孙作宾誹謗张德生同志是"繡花枕头"、"笑面虎"，高健君同志是"阴险"、"忘恩負义"；在西北局他同意污蔑馬文瑞、李景膺同志是"宗派主义"；在青海孙說"省委常委陕北人多，"潘答："高是一統天下，别人插不上手，沒有别人吃的飯"。

（七）反对平息"达参叛乱"，污蔑我們"打得不对，打得很惨"，"部队紀律很坏，无故杀死活佛和槍毙群众"。声称"应由当地党政負責"，叫嚣要撤公安局长的职，要杀部队几个人的头。

（八）反对、污蔑肃反，破坏整風、反右。潘自称他对肃反政策的态度是"反也可以，不反也可以"，並說："在党外人士中肯定不搞肃反，今天不搞，将来也不搞，如果搞到党外，那就不是一个肃反問題，而是造反的問題"；他污蔑机关肃反是"烏煙瘴气"、"打击了幹部的积極性"，公开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翻案。整風开始，他威胁給他提意見的人說："反对領导也能成右派"，但又煽动和打保票說："給别人提意見不定右派"；反右中他假借習仲勳、汪鋒同志的名义，說"青海反了馬文鼎对爭取台灣不利"，对机关的右派分子，他主张"定也可以，不定也可以"，並公开講："右派分子也有前途，过几年会成为党員，今天的党員过几年也会成为右派分子"。要幹部"以同志式的关系对待右派分子"。

（九）处处維护剝削阶級利益。自称"作統战工作就是靠剝削阶級吃飯"、"民族統战工作就是上層工作，中央沒有作下層群众工作的規定"、"千百戶、牧主'都是革命头人'"。

（十）政治品質極端恶劣。一貫採取卑鄙下流手段，打击别

人抬高自己，挑拨离間，造謠生事，封官許願，收买拉攏，曾无恥公开地說："我要的是省委常委"，並托刘杰給孙作宾捎口信"把我的官升一升"，未达到就埋怨孙"把我弄到青海来就落得这个下場"。

二、斗爭中的态度極其恶劣，出尔反尔，不肯低头認罪。

三、处理意見：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撤銷一切职务。

中共青海省委监察委員会
关于右派分子雷鳴的处理結論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

雷鳴，男，三十五岁，河北安次县人，富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五月入伍，同年十一月入党。曾任华北抗日联軍二十七支队一总队政治处幹事、二营五連政治指导員，一二〇师政治部幹事，一軍一师三团政治处股长，青海互助县委副書記，青海省人委办公厅秘書处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在整風和反右斗爭前任青海日报社副总編輯。

雷鳴在日寇侵略至家門时，抱着寻找出路的目的混入我軍，在部队工作期間就十分驕傲自負，个人主义严重，抱怨組織提拔自己慢。到互助县工作后，更加暴露了他資产阶級个人主义野心家的丑恶面貌，在一九五一年春节时，群众組織秧歌队到县委会拜年，有一反动富农（后被判刑六年）高呼"雷主席万岁"、"雷書記万岁"。雷鳴不但沒有制止，反而欣然自得給以鼓励。同年在湟中参加土改試办工作时，在幹部中傲慢地說："湟中試办的好乡不如互助的落后乡，尙志田（当时湟中的县委書記）該杀头"。但后来互助县在土改复查工作中發現大部分漏掉和錯划地

主成份的錯誤都是雷鳴批的。雷鳴在一九五二年"三反"中打击县委書記吳正夫同志，在幹部中散佈"人不为己、天誅地灭"，"万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謬論。他認为"世界上根本沒有具备工人阶級思想的人，解放軍打堡垒的人虽然英勇，但动机不純"。报紙上發表省委的工作总結后，他說是"假的"。誣蔑"省上处理問題和旧社会一样，只許州官放火，不許民間点灯"。"我国有民主，但有不同意見不能講。美国打民主招牌，但有反面意見可在报上登"。后来省上派沈岭同志去互助县任書記和县长时，雷又为自己沒当上县委書記而不滿。同年八月被調到省人委办公厅和秘書处工作后，把秘書处特殊化，擅自扩大"青海政訊"的編輯組織，在由他决定抽調的七个編輯中后来查明有五个是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一九五六年又擅自代表省长向团省委組織的"青年远征队"講話發奖。雷並且誣蔑"省委以党代政，听不得反面意見，百依百順的是好幹部，有些人强調党的領导，讓党包办了一切"。

另外，雷鳴在办公厅和互助县工作时，还乱变机构，按个人好恶用人，随便給和他臭气相投的人封官許願，提职升級。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被調到青海日报社工作后，又糾合右派分子，大肆向党进行攻击。其主要罪恶事实有以下几点：

一、否定党报的成績，反对党对幹部的审查和对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政策。

雷鳴到报社后否定报紙的成績，說"社論空洞，老一套"、"消息枯燥"、"板起面孔教訓人，群众不爱看"。誣蔑报社以往工作是"一本烂賬"，"同志关系冷冰冰，生活状况不象个机关"，"肃反而宽了，不該斗的斗了"，提出要少宣佈几个肃反对象。当右派分子誣蔑"党組織有宗派和关門主义"时，雷鳴迎合說"領导把同志們的历史問題看得太严重了"，"幹部、人事工作神密"。他把在思想改造中因有反动言行而受到批判的人說成是"精神受了压抑"。对右派分子和坏分子向党的进攻說成是

"兎子急了要咬人"，"可以理解"。極右分子程远給極右分子郭統厚的反动信件，孙君一（省委常委、副省长）同志批示系胡風思想，須典型批判。雷鳴却怀疑說"从一封信是否能断定一个人的思想，这只是思想落后"。右派分子辱駡"彙报是沒人性，党員有奴性"，"入党是朝气衰退"，"領导不懂人学"时，雷鳴却認为这些意見是"正确"的，要求是"合理"的。

二、糾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

雷鳴为了实現个人野心，和报社两个右派小集团勾結一起，专門搜集領导的缺点向党进行攻击。在报社检查工作中，雷鳴煽动群众攻击乔迁（报社总編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調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仍兼总編輯），說"报社的問題都是乔迁的，与我无关"，"大家不敢对乔迁的缺点抱不負責任的态度"；号召大家在下面醞釀意見；影射乔迁說"大家提了意見如果不改，就是国民党作風"。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同志到报社講話，斥責了右派的反动思想，雷鳴公开反对說"高書記不了解报社情况，我沒向他彙报过，有一些意見我不同意"。省委書記陈思恭同志指示报社要全面检查工作，不要集中检查領导。雷鳴抵抗說"不知道該咋办好"。当乔迁同志作自我检查后，右派分子大肆攻击时，雷鳴也借机点火，煽动要乔迁挖意識、割尾巴；右派分子質問党、团員，积極分子为啥不發言，雷鳴却指責不發言的人有"个人主义"；右派分子駡某某人接触領导"八面玲瓏"，雷鳴同意这种說法。当党內一些同志被右派分子打击的抬不起头来时，雷鳴反恶毒地誣蔑說"某某人为鬧地位待遇而消極，某某人个人主义严重"。当同志們提出要批判右派所造的攻击領导的謠言时，雷鳴說"誰知道有沒有"。后来，編委提出检查工作有偏差，要糾正。雷鳴却說"无偏可糾，誰認为有偏去向'群众'講"。最后，还要报社中級領导同志以自己的检討去帶动右派，混淆两类矛盾，掩飾右派罪恶。

三、反对党的領导，搞独立王国。

雷鳴把党視为阻碍他發展的絆脚石，誣蔑党領导的历次革命运动的正确性，說“每当运动初期做的愈左愈好，这是党的要求，左总比右好一点。党搞什么运动历来都是先紧后松，碰到头上倒霉，碰到尾上不要紧”。“根据我的經驗，历来运动都是左的，有偏差”。右派分子孙明軒借省委修建新址写稿攻击省委时，雷說“你不要想的太天真了，省級机关存在的問題不止这一件”，並在群众中散佈說“高峯不如张仲良（前省委書記）”，說“整風彙編”上全国各省的材料都有，就是沒有青海，以此誣蔑青海領导不行，破坏領导威信。一九五七年春生产抗旱时省委提出“千軍万馬”的口号，雷說是“形式主义”。雷对省委要他列席的会議，多不亲自参加，而随意指派别人代他出席；認为省委对报社工作的批評是对他的不信任和干涉，如說“你既然叫我在这兒工作，就应該完全信任我，不应再干涉”。对省委宣传部和該部的負責同志極不尊重，說“宣传部管的太多了”。宣传部长午人同志批評报紙配合中心工作做的差，雷鳴罵道“去他的吧，他懂得个啥”。雷鳴还採取打击和分散报社編委委員的办法，破坏集体領导。右派分子視报社幹部科是“眼中釘”，雷鳴就取消了幹部科。在調动幹部上也是从他个人的好恶出發，如今春提拔的二十名組長級幹部中就有右派二名和不少历史未作結論或思想上有严重問題的人；由他自己决定調配給採訪室的十四名記者中，右派分子就有七名，雷並称这些人是报社的“精华”。另外，还想把原在报社工作后被送去劳教的反革命分子庄本先、石麟祥等人調回报社工作。有些問題雷鳴是先与右派分子雷廷梓研究后才拿到編委会上去通过。当支部对他这种丧失立場和独断专行的作風提出批評时，他竟說“支部要受編委会的領导，我是負責人，我可以决定”。此外，雷鳴不經請示省委就把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报告草稿、刘少奇同志在广州党內会議上的講話及邓小平同志在甘肃的講話等重要文件讓右派分子雷廷梓翻印，結果毛主席的报告被寬大释放的反革命分子李階偷去盗交反

革命分子庄本先传閱，严重洩露了党的机密。

四、圖謀篡改党报的方向，向党放出許多毒箭。

雷鳴长期以来对省委十分不滿，对省委对他在工作上的正确批評抱仇視和抗拒态度，因此在他到报社工作后就竭力想把党报当成为他反对省委的武器，以党报和省委分庭抗礼，和省委唱对台戏，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大肆講“大家怕什么，省委不是不可以批評，（我是）老虎屁股也敢摸，頂大总編輯不当，我原来就不願意来报社”，“批評要抓大的，不要只打蒼蝇不打老虎”，“拚着一身剮，皇帝也敢拉下馬”，“要搞些有質量的批評”，“以往报紙是人們茶余酒后的消遣品，我們的报紙很不够，礼拜六、礼拜日要多給人們消遣的东西”。由于雷鳴是資产阶級的办报观点，在他支持下，“青海日报”曾在一个时期出現过不少的錯誤和毒草。正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为了配合右派的进攻，曾进行了不少歪曲事実、夸大缺点的反动宣传。如去年五月一日“青海日报”第一版刊登“中央关于整風运动的指示”，雷鳴就在第三版用通栏标題：“解放思想，解决矛盾”，暗示过去思想不自由。五月十七日又别有用心地在一个消息的副題中标出“有的同志認为张国声（省委書記）同志在省宣传工作会議总結中将其他犯罪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划入敌我矛盾不妥当”。雷鳴尤为恶毒的是利用党报进行煽風点火，企圖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滿。如五月十八日他亲自指示要公开在报紙上討論“遊行示威是大民主的办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办法，是否违犯宪法”？“过去提政治領导业务，现在又說政治为业务服务，应如何理解”？“我們和平解放台灣，寬大蔣介石，如果人民不答应怎么办”？並且还指示下乡記者在各县召开座談会，搜集对省委和省的領导干部的意见。另外，在雷領导下“青海日报”江河沅副刊已变为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的講壇。雷鳴还利用“左叶事件”擅自决定召开新聞界座談会，以此来反对党对新聞工作的領导。

以上事实說明，雷鳴的資产阶級个人主义思想已發展到極其

严重的程度，他一貫抗拒党的領导，反对省委，积极勾結右派分子向党大举进攻，陰謀篡改党报的政治方向，並且一再堅持錯誤，拒絕改造，已堕落成为一个資产阶級右派分子。为了严肅党的紀律，純潔党的队伍，維护党的团結和統一，經青海日报社支部討論通过，並經省委二〇二次常委会議批准，开除右派分子雷鳴的党籍，撤銷其所任青海日报社副总編輯的职务，行政上由十二級降为十七級使用。

中共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委員会
批准开除右派分子哈木提尧魯达
西甫的党籍

（一九五九年）

哈木提尧魯达西甫，解放前在拜城县伪税局任税务檢查員，于一九四五年参加民族軍后当战士、事务长、連部总务、师供应处副指导員，轉业后在南疆行署財政处任副处长。在高級党校結业后任自治区供銷合作社副主任。

历史問題：系国民党党員，

主要反动言行：

1.反对祖国統一、破坏民族团結。他說："新疆沒有汉族亦可建成社会主义"，更加恶毒地說："供銷社在关内代訓的学員不允許調回，今后我們培养当地的民族幹部"，合作社的庫房在吸收汉族战士时，他反对並下命令說："离开部队，找不到工作的民族战士非常多，应吸收他們，今后你們应录用民族战士"。他还带污蔑的口吻說："应該讓民族同志担任採購員，目前的採購員由于是汉族，所採購的商品不适合民族同志的風俗習慣，积压了

很多的商品，损失巨大"。反对汉族領导同志及汉族幹部，尧到拜城后曾这样謾罵县委書記韓瑞說："你看这个烏龟，起初我們是用維語交談，現在这个人好象不懂維語似的，真是，从烏魯木齐来到这个地方，就不認識人啦"。其他汉族領导幹部給他提意見，他說"我根本和汉族不能共事，尤其我和王树恒（譯音）（中共拜城县委員会書記）合不来"，以上述論調制造不团結。他不服从县委領导，任意走、随便来，工作情况也未写書面报告。他不仅打击合作社的幹部馬左良（党員科长）、张啓元、田建才等人，而且还污蔑說："这些人是說大話，不办事的东西，从外表来看是个人，就是不办事。"尧到原合作社后，不仅污蔑与排挤汉族，而且还拉攏以阿依明・艾里为首的若干落后分子、坏分子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收集安主任的材料，进行顚复領导的活动。一九五八年二月份任主任（供銷合作社主任）从北京开会回来以后，写出传达会議精神的提綱后对尧魯达西甫說："沒有专門材料，我就按照此提綱传达"，他反对說："沒有維文嗎？世界正个是屬于你們的啦"。

2.反对党的領导、党的各項政策。在党委五月扩大会議及財貿会議上叫嚣說："我虽是合作社副主任，到关內採購商品的幹部，他們到那里去？購买些什么？不得而知。成吨的購进扁担、坎土曼把子、鞭桿子、木床……等，这类商品新疆不能解决嗎？我認为完全可以解决，这样做是支援了关內手工业者，却忽略了新疆的手工业者"。尧在五月大会上給阿不都热依木・艾沙帮腔說什么："从整个發展手工业的角度来看就是依靠了一方，却又損害了一方"，尧为了在扩大会議發言，曾准备了一份专門材料，他在發言前，曾讓哈捷耶夫同志看了，当时哈捷耶夫說：你根据什么准备的，这是不对的。此后，他沒有發言（据了解这份材料是为歪曲真理，反对党及民族团結而写的），該材料至今尚未交出。尧在一九五七年合作社社員代表大会上，有意識制造混乱，在做財务决算报告时顚倒是非說："我們的基建資金未下

放，参加了业务周轉”。当时与会的以伊明毛拉吉（右派）为首的一伙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落后分子均向領导猖狂的进攻，並說：領导給我們算算賬。

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艾里的哥哥向艾里及尧鲁达西甫談了一些反对在璁同駐扎的人民解放軍的反动言論时，由于尧亦是反对人民放解軍，于是将此視为把柄，他說：“如果是这样的話，应立即向党委彙报”，将艾里的哥哥用小汽車送到党委农村工作部。尧鲁达西甫反对党的內、外貿易政策說：“在下面合作社吃苦，但名声却屬于外貿，外貿的利潤多，合作社却在賠本，合作社收購了却不供应群众，其中有問題”，他反对一九五七年合作社向天津調拨三百吨葡萄干，叫嚣說：“未經我批准向关內調运了三百吨葡萄干”。一九五七年为了向苏联出口，区党委及人委批准了三千二百吨干果出口計划，尧反对說：“計划数字太大，一九五六年生产下降了，且一九五七年自由市場开放，此任务我們难以完成”。

尧鲁达西甫到原合作局后，就与一部分右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落后分子、坏分子混在一起，不仅在生活、思想、行动方面亲密无間，而且趁着党委工作組了解培养民族幹部情况的时机，以他們同路人的意见为基础，讓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阿依明写了一分充滿反对党的領导、幹部政策、民族政策言論的提綱，阿依明写出六条后，他說：“无力”，于是他亲自动手，补充了三条，其題目是：“領导同志的官僚主义”其主要內容是：“党員幹部与非党人士的团結差，党对統一战綫所持的观点不端正，解决所有的問題时均未發揮民主，向群众执行了少数人专政，党的大門緊閉，党成了非党人士的‘蜘蛛’（以党来恫吓非党人士——譯註），未搞党的建設工作。沒有适当的安排民族幹部，目前我机关的民族領导幹部，存在着有职无权，有桌子无工作問題，未关心幹部生活。”不但如此，他为了实現其机关“民族化”，不允許从关內招收学員，及使合作系統的民族幹部“有职无权”的

反动野心，积極进行了反动活动。（尧魯达西甫在合作社时所写的材料及其臭味相同人的詳細情况見单行材料，尧的这份材料虽讓他們数个同路人写出，但未拿出，在这次斗爭中其中一个人交了出来。）

尧魯达西甫为了使其同路人、民族主义分子阿依明入党，拚命地进行了活动，他在党的会議上这样說：“应該接受阿依明入党，他是立过許多功劳的人，有关他的問題我曾詢問过伊明諾夫主席，他說：无任何問題。你們不了解他。”上級領导曾对尧这样說过：“阿依明常叫嚣什么‘新疆沒有出現象納賽尔那样的人物’等反动言論，因此应注意他的言行”。虽然上級領导向他提出警告，但尧依然在为阿依明的入党問題，进行积極活动，在党的会議上說：“应吸收阿依明入党，对該人入党的問題，拖延的太久了。”他在党支部委員会上提出按民族成分建立小組，进行了分裂党的活动，他說：“应在民族党員中成立一个小組，如此做，对祖国統一，国际主义並无害处，亦不违犯党的政策及馬克思主义”。

一九五七年区供銷社的庫房發生火灾时，全市职工、幹部、部队、学生均积極地在捕灭火災，尧魯达西甫来到現場，問道：“这是那个机关的仓庫？”他毫不經意，当天和他的老婆孩子乘小臥車去烏拉泊野游。

3.歌頌反革命分子，反对肃反、审幹政策。他到供銷合作社后就和反革命分子、落后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糾合在一起，不仅支持他們，打击积極分子，而且积極公开地进行反对党的活动，他还想尽一切办法企圖提拔坏分子卡斯木庫尔班、穆提吾拉，落后分子沙克江、木沙热依木等人的职位。在肃反的时候，确定卡斯木庫尔班作为肃反对象时，他反对說：“我知道卡斯木庫尔班的历史，我不相信卡斯木庫尔班的历史有問題，他解放以后的問題是属于思想問題，不能作为肃反对象”。在审幹期間他又說：“把卡斯木庫尔班的历史应作出結論，为什么到現在还沒

有作出結論呢”。尧鲁达西甫未經过任何手續就把坏分子阿不都热苏尔自行吸收，並把他配备搞秘書工作（阿不都热苏尔現在劳改中）。

尧鲁达西甫不仅与坏分子勾結在一起，而且到拜城去以后，借口要解决农民的烤火問題就到被管制的富农烏沙音艾力的家去当客人，讓他（富农分子）宰羊一起吃喝（該富农是个国民党的軍官，曾和尧鲁达西甫發生过極其密切的关系，尧对該富农究竟談了些什么問題尚未交代）。当反革命分子阿不里孜馬合苏木从獄中被释放出来以后，和他来往頻繁，同时他还歌頌阿不里孜馬合苏木所写的：“献給母亲和女”、“禮拜日”等反动的詩歌。

4.对运动所持的态度：

尧鲁达西甫的思想極为反动，对整風运动的态度一貫表現恶劣，交代問題与对錯誤的認識方面均差。尧交代問題时抱着敌对的态度說：“我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者，只是有地方民族主义的傾向而已，把我的政治問題和法律性問題相对照的話，是不足道的，我再沒有交代的問題了”，尧包庇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阿依明並为他辯护說：“我对阿依明将以事实为依据向他进行斗爭，我不能将阿依明視为兇恶、反动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整風运动中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坏分子一道飲酒作乐，他的生活作風極恶劣，有着严重的违法行为。

尧鲁达西甫的劳动态度不好，在劳动当中，仍然散布反动的言論。尧被斗后仍企圖与海力且木發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关于尧鲁达西甫的违法乱紀行为

尧鲁达西甫的作風从来就是恶劣的，一貫賭博、吸麻烟及嫖風……等。解放以后在喀什生活上表現腐化堕落，並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此外还与坏分子糾合在一起酗酒等。来供銷合作社以后常与海里且木（女）接近（原合作幹校翻譯），于一九五七年底到拜城县搞粮食工作时，与海里且木一起酗酒、形影不离，后与她發生肉体关系。發現海里且木怀孕时，尧在烏市写信讓海里且木

到喀什医院去打胎，海里且木沒有到喀什而到阿克苏医院去打胎，医师未同意她打胎，对她說：这是屬于法律問題，她无法打胎便返回烏市，尧給海里且木打主意並讓她到伊宁去打胎，海里且木虽然想到伊宁去，但被領导上發現以后未批准，因而未达到目的，海里且木生了孩子（此問題有海里且木自己检查交代的专門材料）。海里且木生孩子以后，尧付了住院費一百元，尧这种不法行为不仅引起了当地幹部（拜城县）的不满，而且还激起了人民群众的义憤。

尧魯达西甫不仅在生活上腐化墮落，而且在拜城县的时候，曾与解放以后被劳改过的富农分子烏沙銀艾里，阿合买提热西丁等人来往頗密，甚至到他們的房子去閑談，尧以"不要把政治問題与生活問題混为一談"为借口，經常和坏分子、嫌疑分子、反革命分子来往頻繁，丧失了立場。从拜城县返回烏市时甚至未将他自己的党关系带回来，过了五、六个月以后才給海里且木写信讓把关系轉回来，他由于生活腐化，因而工資不付支出，去年曾申請补助，結果得到一百元的补助。

一九五七年以八个月付款的办法从原自治区供銷合作社經营管理处选購一只价达四百二十元的奥米卡名表，以后对牙生江（处长）說"你們以現款卖吧？"，牙生江說："与我处汉族經理研究一下"。尧說："我确定你是处內有权利的負責人，有什么与他們研究的必要，你可以自行处理"，后来把这表以四百二十元現款售給斯馬依成了变相貪污。

尧魯达西甫来供銷合作社以来的工作表現不仅不好，而且和坏分子糾合在一起到处酗酒，發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此种流氓行为在群众中产生了極不良的影响，于一九五七年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艾力爭吵不休，几乎發生拳斗。于一九五七年原自治区供銷合作社仓庫失火时，为了搶救受災物資使国家財产少受損失，全烏市的机关职工、学生和部队一起动手灭火，尧来到失火的地方背着双手滿不在乎地說："在这兒也有我們的仓庫嗎……"。

当天和他老婆孩子一起坐机关的小汽車到烏拉泊去野游。

一九五七年他到拜城县搞征粮工作去的时候，不仅他的工作态度不好，而且对党的征粮政策的認識和态度亦不正确，当地領导幹部曾严格的批評过尧，尧不服从当地党政部門的統一領导，与当地領导幹部闹不团結，並对拜城县县委書記海瑞抱着敌視的态度。

新疆維吾尔自治区党委批准：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工資降一級，下放劳动鍛炼。